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臺灣現代登山書寫(1949-2024)研究

A Study of Taiwan's Modern Mountaineering Writing

(1949-2024)

徐小嵐

Xu, Xiao-Lan

指導教授：陳室如博士

Advisor : Chen, Shi-Ru,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January 2025

謝辭

研究所這座高峰，我完成了！

三年的碩士旅程，在此圓滿結束。三年的光陰荏苒，我猶記得初次踏入教室的青澀，到站上講臺報告、發表的焦慮，還有寫論文的日子裡，無數個檯燈下的黑夜，那鍵盤敲打的聲響，抬頭迎來早晨的曙光，我揉了揉眼睛，已在此為論文劃下句點。這三年間有喜、有悲、有笑、有淚，能夠順利謝幕，我有許多想表達感謝之意的人。

首先，謝謝我的家人，謝謝我的爸爸、媽媽以及妹妹，謝謝我的父母養育我多年，陪伴我走過人生成長的每個階段，作為我最堅實的後盾，支持我完成碩士學位。

接著，謝謝我的指導教授陳室如老師。從擔任老師的助教，到成為老師的指導學生，這一路上受到老師無私的照顧和教導，謝謝室如老師支持我選擇的研究主題，在老師的引導和鼓勵之下，我能夠順利完成學位論文。謝謝口試委員范宜如老師、吳懷晨老師。懷晨老師以豐富的登山經驗，提點我注意其他沒被我發現的作家和作品。宜如老師從如何藉研究嘗試說明作品中的不可譯之物，提醒我文本的精采之處，兩位老師以自身的專業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使我能更加完善我的碩士論文。

在我修習研究所課程的階段，特別謝謝宜如老師，開啟我對登山書寫研究的興趣，在老師的課堂上，我接觸到散文教學、空間與文學，認識到山岳文學相關的作品，從而進入山岳的領域，一頭栽進其中。還有謝謝室如老師帶我認識旅行文學，對我的碩士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師大研究所的同學、朋友，左珉、苡軒、子琦、鈺鈺、依爛、越瀛、家穎、亞凡、羽挺，有大家的陪伴與鼓勵，完整了我的碩士生活。尤其謝謝左珉陪伴我數個夜晚，與我談心聊天，給予我很多的幫助。

最後，要謝謝我自己，寫論文就宛如登山，途中的波折與艱難是為登頂時的美好風景，能夠攀登這名為碩士的高峰，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最主要也是自己願意砥礪前行，經過淬鍊來成就更好的自己。因為研究登山書寫，使我開始對登山感興趣，謝謝你願意帶著我走入山岳，成為我的夥伴。

寫於二〇二五年一月冬

中文摘要

本研究擬以「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為主軸，探究戰後臺灣登山書寫的發展脈絡，登山書寫如何在社會脈動、外部環境中，開展不同階段的時代性特色，又反映出書寫者與山岳空間的關係和互動，如何呈現多元的登山意義與價值，並針對女性登山書寫、山岳地景書寫進行專題探討，延伸出性別身體、山岳意象等值得深究的面向，就文本的分析與耙梳觀照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發展。

本論文將臺灣現代登山書寫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 1949-2001 年、2002-2024 年。戰後政府實施山區管制，人民與山岳的關係是疏離的，1980 年代臺灣登山書寫走向學術化，以古道調查、區域探勘深度了解山岳的人文、生態與地質等，同時海外攀登盛行，以遊記為主題的紀實文本記錄海外遠征的冒險歷程。2000 年以後，登山普及化，登山者將海外攀登習得的經驗與知識帶進臺灣，推動登山教育，並探究登山與生命之尋覓。不同背景經歷的作家以書信體、報導書寫和抒情等形成多元的登山書寫形式；生態研究者結合登山行旅和學術研究，從生態的眼光認識高山；高山職業工作者，即巡山員、高山嚮導，書寫其工作內容，掌握一般人難以接觸的高山面貌。就山岳地景來看，臺灣歷經日治、國民政府的政權轉移，可見山岳空間存在著權力、意識型態的支配；通過玉山書寫凝聚土地、民族認同，山岳成為文化運用的符碼，玉山成為精神象徵，形塑新的臺灣文化價值。

關鍵字：登山書寫、山岳文學、山林、地景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modern mountaineering writing in Taiwan” as its central theme,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eering literature in post-war Taiwan. It examines how mountaineering writing evolves across different time periods in response to societal dynamic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re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writers and mountain spaces. The study aims to highlight the diverse meanings and values associated with mountaineering,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women’s mountaineering writing and mountain landscape writing. It further delves into topics such as gendered bodies, mountain imagery, and other significant aspects worthy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trace and interpret the progression of modern mountaineering writing in Taiwan.

This thesis divides modern mountaineering writing in Taiwan into two phases: 1949 to 2001 and 2002 to 2024. After the war, government-enforced mountain restrictions alienated people from the mountains. In the 1980s, mountaineering writing in Taiwan became increasingly academic, focusing on ancient trail surveys and regional explorations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mountains’ humanities, ecology, and geology. At the same time, overseas climbing gained popularity, with travelogues documenting the adventures of international expeditions. After 2000, mountaineering grew more popular, and mountaineers brought back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from overseas climb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motion of mountaineering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existential meaning through mountaineering. Writer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enriched mountaineering literature, using forms such as letters, reportage, and lyrical prose. Ecological researchers integrated mountaineering journeys with academic studies, offering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mountains. Additionally, alpine professionals like rangers and guides documented their work, revealing aspects of mountain environments typically inaccessi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untain landscapes, Taiwan’s history of Japanese rule and the subsequent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ra reveal power dynamics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embedded within mountain spaces. The writing centered on Jade Mountain has served

to unify land and national identity, transforming the mountain into a symbol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Over time, Jade Mountain has become a spiritual emblem, shaping new cultural values in Taiwan.

Key Words: Mountaineering writing, Mountain literature, Mountain Forest, Landscape



目次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定義..... | 5 |
|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 7 |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理論..... | 11 |
| 第五節 章節架構與安排..... | 14 |
| 第二章 探險的多重奏：論 1949-2001 年的登山書寫..... | 15 |
| 第一節 開始之前：日本帝國凝視下的高山紀行..... | 16 |
| 第二節 戰後初期的高山紀行（1950-1970 年代）..... | 21 |
| 第三節 本土的登山書寫：朝向學術化..... | 26 |
| 第四節 海外的登山書寫：冒險與開拓..... | 36 |
| 小結..... | 43 |
| 第三章 多元的書寫礦脈：論 2002-2024 年的登山書寫..... | 45 |
| 第一節 登山教育與生命尋覓..... | 45 |
| 第二節 登山書寫形式探究..... | 56 |
| 第三節 生態研究/高山職業登山書寫..... | 65 |
| 小結..... | 74 |
| 第四章 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反思探討..... | 76 |
| 第一節 女性登山書寫探討..... | 76 |
| 第二節 集體的想像：地景的形塑..... | 90 |
| 小結..... | 108 |
| 第五章 結論..... | 110 |
| 參考書目..... | 114 |
| 附錄..... | 122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筆者在研究所課堂首次接觸到陳德政的《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此書是陳德政於 2019 年加入 K2 臺灣遠征隊，¹以隨行報導者的身分記錄並書寫這趟登山之旅，除了近距離觀察國際登山家與雪巴族，更重要的是作者跨越自身的極限，挑戰征服高山，從城市人到被自然淬鍊過的攀登歷程，進而思考山岳、登山的意義，其中作者描述他與山岳的關係：

我隔著天窗，詫異於我和 K2 之間超現實的比例——一個人和一座山那種力量與質量的不對等。黑壓壓的雲團遮蔽了山頂，一波波氣浪從原本固定的山景中拋射而出，整座山在我眼前暈開，暈成一幅浮幻的水墨畫。²

人以渺小的身軀於崇高的山中跋涉，縱使精疲力盡，也想登峰一睹自然之景，究竟山岳的魅力如何吸引著人類前往，並心嚮往之，觸發筆者對「登山書寫」的興趣與認識。林玫君的《台灣登山一百年》是最早系統性地梳理臺灣登山活動史，討論臺灣自清代以來的百年登山史實脈絡和過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提到人類對於「山岳」態度轉變歷程：

清代「從懼山到望山」的過程得知早期山岳在人們心目中，是蠻夷和神聖之地。隨後日治的「從探險到休閒」以及戰後的「從沉寂到興盛」可見登山轉化出不同的型態和樣貌，其中「征服」性格，是環境使然，歷史的變動也是主因；到了二十世紀末，基於自然保護的重視，「從忽視到重視」，登山活動

¹ K2，喬戈里峰，位於新疆喀喇崑崙山脈與巴基斯坦喀什米爾交界處，海拔 8,611 公尺，是世界第二高峰，國際上通稱喬戈里峰為 K2，雖然高度次於聖母峰，但山勢陡峭，雪崩頻繁，攀登難度和危險程度遠高於聖母峰，故又被稱為殺人峰。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高雄市百岳登山協會》<https://www.100peakmthk.org.tw/index.php/2015-05-14-08-57-14/28-k2>（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3 月 17 日）。另外，陳德政之所以成書，源自於「K2 Project」，是文化評論家詹偉雄為應援台灣登山家呂忠翰（阿果）、張元植攀登海拔 8611 公尺的世界第二高峰 K2，在 2019 年春天發起募資與認識高山計畫，獲得迴響，並於同年夏天正式出發，開啟為期一個月的登山旅程。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臺北市：新經典文化，2021 年）。

² 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頁 243。

轉向思考，開始強調生態登山、環境互動、開拓心靈等核心內容。³

過去為生存目的，地質學家踏入群山以科學方法了解山岳；或者為政治因素，以攀上頂峰表征服之意，到人類開始認識山，欲征服大自然，享受爬山之樂趣，或作為暫時逃離現實的去處，乃至能使人甘心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登山，如今山岳已不再如過往般神秘、畏懼，而是能讓人迷戀、嚮往的地方。山作為人類感知下的產物，歷經時間的洗禮，被想像成現在的存在。

「山岳書寫」與「自然書寫」有著緊密連繫，臺灣前行研究者已整理自然書寫的各種類型，並在文學史上的發展脈絡作了周詳的分析論述。例如吳明益認為開拓自然書寫研究的另一個方向是針對書寫特定自然地景的文學書寫，即文本中呈現出來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舉例而言，在西方與日本，均有山岳書寫（mountain writing）與河流（river writing）這類的研究與選本，在臺灣卻只有海洋書寫受到較大的重視。由於臺灣的地理環境屬於山與河的高密度地形，確實存在著大量以「某種自然地景」為主意象的文學作品，論述這些不同自然地景在文學作品裡，或顯或隱的意義，或許能呈現出人與環境互動的意義。⁴

吳明益如此定義臺灣的「山岳文學」：「認為可以廣義地、將描述台灣山岳的作品一併納入，再細分為專業人士、非專業登山家、原住民所寫的山岳，以及工具書四類。」⁵涵蓋範圍甚廣，包含原住民所寫的山岳小說等文學作品及相關的工具書，引發筆者思考在登山書寫所開啟的進一步研究，本文鎖定「登山」為題材的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加以分析討論。

另外，筆者閱讀西方山岳經典著作羅伯特·麥克法倫的《心向群山》後深深受到啟發，書中提到「人類的高海拔悖論」，即高海拔會提升同時也會抹煞個人的心靈。那些爬上山頂的人，一半是愛著自己，一半是愛上自我消弭。⁶峰頂帶來巨大的視野，同時也帶來摧殘，個體自我感因眼界的開拓更強大；但也同時受到攻擊，山頂上無邊無際的時間與空間顯得無足輕重。這也正是本論文希望進一

³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臺北市：玉山社，2008年），頁6。

⁴ 吳明益：《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3》。（新北：夏日出版，2011年），頁208。

⁵ 吳明益：〈山岳文學的攀爬 吳明益談山〉，《聯合文學》第417期（2019年7月），頁27。

⁶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新北：大家出版，2019年），頁212。

步探究之處，何以被山迷戀的人類，願意走入山岳，其登山契機和追求何在。

此外，郭熊《走進布農的山》則是提供筆者一個新的啟發，本書記錄作者十幾年來在山岳裡的探索。身為生態研究者與觀察者，他以特殊的視角建構出「山岳」，觀察動物的排遺或抓痕推測其足跡、習性，由於生態研究者的身分，故能說明動植物的特徵和歷史，更有個體與自然互動的自我觀照、省思，得見作者內在的演化途徑。正如郭熊自述：「我就是想寫一種『複合的狀態』，尤其當我要寫的是一片森林。」⁷在長時間的山林獨處和工作經驗中，通過與大自然的觀察和互動，建構專屬的山岳世界，檢視並思索自身與萬物的關係。

事實上，藉觀察力與想像力追蹤大自然的感知力是現代人逐漸喪失的，臺灣是群山的島嶼，過往的歷史文化將我們與山的距離拉遠了；正如《生之奧義》提到現在我們正面臨「感受力的危機」，我們感知、察覺得到的，得以締造為我們與生物關係的，都日漸貧乏。與人類共存於世的生物，被我們墜至「重要事物」的邊界以外，登山書寫，乃至自然書寫正是把那些不可譯之物嘗試翻譯出來，這也是「跨物種外交」，指的是隨時制宜的顧念敬重的理論與實踐：

始於理解其他生命形式，如此的理解試圖公正對待這些生命形式的相異性：這樣的理解因此意味著剪裁一套適切的風格來談論牠們、來將牠們的生命模樣形諸語言文字——這是牠們自己不會做的。⁸

登山書寫也須涵蓋如郭熊這類的生物研究者，在描寫登山過程以及所身處的山岳，形構了不同的山岳面貌。正因為閱讀類型相似的作品，使得筆者對登山書寫產生興趣，且從《生之奧義》了解到自身對大自然的感受力危機，故欲藉研究登山書寫，來嘗試揭開人們與山岳的互動與關係，更認識與臺灣息息相關的山岳。

西方多部著作已探討登山相關的議題，比如《心向群山》、《山之生》⁹、《攀登的奧義》¹⁰等書，臺灣由於地理環境的優勢，自然而然孕育出「登山」文化，藉由登山書寫的進一步研究，將可更完整呈現臺灣登山文化獨特的發展脈絡，以及自然書寫的豐富樣貌。

⁷ 鄒欣寧：《在山路上複寫土地與我的故事——專訪郭熊《走進布農的山》》<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5745>（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3月13日）。

⁸ 巴諦斯特·莫席左著，林佑軒譯：《生之奧義》（新北：衛城出版，2021年），頁158。

⁹ 娜恩·雪柏德著，管嘯塵譯：《山之生：一段終生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臺北：新經典文化，2019年）。

¹⁰ 詹偉雄選編，劉麗真等譯：《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臺北市：臉譜，2021年）。

二、研究目的

臺灣是多山的島嶼，超過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多達兩百六十餘座，¹¹是世界上少有的。在清代以前，山岳帶有濃厚的神祕感，不僅幽深險阻，更有猛禽異獸，常被古人視為介於天堂與俗世之間的超自然領域。這種認知讓人們認為山岳是神祕不可知的世界，將許多山區視為禁區。¹²又加上與山地原住民產生的隔閡，對高山的想像與未知，造就人們畏懼山林。日治時期政府展開對台的治理，掌握土地並開發山林資源，打開通往高山的道路，固然推動近代台灣登山的發展，不過帶有政治意義，以攀登作為征服之意，臺灣人登山受到限制。戰後的山岳活動沉寂到現今的登山熱潮，¹³在國內不論是登山步道，或百岳挑戰，都可見人們的熱衷與投入，許多希望冒險的登山者，更是跑到國外，挑戰更困難的攀登任務。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對日治時期以來的臺灣登山活動發展進行系統性的整理，筆者留意到臺灣的登山活動如此興盛，故耙梳戰後到現在的山岳作品，發現累積的作品相當可觀，目前查找出的著作資料已超過五十部，而「山岳書寫／文學」相關的文本卻常被忽略，¹⁴至今登山活動相當普及，為何研究登山書寫的研究如此稀少？筆者好奇登山文本的樣貌，比如登山外部環境下呈現登山書寫的時代性、書寫者與山岳自然環境互動的意義與不同登山書寫者的出發契機等，故產生想要探討臺灣現代登山書寫和登山活動發展的動機。

隨著文本的蒐集，發現各個文本的多元面貌，其中涉及作家本身的書寫特色和學經歷背景有關，亦受到時空環境不同的影響，登山書寫在臺灣發展的時間漫長，累積一定的作品數量，能夠擁有長期的發展，必然有其重要性。登山書寫反映登山的外部環境，以及人類與山岳自然環境的關係與互動，並牽涉到旅行、自然書寫的範圍，涵蓋層面十分廣泛。

是以本文企圖處理的問題，主要探討臺灣登山書寫的發展，內容主要有三個方向：一是形構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發展歷程；二是探索並研究各個時期登山書寫的特色；三是從性別、空間、地景等的理論更宏觀地觀照山岳書寫，了解臺灣

¹¹ 《台北市山岳協會》：<http://www.tmca-tpe.org/content.asp?id=643&cat=98&type=1>（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2月10日）。

¹²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14。

¹³ 臺灣在1951年光復後首登玉山開始，即已形成一種非常大眾化的運動。李希聖：《臺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臺北：李希聖，2005年），頁5。

¹⁴ 吳明益：〈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東華人文學報》第九期（2006年7月），頁177。

現代登山書寫的特色、發展脈絡。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定義

本論文主題為「臺灣現代登山書寫」，選定的研究時代範圍是國民政府遷臺的 1949 年到 2024 年止。「登山書寫」的研究對象以現代散文作品為主，並將日誌、遊記、踏查報告等形式的寫作納入範圍。

「登山活動」通常係指以山岳作為活動場域，通過雙腳、徒步或使用專門裝備用具攀登不同地形的山，形式主要有山區健行、攀登，以及衍生的攀岩、溯溪等相關活動。¹⁵

本論文所提及的「登山活動」指的是「近代登山」，

以時間而言，意指一七八六年登上白朗峰之後的登山活動。它的內涵有別於過去因生存、宗教和軍事目的的活動，而是透過科學來瞭解山岳，並以登山為目的，享受登山活動的樂趣，其中還隱含著征服山岳，以及伴隨登臨山巔而來的榮耀，這些正是近代登山提倡的精神。¹⁶

自此登山活動走向嶄新的道路：以精神為主，而非基於生存需求。人們對山的理解隨著人類進入群山而擁有新的轉變，過去高山的陡峭和危險，為近代登山增添挑戰性，而荒涼和雄偉成為觀看高山的新視角。

安川雄茂曾指出「要驟然對登山的本質下個定義，是很困難的」。¹⁷沼井鐵太郎曾將臺灣登山活動分為「正統派登山」與「趣味及靜觀登山」，前者指人類初登世界高峰的探險歷史記錄，是純技術性的登山，包括克服岩（雪）壁的攀登，或以體育及團隊精神下的攀登；後者為一般旅行型的登山，注重山岳對思想的變遷，以及山岳地形的變遷。¹⁸其分類有向歐洲近代登山的意涵靠攏，又點出臺灣登山活動的形式。

本論文指涉的「登山活動」，是以「登山」為目的的行為，是「自覺意識支

¹⁵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 11。

¹⁶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16。

¹⁷ 安川雄茂著，樂山譯：《最新登山學》。（臺北：國家出版社，1977年），頁 1。

¹⁸ 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史》。（臺中：晨星，1997年），頁 12。

配」的登山活動，其中隱含征服山岳、登臨山峰的精神。「登山」的完成包含登頂、登降、步行三種過程，又攀登的對象有高山、中級山岳、近郊的低山。¹⁹本論文所述及攀登山岳的範圍不僅侷限於臺灣境內的山岳，亦涵蓋臺灣以外的山岳。

接著界定「山岳」。臺灣多以山地、丘陵地形為主，就地形而言，臺灣以五大山脈為主體；²⁰依高度來說，目前學者將 100 至 1000 公尺視為低海拔山區；1000 至 3000 公尺為中海拔地區；3000 公尺以上山岳為高山區。按此，臺灣登山界稱 1500 公尺以下山岳為「低山」；1500 至 3000 公尺山岳為「中級山」；海拔 3000 公尺以上山岳稱為「高山」。²¹臺灣是群山之島，可是與全球高山比較，缺乏 4000 公尺以上的山地，臺灣許多登山者會前往國外的高山進行更有挑戰性的攀登，比如白朗峰（4808 公尺）、阿空加瓜峰（6961 公尺）、K2 峰（8611 公尺）、聖母峰（8848 公尺）等世界級的高山。

綜上所述，本論文討論的登山活動在一百公尺以上的山岳系統，登山書寫者以臺灣作家為限，且登山的場域包含臺灣及臺灣以外的山岳。

吳明益在《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提出「自然書寫」的定義，²²筆者參考其說法，說明本文認為的「登山書寫」定義。登山書寫是以山岳為描寫對象，首先在「自然為書寫主體」的義界中，強調創作從書寫對象的主體出發，「山岳」是書寫主體，誠如吳明益之言，以「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的主軸，即登山者在山岳作為主體的空間中的書寫，並以登山為目的的活動。

承繼自然寫作的重要內涵，作者親自涉入現場觀察、記錄，以「非虛構」經驗為書寫的基本背景，登山本身就需要登山者親自攀登，寫作的主要面向會是人類在登山時的身體經驗，以及大自然帶給人類的感受，無論是實際上的互動，抑或是內心上的交流，都可以是書寫的範圍。是以登山書寫必然以作者的真實經驗

¹⁹ 參考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頁 20。

²⁰ 分別為中央山脈、阿里山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和臺東海岸山脈。

²¹ 參考並統整自楊建夫、黃一元、林大裕：〈從自然地理談山的界定〉，《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集》（2005 年），頁 51-52。以及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頁 14。

²² 吳明益提出六點解釋性的義界：1.以「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的主軸——並非所有涵有「自然」元素的作品皆可稱為自然書寫。2.注視、觀察、記錄、探究與發線等「非虛構」的經驗——實際的田野經驗是作者創作過程中的必要歷程。3.自然知識符碼的運用，與客觀上的知性理解成為行文的肌理。4.是一種以個人敘述（personal narrative）為主的書寫。5.已逐漸發展成以文學揉合史學、生物科學、生態學、倫理學、民族學、民俗學的獨特文類。6.覺醒與尊重——呈現出不同時期人類對待環境的意識。摘自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新北：夏日出版，2012 年），頁 36-44。

出發，同時也會表現出個體看待山岳的想法。登山的風氣與意義會隨著時代、環境改變，連帶可見登山者出發的契機、登山的方式、對山岳的認知亦有所改變。

在寫作形式方面，主要以散文作品為討論界限，登山書寫作為個人敘述的載體，較常以日誌、遊記、報導、踏查報告等形式呈現，講述作者的登山歷程，以及登山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或者偏向技術性的描述，針對攀登過程、設備進行詳細報告，展現登山書寫的多元性。

本文認為「登山書寫」之主要涵蓋下列各點：

1. 研究對象以現代散文作品為主，並將日誌、遊記、踏查報告等形式的寫作納入範圍。
2. 「山岳」是書寫主體，登山者在山岳作為主體的空間中的書寫，並以登山為目的的活動。
3. 作者親身涉入現場，記錄、探究登山的「非虛構」文本。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論文以臺灣現代登山書寫之時代意義、內容特色、發展歷程以及人類與山岳的互動關係和態度為研究架構，然依循自然書寫之下，故所選前人研究內容勢必密切相關且有足堪啟發、討論、引證或拓展之觀點。依序分為「以山岳書寫為主題」、「以登山研究為主題」、「以自然書寫為主題」三個主題，而「以登山為主題」又分為「登山史」和「登山者」兩項，各項再依專書、單篇論文與學位論文進行討論。

一、以山岳書寫為主題

符合 1949 年以後的臺灣山岳書寫研究的碩博士論文有三篇，其一，梁銘浩的《殖民意識、象徵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意識研究》此文先以日治時期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探討日本學術探險背後隱藏的帝國主義殖民意識，²³後討論玉山地景與玉山書寫中的民族認同與多重文化意義，最後從劉克襄的山岳書寫解讀其創作意義，以解釋山岳書寫稀少的緣由，並總結

²³ 梁銘浩：《殖民意識、象徵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意識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年）。

山岳書寫的寫作意義與核心價值，即臺灣人土地意識的認同與凝聚。而這篇論文研究的「山岳書寫」概念源自於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中的「自然書寫」，故其討論的對象以散文為限，並從臺灣的山岳環境與文化作為論述背景，討論山岳書寫的文化意識，是筆者重要的參考對象。而本論文將以更宏觀的視野觀照山岳書寫者的多元身分，是梁氏文章尚未討論之處，其文僅專論劉克襄，並未針對登山文本進行廣泛的蒐集和討論。

其二，蘇筱芸的《陳列《永遠的山》在臺灣山岳書寫中的意義》從清朝以前、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三個階段討論臺灣高山與人類互動的歷史，²⁴及列舉出相應的山岳書寫文本，並將研究主題聚焦於陳列《永遠的山》的思想、美學成就，最後舉出其他作家的山岳書寫作品與陳列《永遠的山》進行比較，重新定位陳列在山岳書寫中的意義。其中作者列舉出與陳列進行比較說明的作品，是洪素麗與劉克襄，其所關注的方面較為限縮，並未能注意到其他登山作品，而本論文會納入更豐富多元的登山作品，以更廣的視角來研究。

其三，藍閔釋的《臺灣現代山岳詩發展研究——以 1949 年至 2011 年為範疇》從臺灣山岳活動的發展歷程探討臺灣現代山岳詩，²⁵根據山岳活動與山岳詩發展的適切性，將臺灣現代山岳詩發展分為四個階段：臺灣山岳探險期、臺灣山岳旅遊期、專業化登山期、玉山運動期，並針對各期的山岳活動、外部環境，以及相對應的山岳詩進行討論，最後架構臺灣現代山岳詩的發展歷程，從中尋找臺灣山岳詩的特色和意義。此文把研究對象限於新詩，是考量到山岳詩作的稀少，從外部的環境討論各時期的山岳詩特色，如此可能造成的疑問是這些作品是否能譜出臺灣現代山岳詩的發展歷程，其文亦提及山岳書寫主要以散文為主，筆者認為詩較適合書寫詩人主體的情感與哲思，而至於以山岳為主體的山岳書寫，該文並未進一步處理，故本文將處理以散文為主的登山書寫進行論述。

二、以登山研究為主題

(一) 以登山史為主題

主要有兩部碩博士論文，其一，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

²⁴ 蘇筱芸：《陳列《永遠的山》在臺灣山岳書寫中的意義》（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博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年）。

²⁵ 藍閔釋：《臺灣現代山岳詩發展研究——以 1949 年至 2011 年為範疇》（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年）。

此文從日治時期的政治策略與登山活動的相互關係，²⁶探討臺灣在被殖民和現代化過程中的登山活動發展軌跡，顯示當時的登山活動背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權力操控。此論文提供日治時期的登山活動潛藏帝國主義的權力關係和意識形態，用以探得登山活動受到外部政治環境的時空背景影響，同時也展現出登山活動的時空意義。

其二，是羅時成：《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研究》此文主要是探討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發展。²⁷清代與日治時期登山活動的型態以政經考量，至戰後初期受到政府頒布的山地管制限制，登山活動受到阻礙，隨著政府推動觀光業和設立山岳型國家公園等措施，臺灣登山活動逐漸活絡，加之民間的推廣，使得戰後登山活動的內涵更加充實。此論文站在登山的角度梳理臺灣戰後的登山活動從初期的停滯，到逐漸興盛的過程，是筆者用以參考臺灣登山活動發展的對象。

又其他臺灣山岳活動發展史的專書有：李希聖《臺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²⁸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總論》、²⁹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³⁰是本文重要的參考著作，當中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尤為完善，作者自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登山歷史與環境進行有系統性的脈絡釐清，以淺近的文字搭配資料圖案說明清楚，是登山史研究者相當重要的參考著作。

（二）以登山者為主題

有兩部碩博士論文，其一，黃麗瑩《越過生命的那一座山—女性的登山體驗與登山對其生命經驗的影響》以女性為主體討論登山活動，³¹運用性別與權力的方向探討女性的身體經驗、互動方式以及主體建構的過程，採質化研究的深度訪談，並藉由受訪者的口述採訪作論證依據，而本文以登山作品為文本，試圖開展不同的研究脈絡。

其二，陳慧元的《以步履描繪山的輪廓——台灣登山者的山林啟蒙與地景依戀》以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形式試圖涵蓋多元的登山者經驗，³²來說明人地關

²⁶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²⁷ 羅時成：《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²⁸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臺北：李希聖，2005年）。

²⁹ 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總論》（臺北：營建署，2013年）。

³⁰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臺北市：玉山社，2008年）。

³¹ 黃麗瑩：《越過生命的那一座山—女性的登山體驗與登山對其生命經驗的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³² 陳慧元：《以步履描繪山的輪廓——台灣登山者的山林啟蒙與地景依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係，並從身體與山林間的空間感知揭露感官知覺藉記憶、情感與文化建構山林地景，以及登山者通過地景，形成帶有依戀情感的「地方」。本文從身體討論空間，再衍生至地景、地方的空間理論概念，帶給筆者開展另一個研究脈絡的靈感。

另外，楊南郡作為臺灣著名的登山家、古道踏查先驅，勢必是本論文討論的對象，相關的碩士論文有陳慧元的《結合登山運動和學術研究的認真休閒者：以楊南郡之生命史為核心的探索》從生命史的敘說方式，³³將楊南郡的生命史進行分期，檢視其登山學術化的發展歷程，並探討楊氏登山生涯中的認真休閒形成。此文提供閱覽楊南郡的生命史，藉深度訪談楊南郡的研究方式得以認識楊南郡及其作品。

而徐如林著有《連峰縱走：楊南郡的傳奇一生》，³⁴以妻子的角度述說楊南郡的登山人生。作為早期登山的紀錄保持人，楊氏走遍臺灣的山岳，為臺灣山岳的開拓者，隨後轉向登山學術化，進行古道探勘的工作，並追溯和認識原住民的歷史文化。此書是本文重要的參考著作資料。

三、以自然書寫為主題

與「登山書寫」緊密連結的文類為「自然書寫」，與本論文主題有關的碩士論文有田運良的《劉克襄自然書寫裡的旅行印／意象》，³⁵此文以旅行文學的進路研究劉克襄的自然書寫，劉克襄致力於自然生態保護、教育和社區改造運動，熱衷登山、古／鐵道踏察與鄉鎮旅行，重新改變以人為中心的自然美學，建立自然價值觀的新定義。除了對自然物的觀察書寫之外，更對以「旅行」踏察過程中的地誌、生態、旅行，所呈現的「印／意象」提出歸納、研究。當中的古道歷史空間追尋是本文涉及到的研究，也顯示劉克襄的古道踏查特色。

專書有吳明益的《以書寫解放自然》三冊為自然書寫研究重要的專著，³⁶對自然書寫的理論建構與臺灣自然書寫的發展脈絡進行詳細的梳理，從西方生態史和文學理論耙梳臺灣的自然書寫，並針對各時期的代表作家逐一探討。可惜並無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年）。

³³ 彭秀姝：《結合登山運動和學術研究的認真休閒者：以楊南郡之生命史為核心的探索》（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3年）。

³⁴ 徐如林：《連峰縱走：楊南郡的傳奇一生》（臺中：晨星，2017年）。

³⁵ 田運良：《劉克襄自然書寫裡的旅行印／意象》（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³⁶ 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臺灣自然書寫的作家論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2》與《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3》。

專論山岳書寫，而是統攝在自然書寫的脈絡之下，其中〈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一章節討論的對象是「河流」，吳氏亦提及臺灣的「山岳書寫」，可將山岳的概念放置於此節，對本文深有啟發。再者此書闡述的自然書寫演變、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是山岳書寫會碰觸到的面向。

另外，簡義明的《寂靜之聲——當代台灣自然書寫的形成與發展》以自然書寫發展階段中的重要議題及書寫文類進行論述，³⁷著墨於歷史脈絡、社會實踐與文學的關係，從政治社會的外部環境探討自然書寫的趨勢及演變成因。其對研究論點的開展提供本文極大的啟發。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理論

一、研究方法

本文所採用研究方法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係指蒐集和分析現存的、以文字形式為主的文獻資料。根據文獻資料來源的不同可以分為個人文獻、官方文獻及大眾傳播媒介三大類，個人文獻主要指個人的日記、自傳、回憶錄等；官方文獻為與政府組織機構有關之報告、統計、計畫等；大眾傳播媒介有報刊、電影、電視等。另外，書籍、圖片亦是常見的文獻來源。依照選擇的研究主題，尋找適合的文獻資料，接著進行分析。³⁸筆者選定的研究主題為「山岳書寫」，將會根據登山史及外部環境的現有文獻資料，進行整理並摘取個人文獻以了解作者的生平或相關事蹟。

(二) 文本分析法

透過對文本的深度挖掘與訊息檢索，掌握文字下的深刻內涵、精神，試圖詮釋文本的意涵與時代意義，並了解書寫者的背景、經歷和動機，以建構與歸納山岳書寫的寫作特色與脈絡。

³⁷ 簡義明：《寂靜之聲——當代台灣自然書寫的形成與發展》（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年）。

³⁸ 袁方主編：《社會研究方法》。（臺北市：五南，2002年），頁377-385。

二、研究理論

本文欲透過相關理論的分析與應用，如空間理論（權力關係理論、人文地理學、地景研究理論）、生態學、旅行文學及文類研究理論等，用以強化本論文的論點，使研究脈絡更加清晰明白。

空間理論

「山岳」作為一個空間，可以從多個角度討論，首先是「權力關係」，日治時代到戰後初期帶有明顯「權力」空間的展現，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將山岳視為權力空間的占有和征服；而國民政府甫至臺灣，以法律制度進行山地管制，控制山岳來達到統治的目的。此時的山岳以征服、統治為目的，並作為資源、權力的空間利用、展現，因此欲討論山岳主題就無法避免探討到權力的課題。

隨著山岳的開放，及人民對山岳的了解與熱愛，山岳逐漸從「空間」成為「地方」，且山岳作為自然環境，除了旅遊觀光的產業發展之外，亦成為現代人嚮往之處。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中提出「逃避自然」的概念，即人類遷徙以尋求更滿意的地方，源於對現存地方的不滿意，揭示人類對現狀的不滿足，以及逃避現實的願望。「遷徙」作為一種逃避，是人類渴望獲得「安定」、「穩定」的生活，使得人類試圖通過改造所處的地理環境來實現，因此自然界成為人類文明改造的首選，自然的不可依賴性和不可莫測性，人類為逃避此威脅，故創造穩定的人造世界，以彌補自然界的不足之處。然而，文明建構出的現實世界，反倒讓人更加忙碌、沮喪、無所適從，大自然的神秘、廣闊是人們再次逃避的去處，便轉向「逃向自然」：

人類逃往的自然必定已經被人文化了，且被賦予人類的價值觀，因為這種自然是人類願望的目標所在，而不是人們被迫或不高興進入的一個模糊的「外在」世界。所以，可以這麼說，我們希望逃向的地方已經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這一迷人的概念。³⁹

「登山」即為「人文化」自然的展現，開拓登山步道、規劃攀登路線和設計登山行程，又或台灣百岳、世界山岳的制定、推廣，是人類文明有意識的建構「自然

³⁹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臺北：立緒，2014年），頁23。

世界」，以逃向自然。無論人類基於欲短暫逃避現實、鍛鍊身體、挑戰自我等原因，登山於是乎成為首要選項。

此處也點名「登山的契機與動機」，每位作家前往山岳的理由不盡相同，且登山者的身分和背景也會影響看待山岳的視角不同，比如專業登山者、非專業人士等，當中專業人士又得分出相異的類別，登山家、生態觀察家、博物學家等。就目前筆者整理出臺灣現代的山岳書寫著作可以發現其書寫者的多元身分，如此形構臺灣多樣的山水書寫。

再者，人文、文化地理學中「地景」，Tim Cresswell 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提出「地方」的概念，⁴⁰從區域地理學研究、地方感、寓居（dwelling）、地方的社會建構、地方與實踐、地方與關係性等主題，進行全面性的整理，並關心在全球移動性下，地方如何被創造、記憶與研究。若把「文化」納入空間或地方來談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即可詮釋地景，地景反映社會的集體塑造，具有獨有特殊的取向，其牽扯出兩個層面的問題，地景如何塑造特定社會組織，以及如何被該組織所塑造。山岳在長期的演進過程中，形塑出獨有特別的地景，從時間的角度看日治時期的山岳是權力的象徵；對現代來說山岳可能是休閒娛樂之所、逃避壓力之處等，故筆者認為可從地景的角度討論登山與時代、個體的關係互動。

段義孚在之後的著作《浪漫地理學：探尋崇高卓越的景觀》傾向講述更廣闊的地域（海洋、山嶽、森林、洞穴、沙漠、和極地），⁴¹揭示人們所不自知的熱望和恐懼、勇敢和貪婪。從歷史的脈絡談思想、宗教、理論等影響人類對自然、環境、社會及政治的想法和感覺，在浪漫主義中，實際上在所有人類的欲望、誘惑和渴望中，都潛伏著兩極化的價值觀念。至少在想像中，這些觀念的存在引誘人們超越常規走向極致。對於本文而言，提供從浪漫地理學的角度，提供觀看一種地景的方式，內在的渴望與價值觀會影響看待山岳等大自然的景觀。

⁴⁰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年）。

⁴¹ 段義孚著，趙世玲譯：《浪漫地理學：探尋崇高卓越的景觀》（臺北：立緒，2018年）。

第五節 章節架構與安排

本研究承繼著臺灣山岳活動的發展概況，將文學研究加入，試圖分析戰後至 2024 年裡累積的登山書寫作品，進行整理、歸納、分析。而筆者根據《臺灣登山史·總論》將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 1949-2001 年、2002-2024 年，從登山發展的外部環境與文學發展的脈絡相互映照，用以開展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研究新頁。

以下依序簡述各章內容：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與架構安排。

第二章為「探險的多重奏：論 1949-2001 年的登山書寫」，分為四節，從文本的分析，探討 1949-2001 年間登山書寫的發展狀況，首先回望日治時期的高山紀行作品，當中的探險精神、學術性登山影響臺灣登山書寫深遠，接著從政治環境說明戰後初期登山書寫稀少的原因，並以登山場域分為本土、海外，就當時的社會背景、時代特色進行文本探討。

第三章為「多元的書寫礦脈：論 2002-2024 年的登山書寫」，分為三節，論述 2002-2024 年間的登山書寫，隨著山林開放、資訊普及，臺灣進入登山熱潮時代，登山書寫亦隨之豐富多元。第一節探討登山的契機、登山教育的推動，第二節就作品的文體形式進行分析，第三節根據高山職業從事人員的作家職業別，討論生態、學術等的山岳面向，針對此時期的作品，剖析多元題材和背景經歷展現的深刻內涵。

第四章為「臺灣現代登山書寫反思探討」，分為兩節，主要就臺灣登山書寫與社會文化的互動，探討延伸的議題，第一節從女性登山書寫論述性別、身體與空間，第二節從歷史變遷與文學脈絡，討論集體書寫而成的山岳意象，進而形塑的地景。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整體研究成果，並提出後續能開展的研究方向、可能性。

第二章 探險的多重奏：論 1949-2001 年的登山書寫

本章主要藉由作品的探討，論述 1949-2001 年登山書寫的發展狀況，以 1979 年政府開放人民出國旅行為劃分的依據，並以 2001 年國內山區管制規定改變為止，將這期間的作品以登山者攀登的山岳場域分為臺灣本土與海外進行討論。

1949 年政府頒布《臺灣省戒嚴令》，包括集會、結社、出版、旅遊等受到管制，當中入山與地圖使用亦屬於管制項目，一般民眾無法輕易進入山區，臺灣的登山活動一度呈現停滯的狀態。1959 年 1 月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訂頒〈臺灣省戒嚴期間山地管制辦法〉，人民均須向山地警局申請，才被准許入山。在申請入山程序嚴格的時期，特許社團的成立造就臺灣登山史走向豐富的途徑，有經過特許的社團申請、登記才能進入山區登山。直至 1978 年 12 月，政府修改出入境政策，放寬人民出國的限制，出國旅遊的人數逐年遞增，而臺灣的登山也在八〇年代進入海外遠征，帶動海外攀登的熱潮。2001 年 12 月 25 日，內政部及國防部放寬「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攀登 3000 公尺以上高山，不再需要高山嚮導隨行，此後臺灣的登山活動朝向自我負責的活動型態。¹

在 1949 年到 2001 年這五十年間，由於外在政治環境與臺灣政權的轉移、形塑，臺灣的登山作品在有限的條件下，仍持續增長。「山岳」空間存在權力的縱橫，看似是自然空間，實則有著隱性權力、和意識型態。戰後國民政府遷臺，為穩定政權，將臺灣山林劃為禁地，並利用山林資源以達反攻大陸之用；這與日治時期政府為政治所需，派任學者進入臺灣山地進行生態、原住民族研究，方法不同但背後的精神蘊含是一樣的，山岳空間是政權鞏固的手段。隨著政策的逐漸放寬，人民才有機會深入臺灣山區，開始用實地踏查、挑戰登山的形式認識臺灣這片土地。1979 年以後，人民得以觀光出國，在臺灣百岳熱潮之後，登山者開始往國際出發，攻克世界名山，臺灣也在各地的山峰留下彌足珍貴的身影，海外攀登的熱潮，與國際登山接軌，登山的型態變得更加多元，技術型、雪登、溯溪型登山等，使得登山大放異彩。

¹ 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總論》（臺北：營建署，2013 年），頁 226。

第一節 開始之前：日本帝國凝視下的高山紀行

在進入戰後初期的登山書寫前，須回溯日治時期的登山活動內涵，以探得政權轉移後臺灣的登山書寫發展之延續與轉變。日本政權為掌握自然資源，在臺灣高山從事各種學術調查和探險工作，發表多部紀行著作，諸如：伊能嘉矩的《台灣踏查日記》、鳥居龍藏的《探險台灣》、森丑之助的《生蕃行腳》與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等，²這些學者攀登臺灣山岳，進行地理水文、動植物生態以及人文歷史研究，建構知識體系，紀錄臺灣過去真實的高山樣貌。日本以探險家的科學考察報告掌握山岳資訊，達政治之目的，「權力」作為承繼的核心。而臺灣的登山書寫深受日治時期留下的高山紀行作品影響，為瞭解臺灣過去的歷史提供豐富的資料，臺灣戰後的登山書寫也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下展開，以日本學者的著作為參考，探勘登山路線及古道，認識臺灣高山的生態，並習得探險、學術的精神。本文將從日治時期的高山紀行開始，以更完整關照臺灣登山書寫。

一、任務型高山紀行

「探險」(exploration) 一詞最早出現於十六世紀，初意是為發現而探查，至十七世紀衍變為「探究或調查某個地區」之意。而近代的探險活動，是為尋求與研究未知的事物，探求未知的背後實則蘊含權力拓展與資源掠奪。日治時期的登山活動帶有殖民統治意味，經常使用「探險」、「踏查」詞彙，彰顯殖民者的帝國主義，臺灣作為日本的附屬地，「山岳」更是可掠奪的資源，日本政府在臺灣山地進行土地測量、開闢理蕃道路、開發山林等手段，打開通往高山的道路，將臺灣山區透明化的措施富含濃厚的殖民意識。固然日本在臺實施體育教育，推動近代登山的發展，將登山帶入校園，形塑登山的新意義，卻不能忽視統治者探險中的「征服」。是以日治初期的登山活動，是伴隨著日本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潮，將歐美的理性標準當作普遍判準，並以西方科學當作知識典範，建構出臺灣最初的登山活動形態。³

² 上述著作都由楊南郡譯。2021年重新出版《台灣調查時代(1-5冊)》，包含台灣調查時代1：《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台灣調查時代2：《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台灣通信〉選集》、台灣調查時代3、4：《台灣踏查日記(上、下冊)——伊能嘉矩的台灣田野探勘》、台灣調查時代5：《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以及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臺北：玉山社，2000年)。

³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

日治時期，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受官方委任，負責生物地理、原住民文化學術調查，在人類學方面，森丑之助則陪同鳥居龍藏進行多次冒險犯難的調查行動，如玉山主峰的首登、清代八通關古道的沿線部落訪查，從中學習調查方法與攝影技術。⁴鳥居龍藏在《探險臺灣》中，紀錄完成由嘉義端上新高山的首登：

我和同行的七名蕃人準備從西側翻越新高山到東側。行動中七個蕃人個個背負著重擔，每人手執一支槍，輕快地攀登斷崖壁，使我大為驚嘆他們的神勇。那天站在新高山頂時，由於天氣朗而受託於地學協會，我向四周拍了很多照片……連拍荖濃溪、東流的（拉庫拉庫）溪、西部濁水溪、阿里山草地，以及連綿的群峰，感覺很快樂。⁵

這次的踏查活動更是標誌著「我們日本人的人類學研究，已經延長到台灣新高山頂，我們期盼將來的研究領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⁶帝國主義下的登山活動將新高山視為權力支配的延伸象徵指標，通過文本政治展現。

此外，鳥居龍藏首次將攝影技術應用於人類學和考古學做調查，除了拍攝高山上的環境之外，也藉攝影機拍攝即將消失的民族。他在臺灣中部埔里族群調查時，發現「埔蕃」和「眉蕃」幾近凋零，他說：

埔蕃已失去土地，現在只剩五個人，這五個人一旦去世，這一族就滅絕，所以我有義務研究他們，把他們的真實面貌和身體攝入鏡頭裡。……眉蕃只剩三個人，我努力尋找的結果，只找到了一個約八十歲的老婦以及兩個已混血的人。這位純種的老婦 Avon 已老邁不堪，將不久於人世，一旦她去世，那麼眉蕃這一族就會滅絕消失。我為了搶救即將滅族的最後身影，也為了今後的記錄，從各角度拍了 Avon。正如澳洲已消失的塔斯馬尼亞人，將來這些照片就成為人類學的唯一好樣本了。⁷

鳥居留下百年前臺灣各族群的面貌、衣飾、生活等照片，影像的價值體現於現代

文，2004年），頁31。

⁴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2004年），頁33。

⁵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探險臺灣》（臺北：遠流出版，1996年），頁318。

⁶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探險臺灣》，頁517。

⁷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25-26。

研究的珍貴記錄、資料，影響深遠。官派性質的研究工作動機明確，鳥居的通信文稿或報告記錄，如實地寫下臺灣考古學、人類學的踏查成果，記載內容屬學術報告性質，顯少呈現個人感受與登山踏查過程的情感抒發。⁸

相較於鳥居龍藏定點式觀察、客觀調查記錄，森丑之助有更多的文字描述登山踏查的沿途和風景：

站在前峰頂上，海拔三四六一公尺，正好和新高山主峰相對，首先拍攝全景，然後走到瀑布的地方……。今天預定要登絕頂。早早起床，做準備後開始從瀑布處登高。爬得越高，植被越少，苔蘚也不見了，眼前只有崩落的粘板岩磊磊，殘雪更多更厚，踩著白雪……。然後沿著主稜走向中峰，最後於十一點登頂，大家歡呼「萬歲」三次。⁹

與鳥居龍藏同時從嘉義方向登上新高山，書寫登山沿途的植被變化，以及景色描述，值得注意的是森丑之助延伸到植物學的調查。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有用植物調查科」的委任，加上他個人的志趣，投身於臺灣山地植物調查，經常深入前人足跡未至之地調查森林，並採集植物標本，發現許多新品種，比如在清代八通關古道首次發現臺灣五葉松，植物學家佐佐木舜一曾說：

筆者認為森氏最大的功勞，在於植物採集的艱鉅工作，在蕃雲瘴雨的年代，縱橫於中央山脈採集高海拔植物標本，從明治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的三年期間，勤奮工作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殖產局所累積的高海拔地帶植物標本，幾乎全是森氏冒險採集回來的。早田文藏氏所著的《台灣高地帶植物誌》及《台灣植物誌資料》主要的素材都是森氏所提供的。¹⁰

足見森丑之助對臺灣植物學研究的貢獻。為人類學調查、地理學探勘和高山植物採集，多次深入中央山脈橫斷探險，在當時沒有地圖指引，全依憑於他調查行動的足跡，逐步描繪地理踏勘成果、部落分布與生活型態的第一手資料。

日治初期的學者肩負日本帝國的官方命令，專注於學術調查，以記錄踏查報告的成果形式為主，與大自然的互動與書寫較少。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的臺灣探

⁸ 余峻銘：《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中的台灣山林書寫》（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頁30。

⁹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269。

¹⁰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59-60。

險調查行動，不但涉獵了人類學、植物學、地理學等學問範疇研究，更將探險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不畏懼迂迴顛簸的山路、語言不通的原住民，在黑暗時代大探險。

二、高山紀行文學的確立

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為博物誌、高山文學作品，被譽為「臺灣山岳文學經典巨作」，承繼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的學術研究及精神，走出自己的文學書寫特色。鹿野因熱愛山林而登山，來到臺灣後熱衷於高山攀登，投入學術踏查工作，起初並非官方派任，而是出於對自然山林的嚮往，他在《山、雲與蕃人》的序中提到：

當時台灣蕃地呈現一片荒煙渺茫的景象。那高聳的山、蒼鬱的大森林、種類繁多的生物相，以及蕃人的山上生活所交織出的群山世界，把我迷住了。在台北高校完成學業後，我回到東京升學，這十多年來我雖然住在東京，但是每年都前往台灣接觸那邊的山，我對台灣群山熾熱的愛戀，至今未曾停息。

11

來自自然的召喚觸發鹿野對群山的眷戀，而這份獨特的情感讓他看見臺灣廣袤山林的豐富世界，關照動物地理學、民族學、人文歷史等的多重視野。

本著昆蟲採集與登山的興趣，加上掌握現代知識的能力，《山、雲與蕃人》不像早期博物學者的學術踏查報告，以描寫自然和人文知識的取得過程，或解釋第一手資料的內容為主，鹿野能將固定下來的臺灣博物學的現代知識，自然且靈活地融合，運用在高山採集之旅的過程。¹²他以西方分類學的命名方式說明植物物種；從民族學的角度認識原住民的人文，並與之交流互動；又藉地質學的專業知識，介紹臺灣高山的地形：

同樣是露岩的東峰絕頂就在附近，我看到它的岩層有奇妙的傾斜和走向，可

¹¹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32。

¹² 高嘉勵從日本博物學的現代知識形成過程分析西方博物學作為科學學科建制的模式，影響文明開化後的日本，博物學背後的西方科學和技術是將日本改造成現代國家的關鍵，也由於日治時期日本與臺灣的殖民政治關係，將博物學的知識體系帶進臺灣。高嘉勵：〈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行旅書寫 日治時期「自然」的現代知識建構與美學表現〉，《中外文學》45 卷 1 期（2016 年 3 月），頁 119-165。

以想見遠古年代造山運動中，玉山東峰曾經遭受一波波強大的褶曲作用。發現這一個事實，真會讓地質學者十分驚喜。……在臺灣高山竟然能發現漣痕，恐怕是頭一遭罷，……漣痕暗示著它所生成的年代究竟是屬於何種環境狀態。因此漣痕的發現，像是給地質學調查的人一把解開地質謎題的鑰匙。¹³

他的高山學術踏查在當時屬於學術界的新發現，現代知識的建構對臺灣高山的研究有了新的進程。

鹿野忠雄的書寫擁有深厚的學術知識支持，兼含有文學的寫作技巧，吳明益在耙梳臺灣自然書寫的歷史脈絡曾說：「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是當時難得一見的感性科學調查著作，知感交融的筆法，與對山林自然的崇敬之意，已與後來臺灣自然書寫的模式十分相近。」¹⁴鹿野可謂是臺灣自然書寫的先驅，為後人樹立典範，並展現不同於日治初期的學術踏查報告之行文風格。吳福助就文學觀點，提出此書高山自然描寫手法的特色：一、使用擬人法，描述時刻變化的山貌；二、渲染富麗的色彩，予人繽紛的視覺印象；三、刻畫登山心理，展現人物內心世界；四、灌注熱烈的情感，形成雄渾的風格。¹⁵這些描述手法印證他受到山岳自然的直接召喚，以及人類主觀情感的投入：

走出森林後，小徑又接上緩稜，這時四周豁然開朗，地面密生著低矮的高山芒，群落成草原，有幾棵台灣二葉松木拌生於其間，展示著優雅的枝葉。樹下綠床有花色白淨的台灣百合群落，台灣龍膽那楚楚可憐的花朵也探出頭來，非常熱鬧。這些花木頻頻拉扯我的衣袖，好像有意邀我停下腳步來欣賞她們。

16

將植物擬人化的修辭運用，表現人在登山過程中與生物的互動，更是強化與自然融入的美學展演與哲學思索：

馬利加南山的登頂看來唾手可及。我坐在一塊冰冷的石頭上，靜靜地享受原始的寂靜。我的心靈似乎自由自在地遨遊於曙光中，暫時委身於故事首尾不

¹³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2-73。

¹⁴ 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新北：夏日出版，2012 年），頁 192。

¹⁵ 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 2002 年），頁 66-81。

¹⁶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01-102。

聯貫的一個夢境裡。我側耳傾聽著：起自溪谷的風好像在大地吐息；樹叢中的頭烏線用婉轉的鳴聲向我傾訴；大地上只有風聲和鳥鳴聲能夠打破自太古以來的「原始的靜謐」。……晨風獵獵，旅愁乘著晨風湧上心頭，我不是在依戀久違的繁華都市，而是自願踏進最深入的蕃地，被山的崇高與原始擁抱時，發現自我的歡樂。晚開的玉山蒿草垂下沈甸甸的花穗，每個花瓣都用不同的表情，溫柔地注視我。¹⁷

攀登高山的過程或登頂後，是他靜靜地凝望並享受與山之間的互動時刻，在彰顯高山原始情感的召喚，既具體又抽象的描繪，營造身心靈全然融入的世界。當然其中不免透露其意識形態，鹿野徜徉於臺灣高山，創造許多首登紀錄，征服山岳除了有自我實現的目標追求，背後存在帝國主義的征服意義。

日治時期的開拓探險，是為服膺於日本帝國的政治需求，派任學者入山從事學術調查，是為掌握自然資源和高山原住民的途徑，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的學術踏查記錄、報告，將臺灣山區透明化，他們以人類學、植物學、民族學等的博物學知識體系建構臺灣的高山。日治中後期的鹿野忠雄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加上文學手法，成就高山紀行文本的情感與美學價值，開創高山紀行書寫的新方向。學術踏查的探險精神，以及日治時期的高山紀行書寫的形式：登山日誌、博物學知識的結合，影響戰後臺灣的登山書寫。

第二節 戰後初期的高山紀行（1950-1970 年代）

由於臺灣特殊的政治環境與歷史脈絡，只有少數能進入山岳者掌握山岳的話語權，戰後國民政府實施戒嚴，臺灣的登山活動受到管制，延續日治時期的對高山的態度，作為政治手段和資源取得，人與山的關係是疏遠、陌生的，是故下文首先說明這段過渡的歷史，臺灣的登山活動發展如何從封閉走向開放？以及登山意義的轉變。而登山書寫的部分，1950、1960 年代為臺灣當時經濟發展的農業政策，政府單位派任程兆熊前往臺灣高山資源考察，他帶領學生進行高山地區的調查工作，找尋適合種植溫帶果樹之地，並著有一系列高山紀行作品，具有探險意義，他的書寫帶有學術性與中國文學語彙移置的特色，以文字留下臺灣早期高山地景的面貌。

¹⁷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06。

一、過渡的歷史：從封閉走向開放

林玫君認為「1905年11月是臺灣登山史上的轉折點」，¹⁸登山從殖民統治的工具逐漸轉向趣味登山，起源於總督府參事官大津麟平成立「新高登山會」，聘請原住民搬運登山用具，帶領團隊攀登玉山。隨後在1915-16年間日本政府組設「臺灣登山會」，帶動趣味登山，高山不再是苦行或不可及的夢想，1920年後登山成為熱潮，於1926年成立「臺灣山岳會」（被認為是戰後「臺灣山岳協會」的前身），透過演講傳遞專業的登山技術與知識，並開發新路線供大眾，登山成為更普及且休閒的運動。日本政府對此的態度是認為從事登山活動需要有強健的體魄，正好符合戰時宣揚的帝國精神，以此機會展現好國民、好青年的形象。以日本帝國之眼形塑的山岳活動體現殖民的權力支配，山岳是政治手段，探險身後的征服符碼、趣味登山隱藏著帝國精神。

戰後臺灣的登山活動受到管制，山岳依舊停留於權力政治層面，而民間受到嚴格的山區管制，只有特許社團才能申請入山，經過特許社團的努力，正式揭開臺灣近代登山運動的序幕。登山成為一種探險、挑戰、休憩的運動，臺灣人民走進山岳，由於日治時期的殖民，臺灣的山岳不屬於臺灣，殖民者的地理暴力使得臺灣人在山岳中是缺席的，藉由登山試圖認識臺灣這片土地，凝聚認同，並思考與大自然的互動。

戰後的臺灣登山活動，「再探險登山時期」（1946-1981）近四十年間以探險的形式對全臺各大山脈、山岳進行勘查與踏查，¹⁹制定高山地圖、路線，為過去戰後的破壞以及日治時期資料的散佚，來重新瞭解臺灣的山岳。1970年代百岳運動與高山縱走會師蓬勃興盛，標示登山成為目標，用以挑戰自我。

自1951年首登玉山起，登山活動始復甦，²⁰玉山在日治時期改稱為「新高山」，光復後的玉山首登有不同的政治內涵，臺灣不再屬於日本的殖民地。新山區探險階段以「首登」開闢山岳，²¹留下記錄以建構登山的知識。李希聖與羅時成的著作對「戰後首登」進行詳盡的梳理，以臺灣各主要山脈（玉山山脈、雪山

¹⁸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臺北市：玉山社，2008年），頁40。

¹⁹ 依活動內容可定為「再探險登山時期」（1946-1981），若按登山活動發展，可再細分「新山區探險階段」（1946-1972）與「百岳推廣階段」（1972-1981）。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總論》，頁64。

²⁰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臺北：李希聖，2005年），頁7-8。

²¹ 此指的首登為戰後時期以後，日治時期已有首登記錄，不在本節的探討範圍

山脈、中央山脈)為軸心並進入各山峰踏查,²²從近郊路線逐漸深入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登行。《臺灣山岳》雜誌每月刊登登山路線、規劃,帶動大眾登山活動。主要記錄客觀的數據,如有文中記載:「經過一小時又半,才爬上 3440 公尺峰,此峰恰在三叉山與向陽山當中,係一美麗的獨立岩峰,然而一直未被岳友們青睞取個芳名,為之我們心裏不平,遂將此山命名為『向陽山北峰』。」²³除了登山時間、高度,也呈現探險的未知性,遇到尚未命名的山。

這個時期有許多登山者在登山環境的貧瘠和設備的匱乏條件下,仍努力披荊斬棘地登山,嘗試開展臺灣登山的新頁。

二、開闢與移置：臺灣山地紀行探險

翻閱 1960 年代以前的高山書寫數量極少,程兆熊(1907-2001)是當代思想家、臺灣有機農業及生命科學園藝先驅,被稱為「臺灣蘋果之父」。在 1950-1960 年代進行山地園藝資源調查期間著有《臺灣山地日記》、《高山族中》、《山地書》與《臺灣山地紀行》四本書,而 1973 年回臺視察後,以行記及地景詩書寫《高山行》一書。²⁴摘逢臺灣農業政策的發展,程氏從事山地資源調查的動機是為證明臺灣是可以種植蘋果等落葉果樹,故受農復會委任,帶領師生寒暑假期間入山地園藝資源調研,²⁵開啟臺灣山地落葉果樹種植的創舉,關注生態環境,改善山地居民的生活條件,更促進對外農業貿易的經濟發展,其地位舉足輕重。

戒嚴時期進山需要入山證,唯有經申請,方能進行攀登、調查和攝影,在高山與平地涇渭分明之下,程兆熊的高山紀行展現臺灣最為原始的面貌,其學術調查精神正好貼合日治時期的學者,以科學和嚴謹的態度看待,綜覽他的作品,高山紀行書寫模式多元,有日記體、散文體、書信體與地景詩等形式,忠實呈現行走於山地的過程,兼將其哲儒道禪等思想放諸文字中,孕育獨特且豐富的山地書寫。

²²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頁 1-88。以及羅時成:《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64-105。

²³ 林文安:〈新關山—向陽山縱走〉,《臺灣山岳》11、12 月號(1965 年 11、12 月),頁 7。

²⁴ 重刊發行程兆熊作品集,程兆熊:《臺灣山地日記:橫越合歡山兼記太平山 大元山之行》(新北:華夏出版,2023 年)、《高山族中:臺灣宜蘭山地之行》(新北:華夏出版,2022 年)、《山地書》(新北:華夏出版,2022 年)、《臺灣山地紀行》(新北:華夏出版,2022 年)、《高山行》(新北:華夏出版,2022 年)。

²⁵ 為中興大學(前身為臺中農學院)園藝系的創系系主任,受農復會的支持與協助,帶領師生做山地調查、建實驗果園等建設。

為在高山地區辦果園，涉險在人跡罕至、交通不便的高山地區前行，如當時台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山地、²⁶合歡山等地，建立霧社山地實驗果園，程兆熊在高山極度原始的環境下設法開天闢地：

在那原始闊葉林中，自然不會更更有著什麼道路，一進入到那裏面，你就不能再辨別著東南西北。到處是樹木，而且還會是大小相似的樹木，不僅看不出四周景色，就連天空都只能隱隱約約的見出一點。耳邊所聞到的，自然也有一些聲響，只不過風聲、落葉聲、鳥獸類之聲和一些不知名的聲音，相互夾雜著，聽來真是森森然，冷冷然。在進入到那裏以前，你可以因為爬山，爬得滿頭大汗，但當你進入到那裏面以後，不久便會感覺到煞是清涼。你行走其間，要是忘了作著一種記號，你會不知道回來，不能夠出來。……說到這裏，你就可以瞭解著凡是進入山地和進入深林中的人們，總須得隨時佩著一靶刀在腰間的緣由。²⁷

於原始森林中探險，探路、找水是建立果園的先決條件，不斷地爬山、摸索與探路，同時也可見程氏與高山族人的互動，聘請山胞帶路、背行李、負責日常整理事務等，仰賴高山族的協助。從無到有的開發探險工作彰顯高山紀行的艱苦。此外《山地書》一書為書信體，由「你」的行文分析是由山林間寄出的信函，第二人稱的書寫更能帶領讀者身歷其境地感受高山冒險。

程氏將山地踏查過程以時間順序與路程書寫，紀錄山地道路、山林地景，還有山地人文的印象，觀察原住民部落的生活型態、活動實況等，為早期原住民人文、習俗留有珍貴的紀錄。除了山胞嚮導從旁協助，調查團隊的自力更生與分工合作，展示了學術秩序：

我們中間有的測海拔高度，有的量溫度，有的檢驗土壤酸度，有的照相，有的訪問，又有的採集。關於採集工作，則又分特用和食用作物以及果樹、蔬菜、花卉等。還有從事一般調查的。路上行走，特別設了一個總指揮，由我指定一位教授擔任，又設了一個隊長，由同學自己選定一同學擔任，此外還

²⁶ 調查團隊在台中縣行經路線即為日後中部橫貫公路西段的路線，在南投縣仁愛鄉則為日台 14 線及力行產業道路，在信義鄉則為台 21 線中段，在當時僅為山地保留區之部落間道路，彼時尚處於原始、尚未開發之地。

²⁷ 程兆熊：《山地書》，頁 84-85。

選出了管理各色事務的同學，如管伙食，管交通，管會計，管醫護等等。²⁸

強烈的山地調查使命感帶來的是負責的態度，在荒山野嶺更能團結一致，完成山地園藝資源探勘。另外程氏擺盪於異鄉 / 故鄉的高山之間，在戰亂流離之際來到臺灣，走入深山，回到香港後再返臺灣，藉題高山行抒發：

亂離之際，戰火之中，或迫而遊之，或遁而遊之，或偷閒而遊之，或悶悶不已，知其無可奈何而遊之。遊之之後，每以為樂，惟終非樂山而遊之。及來寶島，越嶺爬山，乃愈多而愈高。迨一度居港九時，因高山未見，雖見一獅子山，亦每留連忘返，成書數冊。去歲返臺，見舊時所爬之山，更有「不圖今日得復見漢家威儀」之慨，雖在風雨之中，亦已行走，固不僅「高高山鼎立」而已。²⁹

與山的關係隨著經歷的漂泊、時代的變遷而有了不同的想法，並注入程氏自身的儒學涵養，添加文哲儒佛之學的細膩體察，使得其高山紀行著作富有哲學層次。

程兆熊的高山探險內涵是為臺灣經濟發展、農業政策，在政府扶持的政治視角下，呈現戰後初期臺灣人民以自身的專業眼光形塑高山面貌，通過文字保留原始的山林地景、人文紀錄，並挖掘農業的新可能。就登山書寫而論，他的高山紀行有著日治時期的高山書寫模式，而又以更多種的寫作形式書寫，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元素的進入，除了中國哲學的思辨，其行文更帶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意象和特色：

只是在獨立山的原始林中，你所看到的老樹和大樹，甚至是小樹，常常是長滿了青苔，或一些其他的寄生物，樹枝上又常是掛著很長很長的絲狀的寄生物，隨風飄來，又隨風飄去，藤類更是從這一株大樹或老樹，爬到那一株大樹或老樹上去，有時還會使你分不出哪個是樹，哪個是藤，就這樣，讓一片樹林，形成了無數的銀色的柱，又懸著無數的奇異的綠彩，更連結成一氣，看過去真像是一種童話裏的世界，又像是一種神話裏的世界，這用我們民間的傳說，就是神仙世界。在那裏，你會好像遇見韓湘子，在那裏，你也好像遇見何仙姑，而山地裏的男女，竟又像是那樣的仙話裏的人。³⁰

²⁸ 程兆熊：《臺灣山地紀行》，頁 5。

²⁹ 程兆熊：《高山行》，頁 33-35。

³⁰ 程兆熊：《高山族中：臺灣宜蘭山地之行》，頁 120。

以神話世界、韓湘子、何仙姑這類中國文學的語境形容原始森林的情境，也以唐僧取經來形容山地調查的隊伍，來營造中國式獨有的語境，對當時甫遷臺的國民政府，移置的語詞描述會更有想像的依憑。在封閉的環境中，程兆熊一系列的高山紀行以文學之筆和哲學之思書寫高山行的艱辛、所見所聞，可視為戰後臺灣登山書寫的開端。

第三節 本土的登山書寫：朝向學術化

1980 年代登山書寫走向學術化始自百岳熱後的疲軟，楊南郡思考臺灣登山運動該走向何處？在評論《丹大札記》將學術化的概念訴諸於文字，可見其想法：

對山岳界而言，國內的登山運動已經出現瓶頸：各地的山頭都有登山客的足跡，登山的路線不論是縱走、橫斷、溯溪或是岩雪攀登，也都逐漸被開拓出來，海外登山十多年來開始有更大的突破，因此整體來看，雖然不斷有路線變化和技術引進，使活動仍有蓬勃的樣貌，但在大方向上卻有隱憂，登山運動到了發展的轉捩點。如果參考國外狀況，其實不難發現，我們已經背離國外登山運動 (Alpinism) 的走向。國外登山運動的走向是如何呢？簡單的說，就是登山學術化。藉著登山，從橫面空間性的認識到縱向時間性的瞭解，也就是深入地區內的地形水文、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從實實在在的田野見聞中建立知識的基礎。³¹

熱衷於登山的楊南郡，於八〇年代對登山有新的體認，提倡學術化登山，認為「廣大的台灣山區並非一片空白，而是自古以來人文現象未曾斷絕的地方。」故著重於古道探勘，重現歷史；以報導文學形式書寫；並譯註日治文獻典籍著作，從這三方面建構登山書寫的系統。楊南郡的古道調查系列書籍，與妻子徐如林共同書寫，著有《與子偕行》、《尋訪月亮的腳印》、《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等書籍。³²田野調查結合歷史文獻的深度報導文學作品，重現臺灣高山的歷史映像。而臺大登山社也展開深度的學術探勘，代表作有《丹大札記》，³³深度探勘臺

³¹ 徐如林、楊南郡：《尋訪月亮的腳印（紀念典藏版）》（臺中：晨星，2016年），頁38。

³² 楊南郡與徐如林合著出版，1993年《與子偕行》、1996年《尋訪月亮的腳印》、2007年《最後的拉比勇》、2010年《大分·塔馬荷：布農抗日雙城記》、2011年《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2014年《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2016年《合歡越嶺道：太魯閣戰爭與天險之路》。

³³ 《丹大札記》出版於1999年，本文採用2021年再版之版本。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臺北：玉山社，2021年）。

灣高山，無疑展開學術化登山書寫的新局面。

一、真實與想像：古道探勘的報導文學

楊南郡跟隨著日本學者及民住民的路線登山、踏查古道，徜徉於高山、人文與文字，以報導文學的形式將踏查結合歷史與人文，他的書寫呼應學術化登山的特性，又以虛構的手法書寫報導文學，表現出文學性。

（一）以古道書寫歷史

「古道」在臺灣一般的概念為「使用年代悠久，距離很長的舊道。」楊南郡認為臺灣的古道是臺灣開拓史的重要縮影，³⁴古道承載臺灣過去的歷史，作為古道探勘先驅，在前無古人的情況下，他提及古道踏查的困難：

不行、不行，我們完全沒有清代八通關古道的任何資料！」楊南郡急著拒絕：

「合歡越嶺古道有很多日本人留下的資料可以參考，而且我們原本也走過幾段路。但是，我們完全不知道清代的八通關古道在哪裡？」他進一步解釋說：

「日治時代的地圖並沒有畫出清代八通關古道的路線，而且清朝的地圖就像山水畫，完全看不出來路在哪裡。唯一描述八通關古道路線的文獻，是羅大春奏摺，他提到道路經過的地方，都像《西遊記》裡的地名：鐵門洞、雞公山、粗樹腳、雙峰刃、雷峰洞、神仙嶺……根本不知道指的是哪裡？總之，我們沒辦法調查啦。³⁵

為完成八通關古道調查，楊南郡花費兩年時間深入高山，探勘古道，在布農族老人的帶領下找到清代營盤遺址及被土石掩埋的古道，最終才修復八通關古道的歷史。楊南郡藉古道書寫臺灣史，在資料稀少的條件下，依然投身於古道探勘，實地探勘及丈量道路，大量閱讀文獻古籍資料，為展示古道背後的人文寶藏。

楊南郡以橫面的空間與縱向的歷史，深入高山內的地形人文、風土人情與歷史文化，以《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為例：

³⁴ 並將臺灣的古道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某個族群為某種目的的自然形成銜接自己的文化區域道路，如社路和隘路（隘勇線、隘勇路）；二是統治者為經濟或政治目的而開鑿的官道，如清代的開山撫番道路即日治時期的理番道路（警備道路）。楊南郡：《臺灣百年前的足跡》（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140。

³⁵ 徐如林：《連峰縱走：楊南郡的傳奇一生》（臺中：晨星，2017年），頁165-166。

沒有一條道路能像浸水營古道一樣，激發人們這麼多的思古之幽情。這一條道路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500 年前，被稱為卑南王的卑南族總頭目，威震臺灣東部與南部各原住民族的時代。500 年來，卑南族、排灣族、荷蘭人、平埔族、漢人、日本人，利用這一條路探金、納貢、交易山產、訪親、山地探險、學術調查、移民、販牛、郵遞、傳教、行軍、赴任、征戰、討伐、山地警備、巡視、健行、山訓……，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在這裡。³⁶

他將歷史的縱深回到十七世紀的荷蘭統治時期；空間的範圍涵蓋臺灣南方，敘述原住民在不同時期與外來文化的碰撞，以及部落勢力消長的故事。憑著文獻記載、訪問部落耆老，在田野調查中挖掘發生在古道的歷史，並以描繪現況。

楊南郡如何以學術化登山書寫？比如在探究「浸水營」的名詞，他根據耆老傳說是形容此地氣候濕度極高，終年濃霧深鎖，物品經常濕漉漉的，猶如浸泡水中一樣。他發現最早出現在清光緒二十年的《鳳山縣採訪冊》，也從日本學者、地形風貌考究：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授移川子之藏的《臺灣土俗與人種》中曾在浸水營越嶺點前拍攝排灣族搬運物品走在古道的情況，照片及其文字說明如下：

「從高雄州崁頭啟程，橫越中央山脈到大武的山路上，有時遇到蕃人往來於途。仲夏，林中傳來喧噪的蟬鳴，此起彼落，似乎在迎送旅人。從溪谷湧上來的濃霧，瀰漫於原始林間。」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巡視浸水營古道時，高雄州廳長及各級官員都在此地迎接。

嚴格說起來，最能代表浸水營的特殊風貌，應該是從現在的浸水營古道步道入口算起，到大漢山與姑仔崙山間的鞍部，中央山脈越嶺點為止的 1 公里路段。地貌是力里溪源流區平緩的老年期地形。林下因大量腐葉堆積而不易透水，加上地勢平緩不易宣洩積水。

排灣族稱此地為 Chuwa Zarom，chuwa 是指地點，zarom 是水的意思。³⁷

他從日治時期的文獻資料發現浸水營古道的風貌描述，並以原住民的語言進行佐證。楊南郡作品呼應前述的學術化特色，從歷史文獻的記載、部落耆老之說，到實際田野考察、地形風貌的觀察，以追溯古道名稱的由來。他的深度探勘，將古

³⁶ 徐如林、楊南郡：《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臺北：農委會林務局，2014 年），頁 10。

³⁷ 徐如林、楊南郡：《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頁 316-317。

道上豐厚的人文史蹟訴諸於文字，現在行走於此，更能深切體認跨越時空的浩瀚感。

（二）報導文學的美學

閱讀楊南郡的報導文學書籍，比如《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³⁸、《浸水營古道》是根據真實史料，實地踏查事件場域，訪問相關人物，可謂是一部完整且真實的歷史，然而採用小說的文學手法，加入作者的主觀描述，從報導文學的說故事敘事、歷史敘事的特點，³⁹用以觀察楊南郡的敘事策略，可以發現他以歷史文獻客觀的資料引領，又加入以個人主觀的陳述，讓讀者有身入其境之感。

《能高越嶺道》是楊南郡踏查能高越嶺道，集結歷史、生態、文化而成的作品。能高越嶺道是通過中央山脈的心臟地帶，日治時代開通，從西端霧社算起到東端初音，全程 76.8 公里，有豐富的野生動物及壯麗的風景，並設有駐在所，為日治時期熱門的登山路線，民國五十年代起，政府修復能高越嶺道後，吸引登山健行者前來，沿途的景觀有奇萊群峰、檜木原始林等。除了有豐富的生態環境之外，能高越嶺道的歷史底蘊深厚，起點霧社事件爆發慘烈的霧社事件，還有國民政府修建東西向輸電線路的員工、協助開路和搬運的原住民之艱辛歲月，⁴⁰共同形成能高越嶺道的歷史。

在〈走在能高橫斷道路上〉中，楊南郡首先敘述大正七年十月期間，日本總督府官員和隨隊記者一行人的攀登歷程。他們繞過天長大斷崖，翻上稜線，抵達天長山駐在所海拔 1873 公尺的稜線上，三面深壑峽谷，展望非常雄奇。何謂雄奇？此處加入楊南郡個人的主觀形容，並配有圖片和故事性文字加強臨場感：

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從天長山駐在所往南望過去，在稜線的缺口上，賽德克族的起源傳說「白石」剛好就矗立在那裡。「真像一尊低首的觀音聖像呢！」

³⁸ 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會林務局，2014 年）。下文簡稱《能高越嶺道》。

³⁹ 報導文學的書寫對象，簡單地看，不外人、事、地、物，而其時間，則多為已經過去的日程，因此，與其說是「新聞」，毋寧更接近歷史敘事；但由於報導文學又處理仍有後續發展或正在發展的事件，因此又與歷史敘事不完全一致——這使得報導文學「說故事」的時間較諸新聞敘事，多了「昨天」乃至離昨天很遠的部分；較諸歷史敘事，多了「今天」乃至離今天不遠的部分。這是報導文學再敘事方式上相異於歷史與新聞的特質。林淇瀆：〈台灣報導文學的虛構敘事規約〉，《文史台灣學報》第 6 期（2013 年 6 月），頁 37。

⁴⁰ 參考自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頁 4-7。

官員與記者們嘖嘖稱奇，很自然的雙手合十膜拜起來。⁴¹

之所以能如此詳實的陳述，除了有歷史文獻典籍資料之外，還有楊南郡的親自踏查，他融合攀登困難、地形陡峭、視野展望以及宗教信仰的元素，譜出雄奇的景觀和氛圍，以致於在書寫史實不會太枯燥。

另外，楊南郡親自造訪這個已經消失在歷史舞台的能高橫斷道路，經由部落耆老的指點，找到曾經輝煌的歷史遺跡：

歲月不饒人，當年強壯得像一座山的老獵人，因為痛風關節嚴重變形而截肢，如今只能坐在輪椅上。然而，他的記憶力還是好極了。靠著伊勇瓦沙奧的記憶，我們找到州廳界標的遺址，也發現已經從地圖上消失的聯帶山駐在所，還留著二根帶著榫孔的檜木柱；在一大片紅檜巨木群的包圍下，森中駐在所雖然已經倒塌，跡地還有五公尺長的石壁、二個水泥灶，無數的檜木柱和白鶴清酒、櫻花啤酒、野田（龜甲萬）醬油瓶。⁴²

日本軍方考量冬季積雪，不利軍隊調動，因而摒棄能高橫斷道路的越嶺道。楊南郡深入這條被廢棄 77 年的舊道，走在雜草叢生、殘垣斷壁的山路中，又有原住民耆老的幫助，成功找到塵封已久的遺址，同時人物凸顯歷史現場的真實性。楊南郡結合田野調查、歷史文化的報導文學，將古道上的歷史生動展現，也將高山間不為人知的故事、遺跡呈現於世人眼前。

吳明益審視楊南郡作品的文學性，他認為楊南郡親自踏查古道，訪問部落耆老，以虛構的筆法書寫報導文學，具體表現所謂的「行動者的美學」：

我並無懷疑，我再無懷疑。

楊南郡作品裡的「文學性」，還是一種行動者的美學。早在與徐如林合寫《與子偕行》時，劉克襄在當時就已經指出了楊南郡和傳統登山界走了不一樣的一條路。過去登山界是強調「溯溪、橫斷、縱走或是岩雪攀登」的路線，但「縱向時間性的瞭解」卻還有所不足。楊南郡決意走進「地形水文」、「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裡。他的書寫與踏查、歷史文獻探勘，三條路線並行不悖。⁴³

⁴¹ 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頁 124。

⁴² 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頁 131。

⁴³ 吳明益：〈楊南郡是一條路〉，《人社東華》電子報（2016 年 6 月）。

楊南郡的美學展現於實際的行動，以及長年對自我要求的美，開拓與探勘古道的探險精神，是站在宏觀的歷史上，試圖藉由現代的眼光，回顧或重現臺灣史，古道不再是遙遠陌生之地，而是能貼近臺灣人的生命。

在登山之外，楊南郡不遺餘力譯註日本學者的作品，若要關照完整古道的歷史，日治時期的相關著作能見證臺灣缺失的登山史。此外原住民與臺灣高山的緊密聯繫，成為研究之重，楊南郡翻譯日本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等書，⁴⁴瞭解原住民的生活、神話、宗教等對高山會有更深刻的解讀。楊南郡從早期探險家的著作裡蘊含的博物學等知識體系架構汲取，建構登山學術化，並一窺古道之奧秘，拾起那段散落歷史的碎片，拼湊並完整臺灣登山書寫。

二、登山社的學術性區域探勘文本

臺灣的登山型社團可追溯到日治時期，學校帶領學生登山，當時臺灣教育界對於登山活動塑造的健康、進取的形象，產生很大的迴響，各校紛紛將登山視為重要行事，鼓勵成立登山相關的社團。⁴⁵此將登山帶入校園的潮流，亦在臺灣大專院校盛行，如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文化大學等學校皆設立登山社，其中台大登山社於 1959 年成立，⁴⁶歷史悠久，又出版多部探勘記錄作品，

<https://journal.ndhu.edu.tw/%E6%A5%8A%E5%8D%97%E9%83%A1%E6%98%AF%E4%B8%80%E6%A2%9D%E8%B7%AF%E2%94%80%E2%94%80%E5%90%B3%E6%98%8E%E7%9B%8A/>。

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9 月 10 日。

⁴⁴ 相關的書籍有三本。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等著，楊南郡譯，魏德文編：《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原民會，2011 年）。馬淵東著，楊南郡譯：《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臺北：原民會，2014 年）。鹿野忠雄著，楊南郡、李作婷譯：《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臺北：原民會，2016 年）。

⁴⁵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43。

⁴⁶ 台大登山社成立於一九六四年，初期以郊山健行為主，並參與山地服務工作，逐步發展長程、大型登山活動與技術攀登。至一九七七年松蘿湖探勘成功後，中級山探勘成為活動重點；利用中級山嚮導訓練的傳承，探勘隊伍的持續耕耘，以「區域開發」為理念，先後完成宜蘭大濁水溪流域、丹大山區、白石山區及鬼湖山區的探勘，留下豐碩的山林紀錄。參見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扉頁。台大登山社已成立一甲子，組成分子為台大学生，來自不同的系所，每幾年固定鎖定特定山區進行深度的區域考察，比如路線探勘、人文歷史探究等，社員們集體著作，於 1991 年出版《丹大札記》、1997 年出版《白石傳說》、1999 年出版《南湖記事》、2003 年出版《南山山語》，以及 2024 年出版的新作《檜鄉夜語》，為目前臺灣學生社團中唯一出版多部作品的登山社，楊南郡認為「在台灣，像台大登山社能夠延續時多年，自行計劃，全力投注於隱藏著各種危險，但相當刺激的中、高海拔未探的山地，在登山運動史上卻是少見的現象。就這一點貢獻來講，我想台大登山社應該坐上第一把交椅。」台大登山社出入臺灣從未探得的處女地帶，以學生社團的傳承接力完成大規模的探勘活動，「這種學術性的登山活動，在早期臺灣登山史上是常見的，例如人類學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動物學的鹿野忠學等等，只是今日的學院式學者大部分都輕忽了直入現場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由學生組成的登山隊伍，得天獨厚地擁有不同科系的人才，在自然與人文學科上都得以發揮所長。」因此本文認為台大登山社具有代表性，出版的著作在登

以及古道研究者鄭安晞，曾加入政大登山隊，並從事登山探險活動，故本節以台大登山社、鄭安晞為例，說明大專院校與學術性登山之聯繫與內涵。

楊南郡曾擔任台大登山社的指導老師，在 1980 年代左右，年輕一代的登山者對當時臺灣山岳界的登山運動感到疑惑：臺灣重要的山峰已有登山者的足跡，且百岳熱使得登山變得更功利，熱衷於重複的登山路線，哪裡還有可以開拓的空間呢？楊南郡回覆：

當時議論最多的話題是國外登山的趨勢，由學生組成的隊伍，往往也肩負了學術調查的使命。例如喜馬拉雅山區的登山活動，當登峰隊員努力於攻頂的同時，在基地營的隊友也席不暇暖地進行天文、氣候、地理、植物、動物、原住民文化等的種種調查研究。

這種學術性的登山活動，在早期的台灣登山史上是常見的，例如人類學的烏居龍藏、森丑之助，植物學的川上瀧彌、佐佐木舜一，動植物的鹿野忠雄等等，只是今日的學院式學者大部分都輕忽了直入現場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由大學生組成的登山隊伍，得天獨厚地擁有不同科系的人才，在自然與人文科學上都得以發揮所長。⁴⁷

他指出其實臺灣的山岳還有許多空白地帶值得登山者去探索，大專院校登山社團的成立能提供年輕一輩者開拓，嘗試突破登山運動的瓶頸。台大登山社先天的優勢在於人數多、背景廣泛，有效地以探勘隊伍的形式進行探勘，臺灣的登山活動基本上都是點到線而已，如何擴及到面呢？唯有劃定區域，以深耕密織的方式，才能突破點線的瓶頸，走進以往未曾深入的處女地帶，⁴⁸楊南郡將之定向為「新拓山精神」。

得力於代代相傳的台大登山社，在傳承多屆後，共同完成學術性的新拓山運動，而譜出四部著作：《南湖記事》探勘昔有「臺灣亞馬遜」之稱的南湖大山以東山區；《丹大札記》親臨臺灣心臟地帶的丹大溪流域；《白石傳說》探索賽德克族孕育美麗神話的中央山脈白石山區，以及《南南山語》踏入魯凱族與排灣族古

山書寫中占有一席之地，學術性登山文本值得討論。參見台大登山社：《白石傳說》（臺北：正港資訊文化，1997年），序，以及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臺北：印刻，2021年），頁 10-11。

⁴⁷ 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頁 10。

⁴⁸ 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頁 10。

老神話環繞的大小鬼湖區域的。⁴⁹由大學生們合力完成的成果展現帶動全新的登山方向，以深度探勘取代趕路登峰，去挖掘尚被發現的山岳秘境。

其中《丹大札記》是丹大地區以濁水溪上游的丹大東、西溪為中心，⁵⁰介於太魯閣與玉山國家公園間，高山峻谷、地勢封閉，是臺灣最深遠之地。台大登山社組隊分批探勘，這群學生披荊斬棘勇敢地親臨現場，帶回第一手報導與照片，呈現臺灣最深入的山岳風采。展現了詳實的探勘紀錄以及人文現場，形塑富有自然誌的學術性登山文本。

為瞭解臺灣最蠻荒原始、罕為人至的丹大山區，台大登山社前期的準備功夫扎實，比如最重要的關門古道之東西段探勘，在前無古人的情況下，從清代的《花蓮縣誌》與日治的蕃地地形圖、〈生蕃地探險談〉等文獻試圖推敲地圖，然而湮滅無跡的狀況使得簡陋的資料無法依憑。關門古道保留著清代初開的規模，並無受到日本的重視與開發：

在快要越過 2700M 峰西側倫太文前鞍時，碰上二段共三十多階的整齊石階，這應是清古道痕跡吧！清朝與日本古道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清古道為便利行旅，修有很多石階，而日古道為拖砲運兵，皆採緩坡、吊橋或迂迴繞行，這可是最有價值的證據。……此時正當處於最艱苦的時刻，大家坐在石階上，舔著澀得要命的檸檬，杜修義掙扎取出相機，胡亂拍了幾張，累死了，無奈路還很長，爬坡、再爬坡。下午一點半翻過倫太文山，爬升 2700M 了，遠望對岸的關門山，右側突兀的關門北山及左方大石公的神石，而馬太鞍溪，就在腳下一千公尺處奔流。⁵¹

在登山的過程中發掘到古道的遺跡，供後續的延伸探勘，古道的石階、清兵營址和哨所，將古蹟遺址納入考察，並加入人文方面的考察。書寫過程詳實記述日期隊員所見所聞，前後之比較，客觀數據（如標高、行程時間），以及日後勘察的參考。

在艱困的登山行旅過程中，可見登山社學生對臺灣高山的地形、地質、動植物等的踏查記錄：

⁴⁹ 出版時間分別為：《丹大札記》(1991)、《白石傳說》(1997)、《南湖記事》(1999)、《南南山語》(2003)。

⁵⁰ 此書在 1991 年初版即受到廣大的關注，搶購一空。1999 年二版新增內容，又於 2021 年三度出紀念版，可被視為臺灣登山界經典。本文採用 2021 年的《丹大札記》版本。

⁵¹ 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頁 61。

繞過三叉峰（2980M）後午餐，這一段箭竹密不透風，粗比拇指。十二點四十分抵草坡稜線，已近阿巴拉山，草坡峰峰相連，動物糞便處處可見，以水鹿、山羊最多。……這一帶都是乾溪床，必須往上游五分鐘左右才有豐沛的水源。下行約兩分鐘為良好營地，短草如茵，十分平坦，應是所謂的三叉營地，可容帳十數頂。只是要小心平坦鬆軟地表上暗藏的川上氏薊，一不小心便有人被刺得哇哇叫。⁵²

發現原始森林裡的生物世界，並連結登山的注意事項，文中並沒有強烈的文學性或抒情性，純粹書寫登山過程中所見的景象，樸實的文字形塑了一個生動活潑的世界。自然誌的發軔就源自於探險家的手技，將所見所聞忠實地記錄下來，日治時代的學者正是踏實地走過高山並如實寫下，而台大登山社的登山書寫出自於對登山、山岳的熱愛，更融入進個人的所思所感：

剛上到紅崖山的稜線，就看到三百公尺下的西溪，從兩岸的山間自在地從轉彎處流了出來，像是草原上背著背包，唱著山歌的少女緩緩走過。兩岸的河階是大片的草坡，沒有吵雜的溪水聲，靜得只聽到走路的声音，所以溯行的時候都覺得不忍踏入水面，破壞這裡的寧靜。兩岸點綴著幾顆圓柏，像是童話世界裡的香菇屋。⁵³

宛如時間凝滯的美好境界，不論是人類與山岳的交流互動，還是於高山行走的困難、大自然的視覺饗宴，以及人文歷史的沉浸探究，都是自然誌的書寫素材。綜上所述，《丹大札記》從前人的文獻資料，到親自實踐登山探勘；從動植物、地質的觀察，到人文歷史的關懷，以深度探勘區域的形式，探索丹大山區的生態與人文歷史。

此外，《白石傳說》是台大登山社花費七年的時間執行白石山計畫，以中央山脈能高安東軍主脊上的白石山為核心，做放射性的區域探勘。台大登山社進入這段人跡未到的深山溪谷，發現並首登處女峰（如針山、南二子山）、探訪泰雅族神話傳說的故鄉、呈現陡急又危險的高山源流探勘。除了探討白石山區的人類活動歷史與泰雅族傳說，此書的精華更是在於詳述登山社隊伍深入山野的過程。

其中在攀登南二子峰的部分，呈現社員的冒險犯難精神，他們多次拜訪後才

⁵² 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頁 160。

⁵³ 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頁 405。

成功登頂，以文字記述陡峭難行的山路：

前路何艱？一大早獵徑就消失無蹤，稜線敞開，主稜下是一大片裸露岩壁，接稜處呈斷落態勢。岩稜難走，黏得住土壤的地方又密生箭竹。這是一片與天相接的火燒遺跡，白木森佈，下有巨石倒木及焦炭，大小岩石堆疊至峰頂。北峰露出猙獰一角，西面崩壁直瀉安來溪底；峰頭下盡是巉岩嵯峨，看不清與南峰相接的稜線面廓。半小時後，我們已經站在金字塔的尖端——南峰頂上。⁵⁴

還有陡急如懸的北峰，「顛頂下六十公尺是陡峭的露岩及碎石坡，暴露感很大。岩質銳利。之後坡度轉緩，在巨石間跳躍，心緒也隨之緊張。」⁵⁵山勢岩層堆疊和陡峭對映出雲海朝霞簇擁的群山之美，他們披荊斬棘、克服艱難行走於層巒疊嶂的山路中。承繼的是早年博物學者、人類學者的學術精神與書寫模式，在此基礎上又開拓臺灣登山的書寫方向，探險精神背後蘊含的是對臺灣土地的熱愛，深耕荒蕪原始的高山是為更多元的探索，從臺灣本位記錄屬於自己的自然誌書寫。

楊南郡的登山書寫是以古道探勘去追溯臺灣過去的歷史，從時間的縱深去了解清代、日治時期進入高山而鋪設的古道，如八通關古道、浸水營古道、能高越嶺道等，藉由文獻資料、耆老傳說、田野調查來研究並試圖重現歷史事件。而台大登山社則是從區域性的探勘，做空間的深度踏查，探訪從未到過的山區，如白石山區域，進行山區地文概況說明，並留下相關攀登路線、記錄。

而鄭安晞的《台灣最後的秘境》以清代關門古道為主題，⁵⁶是作者鄭安晞與政大登山隊社員共同深入中央山脈心臟地區探勘關門古道。台大登山社出版的《丹大札記》涵蓋的範圍與關門古道高度重疊，鄭安晞受到啟發決定研究與探勘關門古道，不同於《丹大札記》，鄭安晞則是聚焦於關門古道本身的歷史、古部落的踏勘。作者詳細梳理關門古道的名稱由來、開鑿背景經歷等，試圖還原關門古道的歷史原貌，關門古道作為清代開山撫番的重要道路，其重要性在於「深入中央山脈之生蕃地，箝制原住民，更是清代臺灣東部國防安全上，不可或缺地增兵道路之一。」⁵⁷此外，作者連結古道與布農族的關係，踏查部落遺址，訪問部落耆老，進行布農族部落調查。作者亦從清代、日治和民國的文獻資料、地圖等

⁵⁴ 台大登山社：《白石傳說》，頁 78。

⁵⁵ 台大登山社：《白石傳說》，頁 79。

⁵⁶ 鄭安晞：《台灣最後秘境 清代關門古道》（臺北：晨星，2000 年）。

⁵⁷ 鄭安晞：《台灣最後秘境 清代關門古道》，頁 92-93。

考證古道路線，在二十次的探勘中呈現關門古道的路線，他的登山多圍繞著古道進行，並以台大登山社的《丹大札記》作為參考和對照，來完善探勘路線。比如在探勘關門西稜路線，到了 2088M 的西鞍，當年臺大登山社與古道錯失，鄭安晞記錄了發現古道的過程：

在 2088M 峰之前，古道又再次出現了，它並沒有爬上 2088M 峰的山頂，它先是在山峰的北側以「之字型」的築路方式緩上，再腰繞至 2088M 峰的西鞍，此時茅草林又再現，鑽出茅草林後就要接上 2396M 峰的主稜線。雖然在 1/25,000 地圖上並沒有顯示出有小山頭，但是瘦稜上卻是小山頭處處，古道並未沿著瘦稜開闢，此時的古道在稜線的左側修築上、下駁坎，路幅約 3 公尺，因為太久沒人走過，古道上面長滿了雜樹，有杜鵑、箭竹、烏毛蕨等等，經過我們一番清理之下，古道又再次重見世人。⁵⁸

鮮少人知的關門古道在鄭安晞等人的深度探勘後重現於世，他的登山探勘奠基於前人的成果、地圖等資料，並實地探勘，沿著稜線尋找到古道，穿梭在中央山脈的心臟地帶，將古道和歷史以探勘的形式呈現，提供古道上目前的面貌，以及高山、原住民部落珍貴的自然生態、文化歷史。

第四節 海外的登山書寫：冒險與開拓

進入 1980 年代，海外遠征活動成為登山者的目標，當時臺灣仍處於戒嚴階段，且 1979 年第一本觀光護照才核發，出國登山並不方便，加上海外攀登風潮尚未形成，海外登山者甚少。到了 1990 年代，國內的海外攀登始興盛，登山者以聖母峰為追求目標，自行組織隊伍或參加國際遠征隊，臺灣正式踏進國際登山地圖，拓展臺灣知名度，試圖通過個人探險展現的毅力與韌性，證明臺灣的國力。⁵⁹2000 年以降，海外攀登風起雲湧，受到資訊的普及與登山者視野的開拓，攀登

⁵⁸ 鄭安晞：《台灣最後秘境 清代關門古道》，頁 333。

⁵⁹ 連志展根據 1980-2010 年臺灣海外遠征的發展進行分析，在所有的臺灣海外攀登目標山峰之中，麥肯尼、阿空加瓜、聖母峰的攀登就佔了 36%，近四成的隊伍以這三座山峰為目標的集中現象明顯。並將這三十年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 1980-1989 年、1990-1999 年、2000-2010 年三個十年，發現第一個十年八千米級遠征隊伍的比例是 0%，第二個十年八千米級遠征隊伍的比例上升到 45%，也就是有一半的比例以八千米級的山峰為目標，會有這個現象是因為 1999 年代，聖母峰席捲臺灣登山界，國內的海外攀登基本上是為了追求聖母峰。第三個十年八千米級的攀登隊只佔所有海外攀登中的 15%，可見攀登目標與隊伍多元，不僅侷限於八千米的攀登，包含其他五

的形式也更加多元。本節聚焦於討論 1980-2000 年的海外登山書寫，探析海外攀登萌芽階段登山書寫的遊記特性，以及呈現的冒險內涵。

連志展在回顧臺灣海外攀登的發展後，提出反思，他認為海外攀登具特殊意義：

海外攀登不應該只是為了達到登頂某座山峰為目的，而應該是一種「探險」精神的追求與探險文化的建立，前提是，「探險」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重要元素。以目前台灣社會必須面對的許多問題來看，台灣社會的確需要更加彰顯探險精神來勇敢的面對越來越多的挑戰。⁶⁰

其指出當時臺灣前往海外攀登的隊伍看似有所增加，具突破性的攀登卻很少，可見探險的價值尚未被臺灣社會肯定，若暫且忽略此時的登山現況，連志展將探險精神視為國家社會所需的元素，海外攀登探險家以執著的耐力，持續證明探險的價值。對臺灣登山者來說，海外攀登具有冒險和開拓，以書寫記錄所見所聞，將登山歷程忠實呈現。

（一）以遊記為名：開拓的紀實

閱讀此時期的登山書寫文本，如《南美攀登記》⁶¹、《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⁶²與《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⁶³等作品，以遊記的形式紀錄海外攀登的歷程，將登山前的準備、登山的過程，乃至登山後的心境或後續完整呈現。登山者跨越地圖上的疆界，攀登世界各地的高山，接觸異文化並歷經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衝擊，可以看到他們如何通過書寫記錄海外遠征的開拓故事，以及行旅景觀的呈現，勾勒出海外攀登的新視界。

轉戰海外，事前準備較為繁瑣。高銘和在一九九三年收到來自尼泊爾政府的攀登許可證，始籌組「一九九六年聖母峰遠征隊」，除了招募隊員及訓練，還需要籌措經費，好不容易拿到贊助後，在出發前得知尼泊爾政府將「登聖母峰的許

千、六千、七千的山峰，都有更多隊伍的身影。連志展：〈台灣海外攀登的發展與展望〉，《第十一屆全國登山研討會論文集》（2012 年），頁 8-14。

⁶⁰ 連志展：〈台灣海外攀登的發展與展望〉，《第十一屆全國登山研討會論文集》，頁 16。

⁶¹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臺北：大塊文化，2001 年）。

⁶²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臺北：大地地理，1997 年）。

⁶³ 周德九：《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臺北：博客思出版事業網，2021 年）。

可費由原來的五萬美金調漲為七萬美金」，⁶⁴政策的反覆對吃緊的預算更是雪上加霜，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在當地與官員交涉，雖未如願。再者尼泊爾開放多個隊伍同時入山，他認為這是臺灣與國家隊伍接觸的好機會：

登世界級的高山就有這種好處，除了巍峨的山岳可以讓你胸襟為之一闊之外，還可以碰到不少外國登山家，他們的豪情和魄力讓你明白什麼叫真正的勇者，讓你的人生境界在不知不覺中也提昇起來。⁶⁵

對彼時的臺灣登山者來說，能親眼見到外國登山家並與之互動、學習，是難得可貴的經驗。另外參與國際登山隊伍的李美涼、林乙華，於 1999 年攀登阿空加瓜峰，在《南美攀登記》中記錄接觸西方的登山文化，「西方人的運動習慣通常是力量耗盡了才休息，故走得很快很久再做一次長休息。而我們的運動習慣則是調配休息時間讓體能維持一定，所以休息較頻繁但皆不長。」⁶⁶身為專職登山者，事前即做好準備和訓練，讓自己在高海拔帶來的高山反應能舒緩，加上不同的登山模式，更考驗個人的適應能力。

而周德九組成的「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是中國與臺灣於 2000 年聯手攀登世界第二高峰 K2，《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以科學論文的形式，系統性地寫出籌劃、攀登與指揮的過程，遺憾的是由於天氣因素而無法順利攻頂，不過「這本紀實除了提給有用的資訊及正確的觀念給有意參加遠征攀登的人士，包含登山歷史紀錄與邊疆地理供讀者閱覽」。⁶⁷周德九認為攀登八千公尺的高峰是國家展現國力的一種方式，也是登山者重要的挑戰，為提升臺灣對冒險文化的注意，以電視轉播的形式讓國人共同參與登山的史實。

在行旅景觀的敘事方面，周德九以日記的體裁，記述登山歷程，並兼採異域文化的風景，以形成邊疆地理風情，比如他記錄攀登前的登山祈福儀式：

「煨桑」是藏人的祭祀習俗，是焚燒穀物、松柏枝等產生煙霧祭祀鬼神的活動，直譯「煙祭」。……隨著延燒的火勢，一陣陣撲鼻的柏香、油香、與食

⁶⁴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頁 52。

⁶⁵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頁 88。

⁶⁶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31。

⁶⁷ 周德九：《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頁 3-4。

物的香味就會在高山清冷的空氣中慢慢地飄散，佛經上說，神靈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但要是神靈聞到「桑煙」的香味就像赴宴一般會聞香而去，藏語稱其為「智薩」或是「食味」的意思。……任何登山隊伍中如有藏族隊員或是尼泊爾雪巴族隊員，在正式攀登前一定會舉行這種祭神祭天的儀式。⁶⁸

處在布滿雪地的高山，他的目光不僅停留在大自然的景色，還留意到邊疆民族的文化與習俗，從嗅覺與視覺的交融，呈現一個五色繽紛、充滿香氣的山岳。此外高山冰河固然優美，對於登山者而言，卻是致命的存在，臺灣人並沒有雪地攀登的環境，因此需要事先學習冰爪、冰斧等攀登用具，並在攀登時盡快學習冰攀。

李美涼、林乙華的作品可以看到書寫者的視角中的高峰，從起初由遠觀記錄山脈：

我們的目標是阿空加瓜峰，西面山體赤裸沒有一絲冰雪，從山腳直至山稜的盡頭，是落差兩千多公尺的碎石坡，仰望很壯觀、很有暴露感。⁶⁹

遠距離的仰望使得她們能更清楚地看見這座山峰的面貌，接著記載她們行走時山岳顏色的變化：

黃昏太陽西下，阿空加瓜峰山色灰黑，而頂端的山壁，染著火紅的色彩，如金碧聖殿，莊嚴懾人。漸漸地轉成粉紅、灰黑直到全然的深黑，夜幕籠罩，氣溫驟降，我總愛凝望這最美的時段，直到冷得受不了才躲進帳裏。⁷⁰

她筆下高山色彩的渲染隨著時間而變化，這是浸染在高山裡，沒有受到外來的干擾，能全身心投入於山岳的感受，才能體認到的自然之美，也或許是在困難的登山形中，能予以慰藉的美好山景。登頂時「站在南半球之巔，俯瞰層巒疊障的安地斯山脈，這全世界最美的山鍊，閃亮的雪山向遠處綿延，祥和、平靜、悠遠，眼下真是個美麗的世界」，⁷¹跟隨著兩位作者的步伐，看見了遠觀和俯視的山岳視界，移動帶來的視野變化，連帶有了心境的嶄新之變。

至於高銘和的行旅景觀著重於攻頂前後的生死瞬間，從登山者的親身感受化

⁶⁸ 周德九：《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頁 139。

⁶⁹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33。

⁷⁰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37。

⁷¹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60。

為生動的文字敘述，更能體現登山的歷險，面對隊員的驟然離世和暴雪的天氣，下定決心登頂，將登頂前後登山的畫面與心境描繪地相當生動。暴風雪的黑夜出擊，行走在斷崖邊緣的台階，「我探頭往西藏方向的喜馬拉雅山麓望下去，結果大失所望，什麼都看不見，視野完全被雲霧擋住了。這時風更大，峰頂四周都被烏雲遮住，還颳起小雪來。」⁷²天氣的因素沖淡登頂的喜悅，反而營造黑暗陰森的氛圍。下山後與雪巴走散，為保安全只能留在原地等待救援，於是高銘和就在冰雪之中，等待黑夜過去，他形容：

過了不知道多久，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左手邊的方向，也就是東邊，有些異樣。我停止了動作，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片隱約的微紅色展現天際。是晨曦的訊號。我欣喜若狂，心中燃起一股獲救的希望。只要太陽出來，它所散布的熱量，將可慢慢舒解我渾身上下徹骨的冰冷。⁷³

黑夜和冰雪代表著生命的險境；太陽與微紅象徵著獲救的希望。當天亮後他才發現原來自己所躺的地方是一個巨大的冰壁，四周都是山稜和山脊，沒有遮風擋雨的地方，運用色彩的不對勁襯托出處境的危險。

李美涼、林乙華於 2001 年登頂阿空加瓜峰，是女性首登南美最高峰者；周德九參與的聯合登山隊是華人第一次由北側新疆登頂 K2；高銘和組織的遠征隊是臺灣首次循尼泊爾方向（俗稱南側）攻克聖母峰，綜覽臺灣過去的政治與歷史背景，與世界接觸甚少，海外攀登是認識世界的途徑，拓展國際視野，臺灣的海外攀登者踏上征途，在國際山峰留下身影，提高國家的能見度。

海外遠征的紀實文本呈現詳細的登山歷程，以親身經歷述說登山的困難，藉文字描繪出眼前的山岳景色，以及異文化的體驗。

（二）紀實之外：冒險的精神

李美涼、林乙華、高銘和、周德九等的登山者，挑戰的背後蘊含登山者無畏的探險，願意探索未知的領域。高銘和在此次遠征受到嚴重的凍傷，切掉手指和腳趾，卻沒有後悔，此後仍持續登山，展現內在強大的冒險精神，下文將探討冒險與行動力，如何引領登山者於未知探索、探險。在海外攀登的萌芽階段，以高度的執著和強大的行動力，探索異域更高的山峰，「看到聖母峰宏偉遼闊的冰天

⁷²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頁 212。

⁷³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頁 225-226。

雪地，看到登山隊浩浩蕩蕩的行列，看到攀登過程的險象環生，我整個人都傻住了，體內卻是熱血沸騰。」⁷⁴表現了個人對山岳的情感，面對未知的探索欲望宣示登山者主體的冒險動能。

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在〈何謂冒險〉中談及冒險的定義：

一是它本身有開端和結尾、而且以特定方式收編了某些重大意義；二是雖然冒險本來就充滿意外，它仍須外在於生命川流不息的界域。儘管冒險還是扣連到生命的擁有者的性格和身分，扣連的方式卻可以極其狂狷，超越生命比較狹隘、講求合理的面向。⁷⁵

冒險嘗試企及一種生命感受，冒險者願意去包裹在生命川流之外的意外。既然登山是可能做出犧牲，那何以仍奔赴之？大抵是受到生命內在的必然性驅使，將外在的意外事件，納為生命的必然，以更深刻的內心來理解生命與冒險的關係。

本節從冒險的角度切入討論海外攀登的登山文本，其原因在於對當時的臺灣海外攀登者出國的程序繁瑣，且礙於政治因素很大的可能被駁回或者是需要經過層層關卡才能成功出發。其次相較於臺灣高山的高度，世界的山峰大多在六千公尺以上，世界第一高峰的聖母峰有八千公尺以上，攀登的環境和方式與臺灣境內有所不同，比如雪登，難度會更高。

冒險是對生命常規的衝動，測試自己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何在，藉此看到可見探險者的執著與行動力，透過第一人稱的記述，看到對於登山的自我探尋，李美涼隨著高度攀升，「我想奮力跟上，卻無能為力，甚至連緩慢向上不停下來喘息我都辦不到。我根本操控不了我的身體，我只能依循它的反應」，⁷⁶登山實則是個體極限的拉扯，襯托出李美涼的毅力，冒險之動能成就登山者的主體，帶領登山的前進，誠如李美涼之言：「登山是非得經過一番磨難，才能獲得心靈上熾熱的滿足」，⁷⁷這是一種超越生命、感受身體極限的界線，以企及生命之外的冒險界域。

而冒險的本質就在登山的過程中顯現，所謂探險，是指出於某種目的，自願地、以陌生的方式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必須感受到自然給予的危機，才算真正

⁷⁴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頁 13。

⁷⁵ 詹偉雄選編，劉麗真等譯：《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臺北市：臉譜，2021 年），頁 222。

⁷⁶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65。

⁷⁷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86。

進入登山的世界。周德九在記述是否往上攻頂的決策，受到天氣預報的不準確以及徘徊不定的決定，雖然內心強烈希望這次的遠征能夠成功攻頂，畢竟代表華人首次站上 K2 峰頂。在全然陌生且危險的山岳中，必須憑藉自己的判斷，有時科技無法仰賴，擁有高度自覺的登山者，更能了解非前進不可的執拗，背後乘載著代價與後果：

筆者能概括原因為 K2 北稜路線實在太艱難，遠遠超過台北隊員攀登能力，害怕、沒有安全感，7 月天候太糟，搞得大家心情與士氣低落，離家太久想家，憂慮回家後的收入來源，與藏族隊員間有隔閡與誤會，筆者的對策是不要再強求他們去做攀登了。⁷⁸

縱使想登山而天氣的不穩定使之撤退，山岳登臨的危機在一瞬之間，呈現作者的躊躇與決斷，他以身體丈量山岳的自然環境，希冀在可控的條件下讓隊員能平安歸家，內心的心志游移，最終能安定前行，構成冒險與生命的交流。

高銘和的聖母峰攀登記展現了雪地行走的謹慎與危險：

基地營到第一營之間，落差雖然只有五、六百公尺，但到處都是冰河裂隙，而且垂直的冰壁特別多。架設在沿路上的鋁梯就超過五十多個，有些架在冰河裂隙上，當橋梁用；有些架在冰壁上，當成攀登的梯子。這些路段的曲折、危險，由此可見一斑。

好不容易，終於輪到我。我先把攀登器扣在登山繩上，雙腳微微一蹬，身體立刻懸空。我一隻手扶著冰壁，一隻手推攀登器，兩隻腳拼命向冰壁踢，這叫前踢法，是利用冰爪前面的兩根爪子，插入冰壁裡，好讓身體可以暫時固定住。就這樣，我一面用冰斧砍住冰壁，一面將攀登器往上推，又一面用冰爪踢向冰壁，循環往復，一點點向上推進。爬起來真的非常吃力。⁷⁹

寫出雪地攀登的冒險歷程，這是在臺灣沒有的經驗，而且必須先行或提早來到當地練習，高銘和在書寫之餘，也介紹攀登的說明，會對他在雪地攀爬的形容更容易想像。當快要登頂時，作者敘述地更加驚險：

⁷⁸ 周德九：《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頁 202。

⁷⁹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頁 168、175。

過了南峰以後，最大的挑戰就是希拉瑞台階。它是一九五三年首次登頂的紐西蘭人希拉瑞命名的。其實它是一塊很大的黃色岩石，約有十公尺高，位置剛好擋在山的稜線上，要登聖母峰，非經過它不可。我們攻頂本來一直沿著稜線在走，但如果沿著稜線走到底，就會到希拉瑞台階的右邊，那兒是斷崖，非常危險，所一般人會採取稍稍偏左的路線，走到岩壁底部靠右邊三分之一的地點停住，在往上爬。⁸⁰

在海拔如此高、空氣稀薄的地方，必須依靠臂力向上爬行，將殘餘力量用盡抵達岩壁頂緣，才成功登頂，這段接近終點的石頭台階展現了生命本能的終極撕裂。

高銘和順利攻頂後是自我挑戰的成果，也是對臺灣的交代，他下撤途中與雪巴失散，獨自在黑夜等待救援，經歷一場和死神的較量，造成身體的傷害，卻並未抹滅他對登山的熱愛。誠如前述的冒險，不確定與不可計算因素深深根植在生性愛冒險之人的生命境況裡，冒險行動會將意外與死亡從生命的脈絡中撕裂，同時生命的能量又注進行動裡，繼續冒險。

攀登高峰的歷險通過登山者的紀實展現，並揭開海外攀登萌芽期，受到他國的政策，臺灣登山者在申請入山許可困難、繁複。且需要向各界籌措經費，接受臺灣媒體的採訪，獲得民眾的關注，讓臺灣有機會向世界展現韌性。作為先鋒的登山者，從其行旅中的登山實況、山岳呈現與冒險精神的塑造，建構探險文化的價值，為後來者奠下基礎。

小結

本章探討範圍為 1949-2001 年的登山書寫，臺灣經歷清朝、日治、國民政府的政權更迭，特殊的殖民背景使得山岳空間成為殖民手段，地理暴力之下人民對山岳既陌生又疏離，儘管如此日治時期實施的登山運動教育，以及日本學者留下的學術研究著作，成為臺灣登山書寫的重要基石。從底蘊精神而言，此時期的登山發展與文本的核心為「探險」，縱使背後的成因不盡相同，就登山運動價值體現之一就是探險，故本章以探險為研究軸心，探析戰後登山書寫的發展。

第一節首先回溯日治時期鳥居龍藏、森丑之助和鹿野忠雄等人的高山紀行作品，學者深入中央山脈、玉山等高山從事學術調查，書寫登山探險之艱難，並呈現臺灣高山的地形、生態。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被譽為臺灣山岳文學之

⁸⁰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頁 208。

經典，深厚的學術背景，加上文學筆墨，成就高山紀行文本的美學價值。而日治時期的開拓探險，是日本為政治需求以掌握高山資源，存在帝國主義的征服意味，可以肯定的是此時期的學術踏查的探險精神，以及高山博物學書寫形式，影響臺灣現代登山書寫深遠。

接著，以程兆熊、楊南郡、徐如林、台大登山社、李美涼、林乙華以及高銘和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討論戰後作家如何在封閉的政治環境中，又從探索陌生的山岳裡並結合個人的登山經驗，推動臺灣的登山書寫。程兆熊接受官方委託進行果樹種植調查工作，其作品呈現臺灣最為原始的面貌，學術調查精神正好貼合日治時期的學者，以科學和嚴謹的態度看待，綜覽他的作品，高山紀行書寫模式多元，有日記體、散文體、書信體與地景詩等形式，書寫登山探險歷程、山岳地景面貌。

第三節、第四節將登山書寫以登山領域區分為臺灣、海外兩部分探討。本土的登山書寫朝向學術化，楊南郡的古道探勘系列著作，從田調到文獻的深度研究，以縱向的歷史和深入的考察，追溯古道的古往今來，以報導文學書寫，加入小說的筆法，從行動者的美學展示對高山的熱愛。台大登山社的探勘著作可謂是學術性登山的集大成，以區域的深度實踐登山探勘，從生態、地質的觀察，再到人文歷史的關懷，承繼的是日治時前的學術精神與書寫模式，在此基礎上又開拓臺灣登山的書寫方向。

海外的登山書寫以紀實呈現開拓的先鋒，以及蘊含的冒險精神。李美涼、林乙華、高銘和、周德九的作品，以遊記為名紀錄海外攀登的實況，包含登山的歷程、與外國政府的交涉、異文化的觀察以及與西方登山文化的碰撞，並以移動的視野和色彩的勾勒，描繪世界級的山岳面容。探險背後是為提升臺灣在國際的能見度，以展現國力，更是冒險精神的體現。冒險是對未知的衝動，來得知自我身體的侷限，在高度自覺的行動之下，決定要持續攻頂或下撤，冒險的不確定性根植於登山者的思想中，願意去承擔後果，嘗試在臺灣的社會裡注入探險文化。

第三章 多元的書寫礦脈：論 2002-2024 年的登山書寫

自 2002 年起臺灣對山岳的態度轉向至山林守護與教育發展，以文化、生態教育為宗旨認識山岳。在環保、保育的意識抬頭，以及資訊普及和科技進步的現代社會，加上 2001 年政府解除社團申請制、高山申請制度，¹自此登山朝向個人化，有更多的人走向山岳，登山成為大眾的日常活動。登山不再只是單純以登山為目的的活動，更是登山者在山岳空間中與大自然的互動，擴展到生態、地理、人文等向度的書寫，以多元的風格展現豐富的山岳書寫。本章節預計以山岳書寫的作者身分為分類，討論不同身分別看待山岳的方式和意義，及其各自走進山岳的契機與追尋，並分析不同的登山書寫形式，以探析完整發展與時代特色。

第一節 登山教育與生命尋覓

2000 年以降，登山者越來越多，書寫的文本亦蓬勃茂盛，出現大量的登山書寫文本。這些登山者的基本大前提——熱愛山岳，進入山，而後成為專職的登山家，他們的文本皆呈現不同的特色，本節首先探討登山的契機，何以出發？為追尋什麼而登山？從山岳汲取的養分如何走向未來？以滿足或實現登山家各式各樣的慾望。在現代文明都市化的社會，山岳成為如今人類嚮往之處，藉攀登短暫逃離或放鬆；或通過登山用以挑戰自我，嘗試觸及個體的未知、極限。而在登山之後，登山者將自身的經歷與所學帶回臺灣，希冀臺灣登山探險文化的培養和根植；另外隨著臺灣登山的蓬勃，更多關於死亡的探討，也轉為深層。

一、尋：登山的契機

人為什麼要登山？「因為山在那裡。」(Because it's there.) 英國傳奇登山家喬治馬洛里 (George Mallory) 的名言成為追尋山的理由。羅伯特·麥克法倫的《心向群山》從登山史、一部想像的歷史中，嘗試叩問一座山如何能夠全然「迷

¹ 內政部於 2001 年 12 月 25 日修訂「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國民凡要進入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區，不再需要高山嚮導隨行，並放寬人數限制。在此新規定下，登山活動將朝向自我負責的戶外活動型態，國防部及內政部不再扮演監護者的角色。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總論》(臺北：營建署，2013 年)，頁 226。

住」一個人？人類對山岳是何感覺，以及如何感知山岳。²登山作為一種活動、欲望，吸引登山者離開舒適圈，寧可冒著喪命的風險也要奔赴，如此的渴望是十九世紀西方探險背後的政治、權力動機，以英國而言，英國人想要消除地球上所有未知空間的本能欲望，符合帝國的野心，³於是世界上多數的山區開始標在地圖上。回到臺灣的登山史，如同前一章所述，臺灣經歷清朝、日治、國民政府的政權，探勘未知地域的求知欲望，是為掌握權與利。如今登山已普遍化，山岳不再如過去被視為恐懼的地景，也非為發現未知，而是個體為探索未知的欲望。

現在的登山並非只為追求登峰造極的高度崇拜，而是走進大自然，面對未知的想像，專注於崇高過程中，對自己的探索，挑戰背後巨大的沉思、想法是登山者感知山岳的結晶。另外，人類所處的是都市化的社會，登山提供了都市無法創造的環境，群山的召喚成為出發的號角，對大自然的嚮往成為現代人登山的主要理由。

（一）都市/文明的跳脫

人類久居城市普遍對自然懷抱嚮往，成為當代都市、文明人的共通情感，以陳德政為例，身為文字工作者，終日在書桌前寫作，生活在頂樓的租屋處，生活被「方形」所限制，又因大環境的問題，以及工作性質產生對人生的懷疑。反映普遍現代人的處境，外在環境的壓力、內在自我的疑惑使得人們更加受限，遙望近郊的山產生改變：

社會，自然也包括環抱它的山林水文。我站在屋外那個想靈感的天台，視線跳過市區沉悶的景觀，冒出眼前的是那條曾經被我忽略的山脈，我從最容易親近的陽明山系開始走起，從一個馴化的都市人，漸漸找回體內的脈動，傾聽雙腳在山徑間敲擊出的音律，享受流汗時每一陣吹來的涼風。⁴

僵化的生活作息導致現代人失去自然的感受力，而山岳為一媒介，能找回生命的脈動，走入山岳能與段義孚之說呼應，無論是何種規模的「回歸自然」運動，幾乎不會影響原來的家園，即主要城市和大都市，依然眾多的人們去那定居，⁵人類

²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新北：大家出版，2019年），頁43。

³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頁250。

⁴ 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臺北：寶瓶文化，2021年），頁48。（下文簡稱《神在的地方》）

⁵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臺北：立緒，2014年），頁22。

仍然會回到現實世界的生活軌跡，「如果社會是一座人聲雜沓的市集，山能幫我排解掉一些噪音，每次下山，又有能量重新走入這個熱鬧的社會。」⁶山岳成為現代文明逃往的對象，能在此得到滋養。

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中提出「逃避自然」的概念，即人類遷徙以尋求更滿意的地方，源於對現存地方的不滿意，揭示人類對現狀的不滿足，有了逃避現實的願望，「遷徙」作為一種逃避，是人類渴望獲得安定、穩定的生活，使得人類試圖通過改造所處的地理環境來實現，因此自然界成為人類文明改造的首選，而自然的不可依賴性和不可莫測性，會威脅到人類追逐安穩，故創造穩定的人造世界，以彌補自然界的不足之處。然而，文明建構出的現實世界，反倒讓人更加忙碌、沮喪、無所適從，大自然的神秘、廣闊是人們再次逃避的去處，便轉向「逃向自然」：

人類逃往的自然必定已經被人文化了，且被賦予人類的價值觀，因為這種自然是人類願望的目標所在，而不是人們被迫或不高興進入的一個模糊的「外在」世界。所以，可以這麼說，我們希望逃向的地方已經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這一迷人的概念。⁷

登山即為「人文化」自然的展現，開拓登山步道、規劃攀登路線等登山商業化的模式，及臺灣百岳、世界高峰的制定和推崇，其實是人類文明有意識建構「自然世界」，以逃向自然。

這種有意識地進入自然環境的概念，登山者能清楚辨別山上、山下兩個概念的差別，陳彥宇在《山痕：那些山、那些傷教會我的事》說明登山帶給他的想法：

在爬山的過程，你不用去煩惱山下的那些事，因為沒有意義。唯一要做的僅僅只是專注在腳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往上爬。可能就是因為每一步都很真實、每一步都很深刻的感覺吧。對我而言，相對山下的生活圈，登山似乎沒有太固定的圈子、沒有太多的閒話、沒有太紛擾的紛爭或者削尖腦袋的競爭，只有溫暖的互助與扶持。⁸

作者認為相比於平常的生活圈，山岳的環境能帶來更多的平和、安靜，能全神貫

⁶ 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頁 48。

⁷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頁 23。

⁸ 陳彥宇：《山痕：那些山、那些傷教會我的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23 年），頁 4。

注地跟自己對話，還能夠短暫擺脫紛擾的現實世界。對比文明現實社會的忙碌或侷限，山上的自由自在固然成為人們逃往的去處，然而「是否無意間闖入另一個不自由的框架？例如一生只會爬山，下了山卻無法正常生活。登山成了逃避現實的手段，而夢想和現實之間是否存在妥協呢？」⁹林雋提出的思考成為他登山追尋的課題，也提供更深層的反思，如何協調山上的舒適、山下的社會之間的平衡呢？

山女孩 Kit 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山上，如果迎向日出是一天的開始，那麼山下的日子，迎向什麼才是開始？如果回到山下，我能否每一個凌晨三點醒來都知道自己的方向？……我沒有把握在醉生夢死的現實裡找到一個能安身立命的原因，於是我總是想上山。山上的一切如此確實與堅定，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節奏令我寬慰。也許我沒有想要什麼，只是想要一個安心，那個我知道出發就會看到日出大景，我知道出發就能跨越的山頭，我只要邁步就能增加的里程，我只要努力就會回報的一切。¹⁰

她安於山上固定的作息，以及前進就能跨越的山頭、完成的登山，如此的穩定使她眷戀登山，進而肯定自己存在價值。卻不見山女孩 Kit 的沉淪，她本想從山汲取勇氣作為回到現實社會的動力，「但其實所有的信心都是來自於自己，所有的勇敢都是自己供養自己，才不致匱乏。原來那不是山，是我自己。」¹¹她點明唯有自己才能明確分辨山上、山下兩個世界，不至於將登山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段。

不論是短暫逃離現實帶來的束縛，抑或是躲避紛擾的世界來與自己相處，都在說明人類主動逃向「自然」的概念，相信山岳環境的寧靜、山上的穩定節奏等是文明社會所欠缺的，而人類終將回歸社會。人類基於欲短暫逃避現實、鍛鍊身體、挑戰自我等原因，登山成為首要選項，具有自主意識的移動，使得登山者有明確的認知：主動踏入山岳這個誘人的概念。

（二）作為挑戰的探求

有研究指出常爬高級山者較傾向於「自我成長」與「自我挑戰」的登山健行

⁹ 林雋：《與山的一支獨舞：與自己同行，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臺北：三民，2021年），頁10。

¹⁰ 山女孩 Kit：《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臺北：遠流，2020年），頁158。

¹¹ 山女孩 Kit：《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頁124。

參與動機，¹²在追求冒險刺激，挑戰個人的能力和極限，又能獲得成就感，而更為深層的是從中獲得的成長與省思。連志展的《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江秀真的《挑戰，巔峰之後》¹³書寫參與全球七頂峰攀登計畫，¹⁴他們書寫攀登者最真實的記錄，呈現攀登者歷經磨合、分裂、團結，最終完成目標的堅忍和毅力之旅，展現作為挑戰者的勇氣、自我實現，若細觀兩本著作能發現兩人挑戰背後的探求或有不同。

作為七頂峰專案統籌執行，連志展的書寫著重於登山團隊之間的交流、溝通和互動，並以登頂作為主要考量：

遠征團隊中，一場微妙的隊員互動，就在五千三百公尺的北極高峰上進行。沒有聲嘶力竭的對抗，但每個人的姿態與傳遞的訊息，卻已然再清楚不過。個人的登頂成功，終究是團隊存在的意義吧？而一旦團隊的功能在攻頂前最後一刻已經幾乎完成的時候，團隊繼續存在的必要，似乎也等於零了。¹⁵

團隊與個人的拉扯是自我成長中無可避免的課題，團隊展現的合作精神、激勵隊友，是助力；而當涉及到利害關係，如攀登方式的選擇，以及在極端險惡的環境裡，保持體力以獲得成功登頂的機會，又或是面臨生死當前，個人尤為重要。連志展背負的是讓世界看見臺灣，扭轉臺灣在國際登山的形象，也是計劃的最初目的，追尋生命挑戰的渴望，除了創造許多記錄之外，¹⁶更是堅持往下走的勇氣，看見不同的世界。

江秀真顯現的是對山的謙虛，向山學習，並從與自我的內心對話，追尋到屬於自己的聖山。在攀登阿空加瓜峰時出於對自己的體能考量，選擇獨留在營地等

¹² 張君如、林志遠、李宜錫：〈登山健行者參與動機之探究〉，《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2007年），頁 55-62。

¹³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臺北市：商周，2016年）。

¹⁴ 全球七頂峰攀登計畫，為台灣戶外休閒用品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於2006年聯合主辦之「尋找台灣探險王！挑戰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圓夢計劃」，目的在於為台灣山岳界注入新的力量，豐富、深化台灣的探險文化。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臺北市：天下遠見，2010年），頁 21。七頂峰為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包括歐洲的厄爾布魯斯峰、非洲的吉力馬札羅峰，南美洲的阿空加瓜峰、北美洲的麥肯尼峰、大洋洲的查亞峰（又稱卡茲登茲峰）、南極洲的文森峰，以及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此計劃從2006年到2009年，由連志展、伍玉龍、江秀真、黃致豪、謝穎沂、陳仲仁、黃博政等登山好手組成台灣七頂峰攀登隊。

¹⁵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頁 130-131。

¹⁶ 寫下許多歷史：第一支完成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台灣團隊、世界第一海拔高度的生理資訊即時傳輸紀錄、世界第一位同時完成七頂峰與聖母峰南北雙路線登頂的女性登山者、第一次讓國旗飄揚在世界的頂端。截取自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頁 296。

候，迎來是兩天兩夜的暴風雪，無助和恐懼對她而言是山的考驗，讓她感受到自己的極限，體會生命的脆弱與珍貴，更體悟到面對艱險時，唯有臨危不亂，勇敢面對，才有機會存活下來。¹⁷或許是生命的瀕危感，江秀真體認到登上山頂並非征服，而是來自山岳的接納和親近，挑戰帶來的自我成長：

山並非高就最危險，生命考驗也沒有真正的通知單。每一位登山者的生命中，相信都有一座令人難以忘懷的聖山，讓自己脫胎換骨，淬煉改變。南美洲的阿空加瓜峰正如我的生命導師，以最嚴厲殘酷和重重險境之生命考題，讓我親身去釐清、解答與突破。¹⁸

生命的探求為她的終身追求，其書寫的核心是在與山的對話裡，積累人生的能量與智慧。連志展和江秀真為臺灣登山史寫下新的歷史，也為未來鋪路，投入臺灣登山教育。

2019年實行山林解禁政策，¹⁹臺灣再掀起一股登山熱，而資訊普及的現代，有更多的登山者能自行組隊或獨攀，不用組成龐大的攀登隊伍，而社會大眾多關注的是成功與否，宣傳多是登山者的破紀錄，詹偉雄表示爬山必須是「自己的爬山」，才對人生有意義。很多人爬山是為登頂，但登頂是下坡的開始；爬山的過程中，享受土地與內在情感連結、被大地之母款待、恩澤滿溢的悸動，從來比登頂更為重要。²⁰比起華麗的經歷，人與山之間內在的巨大張力，豐厚登山的挑戰向度。

詹喬愉面對追求百岳的「完百」：

對我來說，登山最吸引人的是過程。登頂不過是建構這個過程的暫時性目標。下山後總會發現，刻入人心的回憶，是被荊棘刮出的傷口、絞盡腦筋通過的地形、隊友間的互動，和雨過天晴的感動。但這些歷程經常被濃縮為百岳數

¹⁷ 摘取自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頁 158-159。

¹⁸ 同前註，頁 168。

¹⁹ 2019年10月行政院宣示國家山林解禁政策，包括「開放山林」、「資訊透明」、「便民服務」、「教育普及」及「明確責任」等五項政策主軸，政府以開放的態度，鼓勵人民走向山林，也期盼民眾「敬山」、「進山」，也要「淨山」，同時也告訴山友，政府的責任不是無限，鼓勵山友落實「自主管理、責任承擔」。行政院：〈行政院會通過「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dee7750b-f296-4968-bede-c9eb39665afb>。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11月1日。

²⁰ 詹偉雄：〈再危險也要去！《群山之島》製作人詹偉雄：在山裡，有一種無與倫比的神聖時刻〉，<https://alive.businessweekly.com.tw/single/Index/ARTL006002149>。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8月28日。

字上僅一個山頭數的增加。然後，話題就中斷了。²¹

有著許多首登紀錄的她轉向的是自我的探問，享受登山的過程，縱使以攀登全球十四座八千米山峰為目標，也沒有被成功束縛。在受傷之後，更能接受自己身體的缺憾，看見前輩和雪巴人強健的體魄，先天的限制使她了解到自身，將脆弱和苦痛毫無保留的呈現，登山並非競賽，不同的攀登者得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了解自己並在能力之內盡力達成，山交給她的是真正接受自己，才能了然於心。

追求極限不一定是為創紀錄，而是挖掘無限的可能，極限登山家呂忠翰（阿果）以無氧登頂八千公尺高山為目標：

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要選擇無氧攀登，對我而言，並非想刻意挑戰什麼紀錄，而是想找尋一種野性的魅力，我希望用自己的身體，去真實感受山的高度，判斷自己真正的身心狀態，當然無氧攀登絕非貿然躁進，而是需經過平時的訓練和評估。²²

面對每座高山，擬定策略、評估風險，不執著於攻頂成功，真誠的自我狀態省察正是清楚看到自己的能力。在攀登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僅三百公尺就能站上頂峰，隊友們的體力不支，決定撤退，攀登的成功不是個人，而是自己慢慢摸索出來的高度，²³這種謹慎的獨立思考和決定，造就他能在崇山峻嶺裡探求生命的本質。

二、覓：登山教育與死亡的探討

歸於平地之後，山岳帶來何種改變？個體在山岳中感受到的情感和想法皆有不同，心境上的轉變也成為登山者往後道路的抉擇，眼前崇高的山體，能渲染到死亡瀰漫的氣息，以及內心對自我的肯認，都是親臨其中才能感受到的震撼與轉折。綜觀此時期的登山文本，能發現登山家從海外攀登後回到臺灣後致力於登山教育的推廣，以親身經驗分享所見所聞，亦見得臺灣山難的發生，身體力行或以筆書寫，希冀能提升國人登山安全的意識。此外登山活動觸及到死亡的課題，徘

²¹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臺北：紅樹林，2020年），頁60。

²² 呂忠翰（阿果）：《我在這裡，山在那邊：從中央山脈到無氧挑戰 K2，召喚勇氣的 8000m 高峰探險》（臺北：麥浩斯，2020年），頁66-67。

²³ 呂忠翰（阿果）：《我在這裡，山在那邊：從中央山脈到無氧挑戰 K2，召喚勇氣的 8000m 高峰探險》，頁161。

徊於生死邊緣的極限運動，正因如此更能切身體會生命的意義。

（一）登山教育的發聲

登山教育是晚近臺灣重視的議題，當前的登山書籍文本皆具有教育意義的精神，國內歷年來有舉辦全國登山研討會，²⁴討論的範圍廣泛，包含登山管理、山難探討、生態觀念、步道設置、國際交流等，為推廣登山教育。另外教育部體育署設立「全國登山日」，²⁵推行系列活動，以期民眾能走出戶外登山、健行，並學習山野知識技能及安全，營造安全的登山環境。

登山書寫在旅程回歸之後，獲得的改變與成長，在抵達作為回歸點的現實社會，經過時間的沉澱，會更切身地感受到自我在出發前與回歸後有何不同，當然登山過程的紀實是為登山書寫的重要一環，回歸後的書寫在作品中占比不大，但是若忽略掉此，未免可惜。登山回歸後多為登山家身體力行地投入及呼籲，例如連志展在山裡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義，而現在他希望能幫助相似經歷的青少年，勇敢面對生命中的挫折與徬徨，從登山時「靠自己」的成就感與自我肯定中，挖掘自己的優點與特質。²⁶找到生命的價值，感受大自然的野性呼喊，於是推廣登山教育，正是登山帶來的改變。連志展的登山旅程仍在持續，朝向生態登山教育。

江秀真下山之後決定投入登山教育，《十年一講，為夢想》集結她十幾年來「行腳臺灣」計畫的演講內容，持續推廣登山安全與生命教育，以自己的經驗向大眾分享，並籌備正式的登山學校：

「登山教育學校」之於臺灣，宛如一座處女峰，挑戰的人屈指可數，更別說

²⁴ 全國登山研討會自 2006 年擴大舉行，每年辦理一次，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教育部體育署跨部會輪流主辦，2023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加入行列，期許藉由政府機關的合作，以及登山團體、產業及專家學者的集思廣益，健全臺灣的登山環境與山林服務。全國登山研討會：〈登山研討會簡介〉，<https://twnaca.twmountain.com/2024/>。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5 日。

²⁵ 教育部體育署自民國 106 年起，每年推動「全國登山日」系列活動，活動期間約為 8 月到 10 月，舉辦全國民眾一起參與的「全民樂健行」活動，還將親子及學生兩個組別整併成規劃成「登山我在行」活動，拓展登山人口，同時提升登山素養。臺灣山岳：〈全國登山日〉，<https://mountainday.twmountain.com/>。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5 日。

²⁶ Home Run Taiwan：〈山是最好的老師，讓高山照亮青少年心靈，實踐「永不放棄」的野地精神——專訪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創辦人連志展〉，<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775>。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8 月 30 日。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由連志展於二〇〇五年成立，是致力於在台灣推動野地教育的非營利組織（NPO），如何兼顧與善用這樣的風險與機會，帶給人們更多的自我覺察與正向的改變，我們稱之為「野地教育」（Wilderness Education）。野地，不只是一個被旅遊、被征服與被保護的對象，野地更應該是一個讓人們有機會看見生命本具美好的地方。於是，我們有這樣的一個願景～讓山成為一所學校！摘取自：〈社團法人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官方網站〉，<https://www.mtschool.org/%E9%A6%96%E9%A0%81>。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8 月 30 日。

能成功登頂。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之後，從前進與山為伍的雲端，轉身回到與人相處的現實社會，我選擇走一條超級冷門路線，登一座連教育界都公認的艱難大山「登山教育」，如佇立於峰頂的一等三角點。²⁷

從世界最高峰聖母峰頂轉身之後，將其一生獻給登山教育。臺灣是全球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擁有近三百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關於登山教育卻止步不前，或許歸根於教育體系的不重視，江秀真的演講走進校園，²⁸向下紮根登山教育。在她的書寫中，可以看見她將從山汲取的養分回饋到臺灣的山岳環境，創辦福爾摩莎登山學校，建立系統性的教育制度，提供正確的登山知識，享受登山樂趣，更重要的是安全下山。

「教育的山」路途非常漫長，面對臺灣登山的方向，呂忠翰認為重要的第一步是建立內在好奇價值觀和探險文化，他從制度面點出問題，比如山屋床位的申請，造成登山教育場域和時段的壓縮，讓登山教育工作者難以帶領學生學習山野課程。探險文化常與安全界線產生衝突，政府的保守管理使得民眾逐漸遺忘山林的野性和自身的好奇心，倘若要重建登山的價值觀，必須仰賴成長過程中的探險及冒險膽識，沒有建立有系統性的學習，這是臺灣卡關的一大部分，未來應從教育著手，²⁹更從在全人教育長達二十五年的經驗累積告訴大家：

如果山頂只有一個，那麼越走到頂，路就會越窄，直到一個點。但我們很少看看背後的風景視野，其實越來越清楚而遼闊。山頂不再是唯一的最終目的，登山也不再是比高或比誰強壯，更不是去數山頭及誰懂的多，我們在意的的是在攀登過程中，能靜靜走著、聽著、呼吸著，觸碰著樹與土地，由視線中的景色去觸動與連結內在，等待著清晨的寧靜光線來臨，每走一步算一步，留下的痕跡與身上的汗水才是真實的。自然走進山裡，帶著所有的準備及訓練，好好跟山這位大朋友對話吧！³⁰

²⁷ 江秀真：《十年一講，為夢想》（臺北市：商周，2020年），頁182。

²⁸ 她行腳全臺各地演講，分享個人生命體悟，戮力推廣登山安全教育的裡面，累積近三千場講座的感動與回饋！江秀真：《十年一講，為夢想》，封底。

²⁹ 呂忠翰提出四點登山教育要點：1.設立專才培訓計劃及登山運動科學與醫學學術研究、整合登山知識的系統學習；2.把國家資源整合，主動提供資源及規劃山區裡的教育場域；3.鼓勵企業認養各種探險運動，協助出錢出人力；4.透過探險旅程，建立認識大自然網路的三大方向；山、水（海、溪谷）人（文字、古道、動植物）。呂忠翰：〈打開膽識教育的想像——別讓恐懼大於好奇心〉，<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features-mountain-climbing-courage-education>。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8月30日。

³⁰ 呂忠翰（阿果）：《我在這裡，山在那邊：從中央山脈到無氧挑戰 K2，召喚勇氣的 8000m 高峰

登山教育的普及，需要制度與觀念的相互扶持，更為重要的是個人以何種態度面對登山，還有個人對安全、環境的認知。呂宗翰的書寫不單純紀錄極限的冒險故事，更是回歸現實社會，在教育界耕耘，從體制著手思考當今臺灣的登山。書寫結束後的教育實踐，能夠更呈現登山書寫的價值和體現。

（二）以書寫丈量死亡

登山教育涵蓋山難、死亡的議題，從 1999 年聖母峰山難到 2011 年臺灣張博崴山難事件，提升登山安全知識的重要性，隨著登山書寫文本數量的提升，也更加深入探討死亡的課題，比如林雋、張元植等人皆有關於死亡的書寫。登山運動與死亡高度連結，登上山頂的路途，即在死亡的陰影之下，想方設法避開可能的危險，真實經歷死亡邊緣的登山者，更能體會生命的珍貴。

林雋獨攀馬特洪峰，登頂後和兩位登山者垂降，眼看就要抵達山屋，身後近在咫尺的岩溝傳來聲響，宛如冰箱大的巨石急駛而下，落石伴隨的飛沙瀰漫於空氣中，幸好三人及時躲到石頭後掩護。他如此形容生命：「在這片危崖之上，生命實在太過脆弱，就像是放在桌角的玻璃瓶，總會有那麼一個冒失鬼從桌邊匆匆跑過，把瓶子撞倒，摔個粉碎。」³¹看似巧妙玩味的形容，將人的生命比擬為物件，稍有不慎就破碎，實則是他的切身經驗。當他得知同處有因落石襲擊而殞落的生命，更加了解到風險、意外的不可控。林雋持續思考登山與生命的問題，有必要賭上性命嗎？並有了如是體悟：

對我而言，只有活著才能夠冒險，只有冒險才叫活著。

正因為我更怕靈魂死去，所以無法控制自己去想像那些令人心馳神往的巍峨山峰，也不能停止產生走向它們的想法。我只有接近它們、看見它們、攀爬它們，才能體現我活著。³²

只有接近死亡才體現生命的存在。他獨攀的實踐，是個人化的行為，亦誠如麥克法倫所言高海拔魔力的共通情感代代相傳，有了文字、紀錄的形容與述說，吸引著人前往。

另外，張元植認為登山是一種擁有獨特重量感的運動，他的文章〈登山中的

探險》，頁 306。

³¹ 林雋：《與山的一支獨舞：與自己同行，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頁 141。

³² 林雋：《與山的一支獨舞：與自己同行，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頁 150。

死亡，對生命的凝視〉是對死亡的深刻探討：³³

對登山者來說，登山是更真切認識生命的途徑，其媒介就是背後可能發生的死亡。要注意，死亡永遠只是「可能」，但不會作為登山者的「選項」。這個「可能」，讓我們意識到生命的有限、認識到人體的脆弱、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但回到一開始，就算我們並非真的想尋死，而只是透過逼近死亡去凝視生命的樣貌，但那些殘酷的意外依舊永遠在大自然等待我們。³⁴

在山上的決定、意外都可能葬送生命，登山者明確認知到後果的嚴重性，在自然場域裡更加專心地感受山釋放的訊息，在熱愛之事投入熱情與生命，依然直面死亡，在短暫的生命裡盡力綻放。劉宸君直面生命，以書寫呈現等待與死亡懸而未決的處境，³⁵致友人羅苡珊的遺書日記是在與死亡如此貼近的距離中寫下的，藉書寫見證自己生命的存續，「我們已經凝視過一次死亡。我現在非常思念自己生命所經歷的一切，同時希望自己能活著繼續承擔生命。」³⁶

受困於岩洞，用盡末梢氣力的筆墨是對死亡肯認，羅苡珊形容這是一條牽連起「有所覺悟的書寫」與「對死亡的徹底自知」之間的細線：

書寫意味著對自身處境的肯定，對宸君而言，也就是對死亡的肯定。他並非欣然迎向死亡，而是對死亡的確定性說「是」；這樣的肯定，是為了引發後續對死亡說「不」的能力，並進而抵抗必死的命運。當他毅然躍入死亡之中，不再以為自己彷彿不會死去，他就掌握了書寫的權威；藉由書寫，他先接受了死亡、與之共存活，再抵抗了死亡。³⁷

處在盼望、恐懼、絕望的等待處境中，書寫是為抵抗死亡，抵抗遺忘，或許文字無法還原當時的絕境，銘刻於死亡的書寫，凝視生命本質的樣貌，劉宸君的書寫維持內在的清澈，走向生命盡頭時，湧現的是生與死的價值意義思忖。

海德格認為「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³⁸死亡作為人類生命的終點，隨

³³ 臺灣知名登山家張元植於 2024 年 6 月攀爬法國白朗峰，不慎失足墜崖，享年 36 歲。

³⁴ 張元植：〈登山中的死亡，對生命的凝視〉，<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features-mountain-climbing-about-death>。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9 月 26 日。

³⁵ 2017 年春天，劉宸君和旅伴前往尼泊爾登山，途中遇到罕見大雪，受困於岩洞中，當搜救援在受困第四十七天找到兩人，她已在三天前逝世。友人將她的旅行筆記、創作、書信與日記等散稿匯集而成《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一書。

³⁶ 劉宸君：《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臺北：春山出版，2019 年），頁 66。

³⁷ 劉宸君：《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頁 319。

³⁸ 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局，2006 年），頁 315。

時可能抵達於自身的結束，顯現人「此有」的有限性，是為「向死而生」，當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登山是高風險運動，死亡的感受程度特別明顯，既然如此，何以被山迷住的人，願意一次次走入險境，奧德鳩在《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中形容登山者為追求「令人目眩的輝煌風景」，即從巍峨高處往下望的視野，是可以付出生命的代價。³⁹於是高度、視野、峰頂如水波傳遞散開，歷史的幽遠情勢說明山岳的沉默召喚，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去想像高度，不斷牽動著向上拉的吸引力，美好的巍峨視野被歌頌，同時顯現高山失分的一面——痛苦、死亡，登山文本中關於死亡的尋思深化了登山書寫的內涵。

第二節 登山書寫形式探究

在資訊、山林開放的時代，相較於前期的團體登山，2000年後的登山朝向個人化的趨勢，文本的型態亦更加多元，不同背景經歷的登山作家呈現的面貌各自精采，開展登山書寫的演化歷程。在書寫各式精采的登山行旅和山岳紀錄之外，登山作家以不同的書寫形式共建多元的登山書寫文本，山女孩 Kit、劉宸君的書信體式，藉由對話與獨白抒發從登山獲得的自我探索；陳德政、雪羊（黃裕翔）的報導式書寫，除了有和真實世界接軌的文化觀察、登山議題探討之外，還有在登山的實際經驗基礎上文學性的書寫；劉崇鳳、王威智著重登山的個人體悟，指向記憶層面的書寫，形塑自我的山岳觀。

一、書信體式的獨白對話

山女孩 Kit 的作品有書信式的獨白和自我剖析，記錄登山的心靈之旅，涵蓋不同的文體和主題，作者透過「我」和「你」的言說過程中，把自我獨白傳達給讀者，讀者在閱讀時就進入了文本預設的收信對象，而這個「你」也開啟了多重的解讀空間。在《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一書中，山女孩 Kit 藉書信的形式，遊走在「我」和「你」之間，從真實的登山經歷中，共同經歷一場專屬於山的對話：

³⁹ 奧德鳩於 1827 年攀登阿爾卑斯山，即便做好預防措施，雇用六個嚮導，卻也敵不過高山帶來的身體折磨。訴說攀登過程異常艱辛，但為了白朗峰頂的視野，一切都值得了。他形容當時的風景「令人目眩的輝煌，幾乎讓人目不暇給，沒有任何語言的力量足以恰當描述。」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頁 219-224。

在山裡，你比較像你；
在山裡，我比較像我。
身體誠實地回應重量，
如同森林回應風。

山下那渺小的糾結，
懊惱的你總在練習懂。
而地球在轉，銀河在流動，
如同雲和森林不擔心風，
風自有風的辦法。⁴⁰

她具有渲染力的文字，適當地拉開距離，擁有哲思的探索空間，為登山的原因解答：「山上的一切如此確實與堅定，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節奏令我寬慰。」⁴¹她善於調控文字，將每個片段做出獨特的展演，緩緩傾訴山行故事。

此外，山女孩 Kit 以〈背包〉、〈帳篷〉和〈許可證〉登山常見的物品為題，在「我」和「你」之間的對話中，從實體轉向人生的辯證。背包作為容納登山所需的重要裝備，作者將背包化為愛與生命的思索：

把所有的好、所有的壞全打包，把愧疚與內疚都打包。被誤會了就把自己泡進眼淚，讓心膨脹得更重更重，直到你背不了、走不動。我就在此時此刻遇見你，生命的匯流召喚我迎你走去，你在我面前卸下生命的背包，一一打開所有牢牢打包的秘密，讓我直視你生命的課題。⁴²

登山所背負的重量就如同生命承載的重量，背著包走過山巔深壑，好比人生走過情緒的波折、挫折與磨難，只為與「你」相遇。從背在身上的帳篷體會到自己和登山的關係：

我以為把帳篷背在身上，就能得到安定與歸屬；透過長途徒步，就能明白自己的恐懼與遲疑。我原以為隨著日出與日落，隨著月圓月缺，便能知道生命

⁴⁰ 山女孩 Kit：〈風的辦法〉，《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臺北：遠流，2020年），頁148。

⁴¹ 山女孩 Kit：《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頁157。

⁴² 山女孩 Kit：〈背包〉，《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頁66-67。

為什麼給我這樣的課題，或為什麼人生總是那麼難。⁴³

帳篷是登山時暫時的安身之處，登山的移動代表著家的遷移，在這過程中作者由此思考自己的定位，進一步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

她的續作《沒有名字的那座山》延續山間日記的寫作方式，更把自己迷茫、脆弱的一面展示出來，開啟走在山途中、走在人生道路上的反思。面對自我迷惘和外界聲音，她以那些沒有名字的山比擬：

那些排名、那個名字，都是別人定義，而我不願這樣定義你。

你有你睥睨孤傲的姿態，也有破碎脆弱的部份。張狂與傲氣自然是你的模樣，那是旁人簇擁的，激賞的，想要湧進推拱的；但我想要守護的，是你哭泣時流在海裡的那滴眼淚。那淚滴隱身於千萬噸的太平洋浪湧中，和海一樣藍，也一樣鹹。我知道我分辨得出來。⁴⁴

「我」在實際的出走中，剖析自己的內心，經由書信式的獨白面對並接受山途中蛻變的自我，這種轉變不是外來強加的，而是內心探索後真實的坦露與接納，明白「找不到落點，或是害怕被討厭，那有怎麼樣，只要我撐得起自己，就能安身立命。」無須與他人競爭、比較，她真誠地面對自己，瞭解她所賦予登山的真正涵義，在出走的同時，帶來回歸自我的能量。

劉宸君的閱讀經驗以文學為主，其他登山知識、自然知識為輔。在受困山區時他寫稿不輟，書中從登山經驗與渴望出發，加上絕境時的心理變化，透過宸君特殊氣質的文筆表現出來，是一部不可再復的動人絕筆。⁴⁵《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是劉氏對寫作本身的深思，在移動中將走山路的經驗納入，「但在山上走久了就會知道，心裡的空間被打開，就會有更多的物事住進來，有時不小心走進自己內心裡面，整個人就會變成一座山。」⁴⁶在山間行走的劉宸君，想要呈現、書寫的是對於自我的追求：

失去的時候，你總要我閉上眼睛，想像一座山。

為什麼是山？我暫時停止心碎，歪著頭，感到不解。

⁴³ 山女孩 Kit：〈帳篷〉，《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頁 86。

⁴⁴ 山女孩 Kit：《沒有名字的那座山》（臺北：遠流，2021 年），頁 28。

⁴⁵ 吳明益：〈安靜的演化——我對近幾年台灣自然導向文學出版的看法〉，<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4072>。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9 月 10 日。

⁴⁶ 劉宸君：《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頁 243。

現在還不能告訴你，把眼睛閉上，開始想像就對了。他看起來興致勃勃，整個人散發著明亮的氣息。

我照你所說的閉上眼睛，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就是六歲時的林道，只是我避開了，轉而描述森林本身。⁴⁷

作者本身就是一座山，將自我投射於其中，記錄人生的記憶片段，嘗試拼湊、瞭解自己。啟程的原因在山裡、在自己，為走進內心世界的書寫，登山感受到生存最原始的悸動，在這裡可以毫無顧忌地打碎自己，再重組自己。劉宸君的書寫留下無涯的想像，引領其前行的是生命意義的探求。

二、報導書寫的文學性

登山書寫的作家多為專職登山者，他們的書寫呈現忠實的登山過程，及真切的山林情感。當登山家專注於攀登，又需要見證者，於是出現「山岳報導者」的登山作家，如雪羊（黃裕翔）、陳德政，兼具登山資歷與職業作家，再現的寫作中，從隨行報導者的角度記錄，同時有親臨現場的真實體驗，透過觀察人類的登山，去理解他人與高山的互動，裡頭更包含山岳文學想像、歷史文化探尋的多重底蘊。

《神在的地方》是陳德政在 2019 年與兩位登山好手呂忠翰、張元植共同攀登 K2，以隨行報導的身分書寫 K2 臺灣遠征隊紀行；《道拉吉里的風》為雪羊（黃鈺翔）的新作，在 2023 年與呂忠翰和張元植前往道拉吉里峰，記錄踏勘冒險紀實。⁴⁸兩部作品對八千公尺巨峰的遠征行動，做了詳實的登山報告，同時又具有文學的敘事技巧，從「非虛構寫作」來探討他們的寫作，⁴⁹其特殊性為「不是作家從這個地方萃取出什麼東西，而是這個地方從作家身上提煉出什麼精華，例如作家身臨其境才受啟發產生的新視野。」⁵⁰山岳在兩人的筆下呈現壯闊和浩瀚之美，各自開展不同的風格。另外，《記憶砌成的石階：翻越關門，布農丹社歸鄉

⁴⁷ 劉宸君：《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頁 216。

⁴⁸ 此計畫為橘子關懷基金會「大夢計畫：前進十四峰」延伸的「道拉吉里西北稜踏勘計畫」，山岳報導作家雪羊跟隨呂忠翰和張元植前往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西北稜，跳脫傳統路線，以及嚮導、雪巴隨行協助開路與背負行囊的商業攀登，是臺灣首度嘗試在八千高峰上自主攀登，建立自己的基地營，探索未曾被完整開發的路線。雪羊：《道拉吉里的風》（臺北：寶瓶文化，2024 年）。

⁴⁹ 非虛構寫作以紀實為基底，以小說布局舉凡傳記、散文、口述歷史、報導文學、田野調查等都能置放於其中，書寫的光譜龐雜，有議題採訪的深度報導、歷史文獻的調查報告、自然生態的踏查記錄等。

⁵⁰ 威廉·金瑟著，劉泗翰譯：《非虛構寫作指南》（臺北：臉譜出版，2023 年），頁 164。

路》⁵¹是雪羊跟隨花蓮馬遠部落徒步跋涉至海拔約三千公尺的中央山脈主脊，深度報導這趟尋根之旅，從人文面向登山，並探討原住民議題。

相比於前期楊南郡的報導文學，是以古道上的歷史為主軸，去重現當時的情況，加入了作者的主觀想法、對話，把枯燥的歷史事件加入小說的元素，使之更加有趣、生動。而此時期的登山報導書寫則是更聚焦於非虛構的寫作，即作者通過登山、山岳獲得的新視野，並奠基於實際經驗，將所見所聞與真實接軌。通過與雪巴、原住民等的互動，連結到歷史、文化的面向，企圖和真實世界對話，呈現更多的文學性特色。

以登山者與異文化雪巴的互動為例，彼此討論民族歷史、登山商業化，以強化非虛構書寫中與真實世界的聯繫。陳德政擁有職業的敏銳觀察，除了觀察阿果與元植之外，也注意到國際遠征隊的體系形成、雪巴的歷史故事，在與他者接觸的過程中，感受到異文化的山岳態度：

西方人在二十世紀對喜馬拉雅山區產生的狂熱，一舉改變了雪巴人的命運，也扭轉了他們的自我認同。每支探險隊都需要吃苦耐勞並熟悉地勢的挑夫，幫忙幹些粗活，早期的探險家驚訝地發現到，雪巴人的語言中並不存在「攻頂」這個詞彙，對這支虔誠的佛教民族，環繞家園的雪峰都是神明，人，是不會想到神明頭上動土。⁵²

雪巴的體質能在高海拔山地具有高度適應性，伴隨著商業化登山改變了他們，建立並掌握登山產業鏈，受專業攀登訓練的技術型嚮導，反過來讓外來登山者放低身段與他們打交道，陳德政洞悉權力倒置的關係，並瞭解民族的歷史脈絡，他筆下呈現的雪巴，有了更深刻的解讀。

雪羊同樣在攀登過程中產生文化價值的衝擊，特別是雪巴人的角色定位，從而書寫更多的自省和觀照。現在八千米攀登受到商業的干擾，衍生出許多攀登服務，甚至為追求登頂，對雪巴予取予求，頂峰執著／雪巴安全的拉扯，作為雪羊的關懷，帶出深刻的反思：

山依然是那樣地美，但依賴他人、依賴商業，終究讓我們，至少是我在基地營裡看到的大多數人，都失去了一種野生萬物都有，而人類沒有的自由。那

⁵¹ 雪羊：《記憶砌成的石階：翻越關門，布農丹社歸鄉路》（臺北：寶瓶文化，2023年）。下文簡稱《記憶砌成的石階》。

⁵² 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頁146。

就是「獨立」，一種不經手他人，徹底以個體之姿與大地對話的自由。

當五感接收到的資訊全由自己創造而未經任何干擾，能阻擋自己的，除了山與自身的能力邊界外再無他者，這時世界的邊界會退縮到想像的邊界，讓人得以創造出只屬於自己的純粹。⁵³

他形容在傳統路線上宛如「困獸」，經由他人架設整理的路線，失去人類在山體上創作的自由。兩位登山家探索未曾被完整開發的新路段，每一步的攀登、探勘都來自身體與山岳的自由創造，未知的追尋成就了前所未有的開拓。

由於天氣因素皆未能成功登頂、完成踏勘，他們的冒險紀實隨行紀錄見證了臺灣登山的歷史性突破，通過圖片與文字激發讀者對山岳的想像，陳德政以身體丈量高峰、以文字刻劃視界：

我們走的這條路被雪覆蓋，遼闊的雪原像一隻巨大的白色手掌，把剛踩出來的路又壓回雪中。這裡是地球上最荒涼的地方，沒有植物，沒有土壤，沒有任何足以讓人維生的條件，我們走在世界的盡頭。

此時天開了，一個黑色身體浮出我們左側的天空，像一頭被人驚擾的巨獸，披著雪白獸皮在地平線弓起身體，遮蔽了行路人的視野。啊！是 K2，世界第二高峰，無比清麗，無比神秘，蘊含了世間所有的殘酷和美。⁵⁴

恢宏的畫面展現宇宙最動人的景象，映照出人類的渺小，詩意的文字想像補足非虛構寫作的一塊，在冰天雪地裡徒步遠征，突破自我身體的侷限。雪羊描繪眼前之景：

那美妙的顏色漸層是我此生從未見過、由高峰無瑕的空氣與來自宇宙的陽光所共繪的曠世絕景。從陰影過渡到亮部，從深沉的幽藍延展至潮水般的淺藍，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紫色，乃至亮白，又或是紅與金黃交錯的七彩光芒；雪峰就是大氣的畫布，朝霞為這個只有黑白藍的世界，漆上了天才畫家都調不出的夢幻漸層。那不是人所能達到的境界，卻只是大自然在此刻展現的即興創作。⁵⁵

⁵³ 雪羊：《道拉吉里的風》，頁 180-181。

⁵⁴ 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引文分別來自頁 10、14。

⁵⁵ 雪羊：《道拉吉里的風》，頁 169。

凝視道拉吉里峰的日出，在這個旅程裡直面大自然最真切的畫面，捕捉常人無法輕易抵達的畫面，將所見之景的顏色，以文字共同譜出漫長山峰的壯麗風景。

雪羊的《記憶砌成的石階》以「回家」為目標的山旅故事，則呈現歷史文化探尋的意義，跟隨花蓮馬遠部落徒步跋涉海拔近三千公尺的中央山脈主脊，尋找家族過去的家，以見證者的身分，深度報導這趟尋根之旅。這趟登山的困難之處在遺跡的難尋：

由於山區與平地間相對位置關係，多數山區道路大都肩負東西交通之責，因此才讓許多深山原住民族的集團移住，包含八通關古道以南之布農族等，都是進行東西向遷徙。而這些越嶺道、警備道如今幾乎已柔腸寸斷，過去跨越處處深谷的吊橋也早已消失，才讓回家的路變得道阻且長。海拔上升至 2730 公尺附近，終於又遇見明顯的石階群遺跡了！比起爬升過程中的猶疑，這些石階的存在，是古道鐵錚錚的證明。⁵⁶

他在登山的過程聽到關於原住民的故事，比如傳統獵祭儀式和戰爭歷史等，從族群史觀來看，「許多人在登山過程中，若是途經傳統領域，只能欣賞自然風光的表面之美，而無法感受更深層的文化意涵。」⁵⁷雪羊的報導式書寫將部落回家的登山之旅帶往更深刻的人文內涵。

經過一個禮拜的跋涉，終於抵達家屋的遺跡，也是本次的終極目標，由於資料的散逸，並不能得知確切的位置：

因為布農族並沒有地圖記錄的重統，日本人也沒有繪製舊部落的配置圖，僅記錄門牌編號與家族資料，所以只能靠長輩手把手，將傳統領域中所有地點的位置傳承給後輩。他們對山林地貌的感覺與認知，是奠基於親身走過建立的連結之上。⁵⁸

在破碎的地帶嘗試推敲出家屋的所在地，比起休閒競技登山，這種沉浸式的體驗為的是尋根，把被遺忘在歷史洪流之中的記憶、生活等文化面貌重整，以傳承的方式留給後人，而雪羊以書寫帶領讀者了解這段塵封已久的山徑與文化。

過去原住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政策的因素導致狩獵文化被限制，至今仍

⁵⁶ 雪羊：《記憶砌成的石階：翻越關門，布農丹社歸鄉路》，頁 47。

⁵⁷ 雪羊：《記憶砌成的石階：翻越關門，布農丹社歸鄉路》，頁 134。

⁵⁸ 雪羊：《記憶砌成的石階：翻越關門，布農丹社歸鄉路》，頁 156

在爭取原住民的傳統領域。重返關門古道，是一條險阻的道路，在清朝開闢的古道早已隱沒於荒野裡，遙想當時的歷歷在目，嘗試召喚集體記憶。雪羊以中立客觀的態度，在這個實踐文化的過程中，選擇以持平的視角，流露出真實的原住民故事，讓這趟文化、記憶的傳承能被更多人看見。

三、抒情的心靈與生命哲思

有寫作者開始將焦點轉移於個人經驗的心靈之旅，添加關於山的比喻，加強了抒情性，運用細膩的觀察力，營造另一種深層內在的登山書寫，展示與自然互動後獨特的經驗和思考凝鍊，從而打開、找尋並安頓自我。例如在《我願成為山的侍者》中，看到劉崇鳳充滿魅力和情感的文字：

山有兩種氣味。一種是動物性的，活潑、狂野而暴戾，另一種則隸屬森林，內斂、堅忍而溫柔。後者藏在松果和葉瓣裡，或清幽、或濃郁，植物們用一生孕育。而火的氣味，則藏有遠古的密碼……。⁵⁹

讀到森林的興盛與衰敗、生命的茁壯與衰亡、時間的亙古與飛速，從嗅覺和觸覺記憶山，作者細緻的美感伴隨而來的是心靈的滿足，「自高海拔到溪澗，與千萬的生命相遇，我們什麼都有，不曾匱乏，我們原來如此富有啊。」⁶⁰此外能多次看到作者在山路上的體悟成了人生道路上的成長，同時她對山的互動、觀感也逐漸蛻變，相互的奔赴映照出更完整的自我。

王威智獲得多項文學獎，出版多部作品，⁶¹《凡人的山嶺》是他以文學作家的文字魅力建構登山中所感受到的不同世界，紀錄在山嶺裡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並丈量人類與山的距離，嘗試思考登山的意義；⁶²而《越嶺紀》以八通關越嶺道為主軸，從越嶺道的現況回溯歷史與其牽涉的族群紛擾，說明歷史現場處於

⁵⁹ 劉崇鳳：《我願成為山的侍者》（臺北：果力文化，2016年），頁103、108。

⁶⁰ 劉崇鳳：《我願成為山的侍者》，頁109。

⁶¹ 王威智曾獲得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喜歡讀地圖，喜歡走進臺灣的山，著有《我的不肖老父》、《製圖師的預言：十六世紀以來關於花蓮的想像》、《凡人的山嶺》、《越嶺紀》等書，繪本故事《兩個鼻孔一起 minasi》、《爺們不是好兄弟》、《惡地公的花生糖》等書，主編《台灣民主國郵史及郵票》、《臺灣老虎郵》等書，主持「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五種觀看花蓮的方式」，致力散文、繪本故事與「非虛構」寫作，獲「臺灣書寫」（國藝會，2020）及「花蓮書寫」（花蓮縣文化局，2021）專案獎助。花蓮縣文化局：〈王威智介紹〉，<https://www.hccc.gov.tw/zh-tw/ArtHeritage/Detail/72>。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9月10日。

⁶² 王威智：《凡人的山嶺》（臺北：蔚藍，2019年）。

變動的狀態，大自然會扮演收復和破壞的雙重角色，無須人類的涉入，草木土石會以自己的方式收拾歷史。⁶³

在《凡人的山嶺》中，他探討關於山林的魅惑、森林砍伐的問題、商業登山的本質、山難致死事故、百岳的迷茫等課題，其背後的動機來自於看見立體的臺灣島嶼，變化的位置，帶來不同的視角，仰望、平視、俯瞰，而我們視野所及的山岳，其實必須親自走進才能抵達，他認為：

爬山是一件事，所以爬山必有所求。這是武斷而危險的邏輯，卻不能否認其中含有某種正確，一種相當魯莽的正確性。有人上山覽看風景，有人求「百岳」之名，有人藉此營生，有人入山追求自在，還有人追求無所求，這些追逐與渴求，在本質上，看不出與普通日子裡的慾望有所差別。山就是山，荒野自然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不會教也扭轉不了人類世界的慣性和德行，不能讓人變得更好或更壞。⁶⁴

他清楚地觀看自己走進的山嶺，並以置身於外的姿態冷靜地剖析所看見的山嶺。在探討關於山岳等議題和百岳追求的質疑，最後形成更深入的辯證：

山是重的。爬山人各懷目標，對山對自然也各有想像和期待，有人把山頭當成既去則返的試煉場，攻頂就是一切，有人牢牢記住走向峰頂的每一步，試著熟悉沿途錯身而過的岩石草木，盡力遠眺，盡力觀察，使之化作記憶，讓山的重量化為自己的重量。不同的人持不同的態度面對同一件事，這是必然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就像山，同一顆山頭，角度不同，看起來就不一樣，山是立體的存在，人事也是。像山一樣，持重是好的，「爬山」若有所啟發，這是其中之一。⁶⁵

王威智肯定每個人對於登山的意義不同，保持個人的想法和目標是好的，認為山之於人最大的意義在於啟發，而非教導或給予，從個人的親身經歷中悟出登山的真義，藉書寫反映其心境歷程和體悟收穫。

王威智保持和山的游離感，能以更冷靜的姿態書寫，延續到《越嶺紀》有著

⁶³ 王威智：《越嶺紀》（臺北：蔚藍，2021年）。

⁶⁴ 王威智：《凡人的山嶺》，頁 259。

⁶⁵ 王威智：《凡人的山嶺》，頁 152-153。

作者獨特的歷史視野，本書對照毛利之俊編成的《東臺灣展望》，⁶⁶以照片和文字記錄觀看八通關越嶺道的現況，在作者看來大自然有其秩序，不偏倚、不好惡：

我站在徹底為草木佔領的塔達芬駐在所平台，深深感到自然的不偏愛統治者也不憐惜被統治者，如果衰敗確實是生命的一環，則大自然同時啟動駐在所和部落的荒廢史，顯然十分公正地執行了任務，無論官廳或家屋，都在應有的速度和手段下遭到吞噬。時間和時代似乎不然，它們聯手將其他同樣值得深究的事物扮成「看不見的大猩猩」，那些檢視集體迫遷史的厲眼，除了譴責，也傾盡心力一邊還原非人道政策的背景與歷程，一邊追溯被迫離家棄鄉者的來歷，卻似乎從未把焦點頭像他們如何看待山下的陌生大地。⁶⁷

他探求的是個人記憶的保留，「對於舊跡的非人為破壞，我不感到惋惜，也不認為應該花費資源勉強保存。」⁶⁸指向記憶的保存、自然的衰亡，他想保留的是最原始的山林，一個在持續崩壞的世界裡仍然美好的境域。

王威智以成熟老練的文字，加上登山的實際經驗，融合而成他獨特的山岳樣貌，一個游離於外的冷靜姿態，一個大自然以自己的方式撿拾的歷史，其獨特性建構了山岳的價值觀，亦注入作者的遙想和思考。

第三節 生態研究 / 高山職業登山書寫

隨著山岳政策的逐漸放寬，人民能更自由地進出山區，同時保育、生態意識提升，山區朝向永續發展，登山成為生態旅遊、環境保護的深刻體驗形式，開始關注深山中的動植物等生態環境，並從更安全與永續的態度對待山岳。登山書寫的行伍在此趨勢下茁壯，出現跨領域的山岳書寫，諸如研究保育類動物、稀有植物的生態研究者，潛入臺灣深山地帶；專職於山岳工作者的巡山員，肩負生態調查、林野巡視等工作，長期遊走於山林；負責帶領登山者的高山嚮導員，由於原住民身分或對高山極為熟悉，故能扛起領隊的任務，進行協同工作，若能將這類

⁶⁶ 《東臺灣展望》是日治時代介紹花蓮以及臺東，內含豐富圖片資料的一本參考書籍。昭和七年（1932年），東臺灣新報的編輯毛利之俊帶著攝影師，沿著鐵道與海岸線逐步拜訪東臺灣各個城鎮，也循著八通關警備道翻山越嶺，記錄了古道東岸沿線駐在所人文風景的圖像。開放博物館：〈《東臺灣展望》帶您重遊日治八通關古道！〉，https://openmuseum.tw/muse/map_story/15a0a4f0a4a32780341207891fe3c7f6。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9月10日。

⁶⁷ 王威智：《越嶺紀》，頁182-183。

⁶⁸ 王威智：《越嶺紀》，頁192。

的文本納入，相信會看到更豐碩的山岳。本節將討論上述山岳書寫作家的作品，藉此一探多元繽紛的山岳樣貌。

一、登山行旅與學術研究的結合

吳明益提及自然書寫的特色揉合「文學性」和「科學性」，作者必須有相關的「自然體驗」，⁶⁹且涉及環境倫理觀。於是黃美秀的《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⁷⁰被歸類在「科普書寫」的範疇，其文學性並非本文討論的範圍，可以肯定的是黃美秀的兩部科普紀實作品《尋熊記》、《小熊回家：南安小熊教我的事》⁷¹，展示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並揭開臺灣深山林生機蓬勃的動物世界，具有開創意義，後繼有從事野外黑熊生態研究的郭熊（郭彥仁），著有《走進布農的山》⁷²，將多年來與山為伍的心路歷程化為文字，結合生態、學術與個人體悟形成對森林的豐厚描寫。

另外，科學書寫有游旨价的《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⁷³與《橫斷臺灣：追尋臺灣高山植物地理起源》⁷⁴，則是潛入高山進行植物生態研究，嘗試追溯高山植物的遷移史與演化史，構築宏觀的生物地理學，是學術化登山書寫的代表作家。上述三位作家黃美秀、郭熊、游旨价皆是因為喜愛登山，而後進入了臺灣生態研究，將學術知識與書寫結合，下文欲論述書寫特色，以及身為研究者、博物學家展現的山岳觀。

（一）野生動物的生態調查書寫

研究野生動物的學者黃美秀，進入中央山脈深處的大分地區，以臺灣黑熊為追蹤對象，在彼時對於黑熊的認識不足，黃美秀的博士論文選擇黑熊研究，並著書出版，喚起國人的關注。在臺灣保育意識不高的社會中，啟發思考人與動物關係的互動，揭開黑熊野生動物的迷思，嘗試探尋人類與熊共存的世界。一般討論黃美秀會從生態保育、動物書寫切入，而本文欲以山岳為主題，說明黃美秀的作

⁶⁹ 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新北：夏日出版，2012年），頁24。

⁷⁰ 黃美秀：《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臺北：遠流，2012年）。

⁷¹ 黃美秀：《小熊回家：南安小熊教我的事》（臺北：遠流，2019年）。

⁷² 郭彥仁（郭熊）：《走進布農的山》（臺北：大家出版，2022年）。

⁷³ 游旨价：《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臺北：春山出版，2020年）。

⁷⁴ 游旨价：《橫斷臺灣：追尋臺灣高山植物地理起源》（臺北：春山出版，2023年）。

品。

黃美秀入山的契機是無意的，到美國攻讀博士時確立研究方向，進行臺灣黑熊野外研究，於 1997 至 2000 年間到玉山國家公園的大分地區探尋熊跡。大分位於玉山國家公園的中心地帶，人跡罕至，步道上有日治時代遺留的危險吊橋及棧道，大部分雜草蔓生、無路可探，抵達的過程相當曲折險峻：

古道從海拔三百公尺的登山口緩坡而上，蜿蜒三十四公里之後，因為濡潤的大崩壁而前去無路。我們在海拔一千七百多公尺的多美麗改道，直接爬陡坡上切至海拔二千一百多公尺的稜線，再朝西下切到海拔一千一百公尺接上古道。這些坡度都在七、八十度以上，我後來就稱它為「好漢坡」，這是大分要回家的第一關。稜線西側溪谷便是拉庫拉庫溪上游支流的開闊斯溪，以及對岸的大分。⁷⁵

超過五小時的登山才抵達標高一三五零公尺的大分。黃美秀以黑熊食用的青剛櫟為選擇依據，果實成熟之際，黑熊高機率會集中到大分，加上人為干擾少，有助於觀察、追蹤野生黑熊的習性，減少研究的不確定性。謹慎又大膽地決定，展現研究的專業，也在前無古人之下披荊斬棘。

《尋熊記》既是科普書籍，更有作者自我對話的私語，兩者共構成獨特的寫作形式。在附錄作者簡明扼要普及黑熊的相關知識，⁷⁶介紹臺灣黑熊的生態系、身體構造、活動習性等，為了解黑熊有基本的先備知識。同時作者擁有的專業知識在面對原住民傳統生態的直覺，擦出碰撞的火花：

接近溪谷時，大哥又停下來，指著地面上乾枯的樹枝說：「這是熊爬樹折斷的。」我抱著「他怎麼知道」的疑問，察看附近的青剛櫟及台灣雅楠的樹幹，果真發現黑熊的爪痕。即使我相信原住民生態知識的價值，但真正和它正面接觸時，我才發現，自己的邏輯和這近十年還所受的科學訓練，在這片依自然法則運行下的叢林，以及非科學、非主流範疇的大哥面前，正受著嚴苛的挑戰與考驗。⁷⁷

作者受到的科學訓練有設置捕捉陷阱、麻醉處理、判斷熊的年齡等，在實際操作

⁷⁵ 黃美秀：《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頁 50-51。

⁷⁶ 黃美秀：《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頁 260-270。

⁷⁷ 黃美秀：《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頁 36。

上仍需仰仗原住民的實務經驗。

黃美秀探勘黑熊行蹤，採集研究數據集結而成的文字，可見其形塑的山岳世界，其曾言出版的動機為「對台灣深山後花園的蠻荒原始與寶貴，以及瀕危的台灣黑熊多一分認識，進而對共同生長的土地多一分疼惜」，⁷⁸蠻荒原始的山林在生態研究員的筆下是山羌、水鹿、黑熊等野生動物的足跡，與動物的不期而遇，通過青剛櫟、山蘋果的碎片或動物的排遺推斷移動軌跡，建構一個杳無人煙而充滿生機的森林。

另外，郭熊轉向更為深入的書寫，體現作者的多重身分，從登山者、生態研究者到山林的自由人，是一條作者內在的演化痕跡。郭熊踏入山林的動機，並非登山家跑到群山峻嶺去攀登高峰的經歷，而是研究者在山野撰寫的科學調查故事。不同於登山作品著重於登山的過程，或是自我挑戰的心路歷程。郭熊更像是一位博物學家：

我將登山的渴望投射在博物學家式的探險科學研究世界之中，未曾離開山，反而更加投入森林與野生動物世界，也嘗試效法博物學家全心全意的堅持，永遠把筆和手札本放在胸前口袋，一邊詳實記錄自然物候變化，一邊抽絲剝繭推測各種原因。⁷⁹

其專業領域為動物保育研究，卻對森林中的植物、昆蟲等瞭若指掌，能細數玉山圓柏、次柏樹的外觀、特性等，或是藉植物生長的分佈來判斷海拔高度。這是需要長久的蹲點，加上認真的觀察、記錄才能有如此厚實眼光。

此外，郭熊的山岳書寫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動物的視角進行生物的行跡：

獸徑直直穿越冷杉林，水鹿的腳印保留在凍硬的泥土上，仔細一看，還有山羌，也少不了野豬與台灣獼猴的足跡。這是一條使用數百年的古老山路。冷杉混雜少許二葉松樹，茂密的刺柏與懸鉤子叢卡在大樹腰間。我邊走邊看，學習動物的步伐，在刺柏間左彎右拐，巧妙避開圍籬般的灌木。⁸⁰

看一看青剛櫟樹上的熊抓痕，經年累月之下，新的抓痕覆蓋在舊的抓痕之上。一旁的熊窩是用賽山椒灌叢搭成，感覺十分蓬鬆有彈性，看起來相當舒適，

⁷⁸ 黃美秀：《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頁 25。

⁷⁹ 郭彥仁（郭熊）：《走進布農的山》，頁 36。

⁸⁰ 郭彥仁（郭熊）：《走進布農的山》，頁 22-23。

彷彿眼前有一隻熊四腳朝大慵懶地窩在裡頭。⁸¹

生態研究者即為「追蹤者」，對任何訊號感興趣的生物世界的實踐者，將注意力關注在他以外的生物，蒐集訊號，並在想像中建立對話，啟動豐富的感官，盡可能地張開感覺、演繹和詮釋，想像生物的活動軌跡。

郭熊在《走進布農的山》，由於大分地區與布農部落重疊，入境隨俗跟著布農的文化，每次進山的入山儀式，學習布農與萬物的互動，郭熊一名字正是布農人賦予的，是自我定位的肯認，亦體現山林自由人的價值，孤身在深山裡長時間的研究，卻不被研究乃至山林束縛，與原住民文化的雙向奔赴，走進布農的山同時又走出自我認同。在長時間的山林獨處和工作經驗中，通過與大自然的互動，檢視並思索自身與萬物的關係。

郭熊以複合狀態描寫森林，使讀者就如同複眼人，跟著一覽山林中的植物、動物、人文、文化等，作者從專業研究者的角度，揭開中央山脈深處的森林樣貌。

（二）高山植物的研究書寫

延續學術性登山的精神，游旨价是擁有學術背景的山林作家，作為高山植物研究的學者，他的作品兼具學術之眼與文學之筆，將登山、歷史與生態凝鍊，形成臺灣森林與高山植物的新視野，突破時空的限制，從植物地理學的角度深度認識這座島嶼高山的身世。就登山書寫的脈絡觀之，游旨价承繼日治時代博物學者以科學和知識進入洪荒山林，研究植物及其分布、物種與演化，更為啟發的是從日本學者的文本記錄裡尋覓到高山植物的線索，⁸²實際前往關門山，這條日本時代即存在橫貫中央山脈的東西聯絡道，在海拔近三千公尺的高山上找到百年來尚未被破譯的植物密碼：

親眼在花蓮深山見到長葉小檗與高山小檗的那份興奮與激動，至今仍然十分難忘。回想一路上，年邁的朱利安與我們這些年輕人一同鑽行在破碎的山徑上，與螞蝗和芒草搏鬥，屢屢跌倒後再奮力爬起，只為親身深入關門山區尋覓小檗：他炯炯有神的雙眼，透露出堅毅不屈，宛如兩百年前開啟世人視野

⁸¹ 郭彥仁（郭熊）：《走進布農的山》，頁 235。

⁸² 例如：游旨价研究長葉小檗和高山小檗時首先參考早田文藏的《臺灣植物圖譜》，發現兩種小檗的標本採集地點只簡單標註「中央山脈分水嶺」，範圍過於空泛，隨後在森丑之助的《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裡找到在臺灣旅行的紀錄，進一步於〈中央山脈橫斷探險報文〉中推敲到最有可能的採集地：中央山脈關門山。見於游旨价：《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頁 122-131。

的那群外籍博物學者。⁸³

自身的學術專業結合登山行旅，恰好回望日治時代博物學的學術精神，深入高山調查，進而藉現代科學的技術打開山脈深處未知的物種。

游旨价以臺灣高山植物為主軸，連結世界植物的分布模式，揭示臺灣的高山植物與喜馬拉雅山以及北半球環極地有所關聯，其第二部著作《橫斷臺灣》以此為題試圖釐清橫斷山、喜馬拉雅山與臺灣高山生物相的相似性。游旨价追尋鹿野忠雄未竟之事，到泛青藏高原進行植物考察，從中發現臺灣高山自然史失落之的正是在橫斷山。

游旨价的高山植物書寫不僅擁有田野調查，實際進入高山進行研究，也從文獻資料、植物學研究理論來探析植物分布的關係，以植物研究的角度認識台灣高山。以被稱為喜馬拉雅杜鵑花的山地杜鵑花為例，游旨价先從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喚起興趣：臺灣高山的生物可能起源於喜馬拉雅山，帶著這個想法研究。他進出多次高山探訪杜鵑花，一次從屏東翻越中央山脈前往臺東，緩步穿越茂密的森林：

作為學習開路的登山社學員，我必須無懼黃藤並且努力跟上前方學長行軍般的步伐。如此埋頭前行整個上午，直到背後突然傳來一陣涼意，……終於攀上中央山脈主脊，我們所處之地海拔已過一千八百公尺，非常接近主稜線的高度。此處不若低海拔的密林嵐煙，只有透空的山脊和布滿綠苔的大石與匍匐矮林。一片茂密的灌木叢擋住我們的去路。這些小樹約二公尺高，樹枝彼此糾纏，原來是「杜鵑地獄」。⁸⁴

對登山者來說，臺灣杜鵑林是夢魘，軟韌又堅實的枝條纏繞構成緊密的結構，只能從中勉強找到空隙鑽入。就游旨价植物學研究的角度，形成不同的風景，他從落葉的化學物質了解到臺灣杜鵑在中海拔山區繁盛的原因，還有他列舉西方著名的植物獵人威爾森來到臺灣蒐集山地杜鵑花的種子，研究發現玉山杜鵑和泛喜馬拉雅山區的物種有著親緣關係。

作者嚴謹的學術考察，且融入閱讀國內外與中國古典文籍的自然史、文獻心得，將深奧的研究成果轉譯為清晰脫俗的文字，豐富的考察經驗使得他能回應西

⁸³ 游旨价：《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頁 127。

⁸⁴ 游旨价：《橫斷臺灣：追尋臺灣高山植物地理起源》，頁 59-60。

方與東洋早期對臺灣山林的觀察。

登山書寫的跨領域研究、高山植物的跨尺度時空追溯，游旨介寫的不僅只是植物，更是臺灣高山與世界眾山的連結。從全球視野的寬廣與地質年代的縱深解開高山之謎，其細膩且深入的筆法，書寫高山之於自己的意義，體現出他的文學之筆：

經過橫斷山這片大山的洗禮，我感受到人生始終圍繞著山的離去與歸來，更有感於山的外型地貌只是祂最容易接近的一面。因為，橫斷山真正讓我感到巨大的，並非實際的山巒，而是山上植物千萬年來的演化，以及幾代人們逐夢的遺緒。這些跨越時空存在的無形之物，可以跨越國界，超過物種的藩籬，讓山真正在意義上如海洋一般遼闊。⁸⁵

從植物學敘事角度探求高山植物的原鄉，瞭解臺灣島嶼的生命並不孤獨，臺灣高山繼承遠古的山脈，於歷史的洪流中新生，在此同時正藉由植物學接近作者的心靈原鄉，從廣袤山林裡獲得的豐富生命，以探這片土地演化的歷史與回憶。

二、高山職業工作者的山岳書寫

森林護管員，又稱巡山員，主要工作地點為臺灣的山區，培育並保護珍稀的植種，並進行山林治理等任務。⁸⁶而高山協作者，其工作職責為負責背負、搬運物品，擔任高山嚮導、領隊，⁸⁷多是熟悉山林的原住民，同時在協作中認識部落的文化與歷史。一般多關注登山者及其攀登的故事，甚少留意在山林裡默默工作的人們，阿步（浪漫巡山員）與沙力浪，以巡山員和高山協作者的身分書寫不為人知的山林故事，下文對兩位作家的文本作探討，一窺高山相關職業下呈現的山岳。

⁸⁵ 游旨介：《橫斷臺灣：追尋臺灣高山植物地理起源》，頁 94-95。

⁸⁶ 森林護管員為第一線森林保育工作者，負責業務包括森林資源調查、經營與保護；林地管理及植樹造林、撫育；林區步道巡護、野生動植物保育與棲地保護；防災工程測繪與監工、林道與林業設施維護等。林業保育署：<https://www.forest.gov.tw/ForestNews/0072371>。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9月10日。

⁸⁷ 山域揹負作業者（以下稱為高山協作者）工作性質特殊，其可能因他人或團體之山區旅遊、生態調查、山區環境工程、緊急救難及其他等需求，受委託於不同山區地形環境下，協助從事揹負重物的活動。其揹負作業，除因揹負重物導致的工作負荷外，其作業活動地區經常位於高海拔地形及天候不良之高山地區，也增加其作業難度及負荷，而有相當大的潛在危險。勞動部：〈山域揹負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指引〉，<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id=FL097511>。最後瀏覽日期：2024年9月10日。

在以山林為工作場所裡，阿步從親自參與的巡山員業務中體悟到「這份工作一點都不浪漫，浪漫的是這環境給了我們堅持下去的動力」，⁸⁸用文字訴說森林現場的哀愁與美麗。浪漫背後的辛酸、醜陋面目於荒野一覽無遺：

雲霧帶的生態豐富，從地上的青苔到邊坡上的神木，從冰河子遺（源自冰河時期遺留至今的生物，例如紅檜、台灣冷杉、山椒魚及櫻花鉤吻鮭等）的山椒魚到食物鏈的王者——台灣黑熊，都會在這地方出現，也因此各種動物的保育、監測，還有制止非法盜獵的獵人與山老鼠的各種破壞，所以這裡的巡山員早出晚歸，作息不正常的大有人在。⁸⁹

大雪山海拔約略兩千公尺的雲霧帶是森林的核心地帶，孕育豐富的生態系，重要的生態資源成為山老鼠眼中的寶物，盜砍珍貴樹木、神木，此外有攝影者利用食物或播放叫聲，誘騙山雀、帝制等鳥類，打亂生物的自然生態，更不用說無數的人為破壞。然而巡山員只能勸導，並無執法權，因此面對山老鼠或無視法規者能做的不多，坦露出作者的無能與無力。

堅持下去的動力源自於熱愛山林的熱忱，親眼感受到森林的浩瀚美好：

「深山特遣」一直是我們巡山員的重頭戲。每年都要來個兩到三次的大冒險，時間都是五天以上。內容不外乎是去台灣的每個山林角落，巡視是否有遭山老鼠破壞的神木，還有看看其他地區的樹木是否有長大茁壯的跡象。因為是長天數的行程，又都在深山裡，所以往往都要背負數十到三十公斤的行李。

90

深山特遣的工作有調查森林樣態、抓山老鼠等任務，不同於傳統登山步道，巡山員跋山涉水，行走於懸崖峭壁、稜脊秘境，肉體的苦行只為完成任務，艱鉅任務的身後是巡山員的付出與毅力。尤其是碰到森林大火，「要用各種垂降技巧走在懸崖峭壁，能上去的人也不多，所以一隊上去可能會待五至十天不等。」⁹¹耗時又需要人力，來阻止火勢蔓延，也抒發了阿步面對森林火災的心情，人為造成的傷害何時才能恢復森林的蓊鬱狀態。

⁸⁸ 阿步（浪漫巡山員）：《浪漫巡山員》（臺北：寶瓶，2024年），頁281。

⁸⁹ 阿步（浪漫巡山員）：《浪漫巡山員》，頁45-46。

⁹⁰ 阿步（浪漫巡山員）：《浪漫巡山員》，頁71。

⁹¹ 阿步（浪漫巡山員）：《浪漫巡山員》，頁129。

阿步沒有過分浮誇的文字，如實地陳述日常工作的模樣，裡頭有不安、氣憤、感慨，回頭來看正是這森林的滋養成就了浪漫。巡山員的山岳視野是廣袤山林裡罕為人至的景致，近身保育生物，直面森林大火，進而思索對待大自然的態度，如果我們對於自然沒有一點危機意識，就貿然地走進森林裡，那我們就像是個全身赤裸的人走在都市叢林裡一樣，⁹²阿步的山岳教育意義亦體現文中，從分享巡山員工作到登山教育、山林知識的宣導，仰賴的是對山岳的一片赤誠。

原住民的生活與山林自然緊密，臺灣的山岳是他們熟悉的生活場域，臺灣原住民文學作家的書寫，處處可見的是關於臺灣自然「本土技藝」的發聲，相當程度地提供了我們對自然寫作思想上的出路。⁹³由山林生活經驗衍生的山岳觀，形塑深度的山岳價值，不同於漢人親近的山岳，對原住民來說正是自己生活的大山領域，以原住民主體文化與視域書寫，構築豐富的寫作面貌。沙力浪的《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即以此為題，⁹⁴書寫自身從事高山協作與背工的故事，回溯百年來族人的山林智慧和生活世界，藉重建家屋再現傳統村落，其所做、所書寫是為族群發聲、為文化記載。

沙力浪記錄的是高山協作者的生活，也在進入山林的歲月之中，書寫在群山裡工作的族人，高山協作的印象在歷史的流淌中逐漸清晰：

從清朝的背伕、日治的背工、隘勇，當代的高山協作者們，會在山上工作的族人，大部分還是以生存為主要訴求，這樣才能溫飽家人，才能講求更深一層的心理、文化層面。在高山工作是一份很辛苦的職業，但是對族人來說，它是一份少有可以留在部落，又可以在傳統領域行走的一份工作。透過這份工作看到自己祖先走過的路，族群的歷史感自然而然的就加注在自己的身上。或許對在山上工作的人來說，不會把深奧的族群文化、族群認同，輕易說出口。但是這群在山上工作的族人們，用腳走出自己的路，用頭帶背出自己的生命經驗，說出祖先的歷史。⁹⁵

山岳的深度洗禮對他的內在產生深切思索，鎔鑄自我族群的認識、認同，背帶背起的是生存、文化和生命經驗。不論是古道調查、修復家屋，沙力浪親自探訪文化母體後，追尋 / 重塑族群想像，試圖重現百年前布農人山居生活的地景。而布

⁹² 阿步（浪漫巡山員）：《浪漫巡山員》，頁 214。

⁹³ 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臺北：印刻，2003 年），頁 154。

⁹⁴ 沙力浪：《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臺北：健行文化，2021 年）。

⁹⁵ 沙力浪：《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頁 12。

農文化欠缺文字的保留，更是集體認同的匱乏，沙力浪以原住民的眼光拾起失落的歷史：

布農族族人拿著獵槍保護日治時期的日本學者，讓他們去做一些研究調查，釐清高山的地理環境、生態知識。當越來越多的族人帶領日本人入山，族人們的傳統山林知識，也將被日本人所用，削弱了布農族族人對山岳的掌握，逐漸喪失八通關越嶺道路原有區域的主導權，最後只能拿起獵槍反抗。⁹⁶

用頭帶做背負的工作，本來是用來為族群工作，然而為外來政權服務的後果是生存空間、部落文化的破壞。現在，背起一塊塊的石板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園：

為了修復位於佳心舊部落的 Istasipal 家屋，二〇一八年初時，開始作業。……最先要克服的就是距離，都必須在佳心和卓溪之間來回的穿越。因為載送不易，以及素材處理的難度高，木料、還有大量的石板，都必須在南安的工作室先處理，再用人力把材料背到四公里遠的佳心。……這次的高山協作們，總共要背完十噸的石板，十噸的木料。⁹⁷

修復家屋需要文獻資料、田野調查的準備，再加上族人們對石板屋的想像，重現百年前布農族人山居生活的地景，也是連結歷史、文化、人類和土地的關係。前述提及山岳的話語權掌握在執政者手中，卻甚少以原住民的角度書寫，文化和政權，如此弔詭的對立，歷史再度重演，日人留下的文獻裡將原住民置放在邊緣位置，隨後漢人來到臺灣，又運用權力剝奪其生存環境，遠離山林。沙力浪正做的或許就是以文字背起與族群、家園的對話，重新建立布農族和祖居地的牽絆，以追尋部落文化的根源。

小結

臺灣山林政策的開放，登山朝向個人化、大眾化，因此多元風格的山岳書寫應運而生，拓展到人文、生態、地理等主題面向。本章節從山岳作者的身分作分類，討論登山家、專職高山工作者（生態研究者、巡山員、高山嚮導）呈現的山岳面貌，以及山岳觀，並探討其登山契機與追尋。

⁹⁶ 沙力浪：《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頁 61-62。

⁹⁷ 沙力浪：《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頁 197-199。

第一節先討論現代人類登山的契機，有為暫時跳脫城市、文明的現實世界，而嚮往大自然的懷抱；有作為自我挑戰、成長的探求，從以登頂為目標的攀登到挖掘身體的極限，連志展、江秀真、詹喬愉、呂忠翰連袂展現登山動機不同的意義。歸於平地後的依歸，從登山教育開始，長期的山岳疏離文化、政府山林政策管制，使臺灣社會逐漸淡忘登山探險的文化，登山家以書寫分享個人經歷並實踐登山教育。再者，山難的發生，登山者開始意識並深刻探討死亡的議題。

接著討論登山書寫的不同類型，山女孩 Kit、劉辰君以書寫體式的獨白，書寫內在世界的對話，藉登山探求自我和生命的意義；雪羊、陳德政以報導者的身分，書寫登山經驗，並蘊含山岳文學想像、歷史文化探尋，他們文學性的山岳畫面是基於實際的攀登，捕捉真切的景色和文學想像，譜出壯麗的氛圍；人文學門出發的劉崇鳳、王威智則以抒情的方式將山岳與個人經驗連結，更著重於記憶和生命取向的思考，蘊含內斂的山岳思考。

第三節分為生態研究、高山職業書寫。首先，生態研究者結合登山行旅和學術研究，以黑熊為例，黃美秀和郭熊從事野外動物調查，深入高山地帶，從動物的足跡建構森林的面貌，從生態、人文檢視自身與萬物的互動。而作為高山植物的游旨介結合學術性登山，並從植物學的角度探求植物的原鄉，他的研究揭示植物和土地演化的痕跡，並從日本學者的博物誌著作、相關文獻認識高山。再者，巡山員和高山嚮導是高山職業工作者，阿步、沙力浪的作品揭開罕為人至的山林景色，又藉背工任務追尋並重現族群想像。

豐富的山岳書寫文本，作家從不同的學經歷、職業別，呈現山岳的生態、人文、文學等多重的面貌，以及各自追求的登山契機和內涵，不論是熱愛登山、從事高山相關職業，又或是藉學術研究進入高山，都展現了人們親近山岳，進而豐厚臺灣的登山書寫，也展現山岳的價值和文化淵源。

第四章 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反思探討

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發展概況，扣緊社會脈動，除了作品呈現的豐富意涵之外，也反映出時代趨勢和特色。本章主要以文本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作為切入探討的方向，從女性登山書寫、集體書寫形塑的地景來討論登山書寫。女性登山書寫文本中呈現的性別、身體符碼，呈現女性如何在時代的變遷、性別觀念的轉換下，形成自身的價值和登山意義的追尋？此外，臺灣登山書寫中常見以聖母峰和玉山重要的山峰為書寫對象，從登山攀登史、外部環境探討山岳形象的內涵和改變，以及如何通過書寫形塑地景？由此反思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議題。

第一節 女性登山書寫探討

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以及科技網絡的進步，臺灣現代女性開始掌握身體、思考自主權，從 1990 年代開始，大量成長的女性登山人口，構成女性登山書寫的龐大隊伍，不容忽視其重要性。在這些女性登山書寫中，透露出哪些不同於男性的訊息？呈現出何種不同的性別意義？女性在山岳空間中的身體界線和感受，如何展現？本節通過這些文本的剖析，對於女性登山書寫有更完整的認識。

一、臺灣女性登山書寫歷史溯源

目前世界上所指的「近代登山」，為 1786 年人類登上歐洲阿爾卑斯山最高峰—白朗峰之後，至此「登山活動」有了劃時代的轉變，「近代登山的內涵有別於過去因生存、宗教和軍事目的的活動，而是透過科學來瞭解山岳，並以登山為目的，享受登山活動的樂趣，其中還隱含著征服山岳，以及伴隨登臨山巔而來的榮耀，這些正是近代登山提倡的精神。」¹登山傳統上帶有強壯、征服的意味，長期以男性為主導，被視為一種展現男子氣概與帝國權力的運動。

就西方的山岳歷史來看，十八世紀以降的大英帝國，探險與登山被看作是展現男子氣概的新興運動，因為它特別地需要知識、體力、決斷和耐受度，而這些

¹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臺北市：玉山社，2008 年），頁 16。

特質被視為是男性獨有。²這種根深蒂固的性別印象，將女性隱性地排除於登山之外，早在 1965 年，所有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都已有人類攀登的痕跡，卻不見女性的身影。直至 1975 年，日本的田部井淳子成為首位完成世界之巔聖母峰的女性，隨後在 1978 年，由美國組成的女子遠征隊成功登頂安娜普納峰（Annapurna），³至此女性開始積極參與近代登山的歷史。

而臺灣最早女性登山的記錄可追溯至日治時代，林玫君在〈臺灣女性登山史〉一文中說明 1917 年女學生被帶至陽明山郊外教學，以及 1927 年第一批女學生攀登玉山，日本治臺實施的體育教育，將臺灣女性從「放足運動」中解放，突破傳統觀念和生理限制，學校鼓勵女學生走進山裡，掀起登山熱潮。女性長期受到傳統禮教的束縛，被冠以溫柔賢慧的形象，在此走向新的時代意義，也是身體解放的契機，彰顯「新女性」的全新面貌。不過林氏在文中指出「女性參與登山時的諸多保護和照顧，反而呈現其附屬性」，⁴確實是女性在登山運動中面臨的一大考驗。

戰後紛擾的外在環境，加上戒嚴期間的山區管制，臺灣登山活動一度停滯。在早期山禁的年代裡，救國團辦理的登山活動蔚為風潮，以登山活動而言，從 1953 年以來，救國團牽引著年輕人登山，許多青年學子首次接觸高山，就是參加救國團的活動，它可說是青年學子登山的重要啟蒙。⁵徐如林的《孤鷹行》裡記錄了她參加救國團舉辦的登山活動，以及在大學登山社時的趣聞，在女性少有的登山書寫中初次展露，讀者得以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以及女性參與登山活動的情況。

1971 年成功的「中央山脈大縱走」開啟縱走與會師的風氣，縱走與會師的登山形式需要精密計劃和豐富經驗，動員人力及安排會師運補作業，是項艱難的任務。1993 年陳秋霞、陳美馨和游寶環主辦首次「純女性」隊伍完成大縱走，⁶對

² 珍妮佛·喬登著，呂弈欣譯：《殘暴之巔：K2 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臺北：臉譜出版，2022 年），頁 27。

³ 女性在 1974 年突破八千公尺高山的標高。由三名日本女子組成的團隊：內田昌子、森美知子與中世古直子攀登了八千一百五十公尺的世界第八高峰馬納斯盧峰（Manaslu），最後卻以悲劇畫下句點，其中一位在下撤時摔死，並未登頂。一年後，波蘭的安娜·歐科平斯卡與哈利娜·克魯格—史羅科斯卡抵達巴基斯坦八千〇三十五公尺的迦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無氧攻頂，架繩隊全由女性組成。珍妮佛·喬登（Jennifer Jordan）著，呂弈欣譯：《殘暴之巔：K2 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頁 57-58、65。下文簡稱《殘暴之巔》。

⁴ 林玫君：〈臺灣女性登山史〉，《臺灣學通訊》第 313 期（2023 年 3 月），頁 31。

⁵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97。

⁶ 1993 年由陳秋霞、陳美馨和游寶環三人首次組隊完成「純女性」的大縱走活動。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105。

女性參與長程登山活動有莫大的鼓勵。其次與女性登山相關者，尚有愛山的新人選擇在玉山完婚，更有以中大縱走形式組成登山隊，在南湖大山舉行婚禮，⁷陳貞秀《山の花嫁》即為一例。陳貞秀以女性之筆，記錄這趟與丈夫以及兩位男性友人的登山過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識的以女性眼光書寫，其中可見性別的互動、想法之差異。

女性攀登海外高山，自 60 年代以來，尤其是喜馬拉雅山的攀登，已成為臺灣年輕一代越來越明顯的新選擇，⁸她們陸續拓展至世界各地的山岳，而 1990 年代可說是臺灣海外遠征攀登的高峰，不同類型的隊伍各自組成進行海外攀登活動。在女性登山方面，直至 1982 年首支專由女性組成的天靈峰「女子遠征隊」啟程，雖然由於政治因素而未能攀登完成，仍彰顯著女性登山的崛起，⁹接著更多的女性在當時突破女子最高登頂記錄，其中李美涼、林乙華在 1999 年成功登頂尼泊爾島峰是臺灣首次女子遠征島峰成功的紀錄，隨後在 2001 年登頂阿空加瓜峰，是女性首登南美最高峰者，李美涼、林乙華合著《南美攀登記》，記錄兩人參與國際隊伍攀登阿峰的故事。

2000 年以後隨著臺灣的登山活動趨於大眾化、專業化，越來越多人走向山岳，其中女性登山書寫者不可勝數，身分也越來越多元，有生態研究者黃美秀、以自身熱情從事登山活動的劉崇鳳、劉宸君、山女孩 kit 等共同譜出女子山岳的視野，她們登山的場域從臺灣本島到世界的高山，都有其身影。女性以其特有的眼光，書寫在旅程當中與他者的互動，在長期被視為雄性氣概的山岳活動中，從試圖對抗性別限制，到尋找自身的價值與登山的意義，女性作家各自以其書寫豐富女性登山書寫，這時的女性登山書寫，也在形塑其主體性，確立個人追尋登山的意義。

二、女性登山書寫中的性別意涵

在雄性氣概濃厚的登山活動中，女性登山者的參與注入了登山與性別關係的討論，她們登山過程中涉及到的生理問題、身體界線亦為性別特有的課題，以及

⁷ 李九柑和顏鎮國兩人在 1978 年完成中央山脈大縱走，並在南湖大山辦婚禮。參自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106。

⁸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臺北：李希聖，2005 年），頁 212。

⁹ 當時共有女性八人組成登山隊欲攀登尼泊爾天靈峰，卻因政治因素，途中被取消攀登許可，因此並未成功登頂。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總論》（臺北：營建署，2013 年），頁 180。

與他者互動中的性別展演，嘗試突破性別限制以尋找自身的價值，女性在登山書寫的脈絡中，從依附於男性的附屬處境，到能弭平對性別的認識，以誠實的態度看待自己。對於女性而言，這些過程呈現何種不同的性別意義？本小節擬透過作品的探討，對臺灣女性登山書寫有更完整的瞭解。

（一）突破與獨立：破除性別的依附與偏見

在過去被視為展現男子氣概與帝國權威的登山運動，女性是被受到照顧、關注的群體，徐如林在〈哈隆·烏來〉記錄她與嚮導哈隆互動的趣聞，「只要經過較為危險的地形，或是走在較陡峭的路上，哈隆總是細聲地叮嚀，同時把手伸過來讓我扶搭，一派紳士風度。」¹⁰哈隆尊敬女人，除了宗教因素外，也是對女性的特別照顧，看似單純的互助關係，卻蘊含一般人對女性通常需要幫助的想像。

同樣地在《南美攀登記》中，李美涼、林乙華參與國際登山隊伍，隊伍中其他成員都是男性，自然會對女性表達關切，女性同時也會受到特別對待，男性隊員並沒有停下來參觀印加橋，而「或許是因為女性，也或是二人行動容易，一路上薩巴斯騰不時停車，讓我們觀景拍照，比起其他人，我們真是幸福多了。」¹¹通常被認為是陽剛性質的登山活動，會以男性作為主導，李美涼、林乙華表示「身為隊中唯一的女性，我們自然也是他們討論戲謔的對象，只是不那麼明目張膽，待在這個隊伍得經得起開玩笑。」¹²尤其是隊員們多是來自西方世界人高馬大男性，自然會擔心能否追趕上隊伍的進度，且在初期的作戰策略，「登山活動安排必須以體能最弱的隊員為考量，雖然會減緩隊伍的速度，卻是安全的重要關鍵，另一方面也會因此減低其他隊員的壓力，我們兩位女性自然成為密切觀察的對象。」¹³她們必須通過自身體能、登山經歷的展現，在男性的觀察之下，才能證明不必受到特殊對待，有能力完成攀登。

而《山の花嫁》是作者陳貞秀無意的一句「走完中央山脈再結婚吧！」而展開的登山之旅，她描述了與丈夫性別特質的差異，「阿展喜歡冒險、挑戰，喜歡走別人沒走過的路，而我很膽小，總是要確定是安全的、可以掌握的，才能放手去做。」¹⁴該書更多描繪的是與丈夫間的性別互動，和伴侶登山雜揉著複雜情緒，

¹⁰ 徐如林：《孤鷹行》（臺中：晨星，2017年），頁157。

¹¹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臺北：大塊文化，2001年），頁20。

¹²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39。

¹³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39。

¹⁴ 陳貞秀：《山の花嫁》（臺北：野人，2005年），頁37。

要照顧到另一半的情緒，同時也會有被照顧的期待，作者自述「並沒有想像中勇敢，很希望身邊的阿展能照顧我」，¹⁵而阿展卻沒有留意到她的恐懼，還以開玩笑的語氣表演她的行為，能感受到作者遊走在獨立與依賴的矛盾心態。縱然作者在序中已言明是有意識的以女性的眼光進行書寫，仍見得女性不自覺地會想依附於男性的保護與幫助。

因為性別的不同，這些看似保護、特別對待、戲謔等的動作，實際上是以男性立場為出發點的思考模式，對女性登山者帶來更多的困擾，也因此說明女性登山者比起男性更需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和不便，諸如外在社會的觀念、生理條件、內在的自我價值以及登山途中的安全問題等。

早期的女性登山者較為強調突破傳統的性別觀念，也承認性別帶來的限制，徐如林在《孤鷹行》首篇〈秀尖行〉便表明身為女性在先天條件上的限制：

我本有最不適用於登山的條件：這樣矮小的個子，使我很難一步跨越障礙，每次掙扎地翻過倒樹，每次在石縫間踟躕，我總不斷地提醒自己：「妳，不是爬山的料子！」但是，山的召喚是那麼強烈。¹⁶

身材的先天限制阻止不了她對登山的熱愛，了解自己的身高侷限，她從登山活動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與姿態，發現身體的另一種可能：「通常別人走三步的距離，我必須走五步，但是我踩著細碎的步子，總能自始至終保持一定的速度。」¹⁷徐如林享受疾行的快感，讓同行的男性苦追不已，甚至得意於勝利者的姿態。

藉由比較或尋找自我實現的價值，女性在男性氣質的登山活動中努力尋求自我的定位，並藉由挑戰，證明自己。進入六十年代，在海外遠征的時代下，李美涼、林乙華作為首登南美最高峰的臺灣女性，攀登六千公尺以上的高峰，身處在稀氧環境中，「疲憊異常，做每一個動作都相當吃力與遲緩，高山反應症狀通常會較為劇烈。」¹⁸面對極端的天氣環境，除了需要長時間的自我鍛鍊之外，也是相當考驗個人的適應能力。

至於女性如何突破？幾位男性隊員已放棄登頂時，李美涼、林乙華在極其疲憊的境地中絕地而後生：

¹⁵ 陳貞秀：《山の花嫁》，頁 80。

¹⁶ 徐如林：《孤鷹行》，頁 14。

¹⁷ 徐如林：《孤鷹行》，頁 17。

¹⁸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76。

長長的隊伍緩慢向上，不論在精神上、體力上，我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虛弱。沒有力量逞強，我的速度落在隊伍之後，沒有人看出我的慘狀；我得用力使勁，真是舉步維艱，雖然身體非常難受，殘存的清醒意識告訴自己不許停下來，我只能放慢速度讓身體有時間去調適。¹⁹

僅存的力氣和意識支撐著她們走到阿峰的山頂，以個人的體能和堅強的意志力證明女性能藉著自己成功登頂。

性別角色的不同使得女性在面對長期以往被視為柔弱、保護對象的觀念，遇到更多的問題，在如此的偏見下，依然見得女性為突破性別，自我挑戰，清楚自身的條件，嘗試打破性別框架，展現自主選擇和征服挑戰的自信和能力，擺盪於獨立與依附的處境，呈現更深刻的意涵。

（二）誠實與解放：呈現女性登山的真實樣態

2000 年以後臺灣登山風氣興盛，由於外部環境的條件配合：山林政策的開放、海外旅行的方便、資訊網路的普及、社群媒體的宣傳，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機會與途徑登山。其次，女性主義的作用與影響，增進臺灣女性具有獨立自主的思考，女性在自我探索的驅動下，更願意充分體察自我，以更開放、誠實的態度看待自己和性別。

林乙華曾在講座中提及：

性別未必是侷限，一方面，女性自主登山的能力正不斷提高，越來越多女性成為登山隊伍的主導或統籌者，另一方面，在性別刻板印象仍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或世代中，女性上山有時反而獲得更多鬆綁、解放的空間。認為談女性登山，現在應該慢慢脫離「上山是為了突破自己、證明自己」這樣的思維，而是很誠實地訴說、呈現女性登山的樣態，把我們在山上面臨的情況變成知識分享、傳遞給其他女性。²⁰

她清楚了解到自己身體的狀態，也知道該如何在登山時適時調整，比起突破和挑戰，能更認知到自己，直白地訴說所遇到的經驗，解放性別帶來的框架，比如女性獨有的生理期，詹喬愉在《攀向沒有頂點的山》述說自己在某次登山沒有意識

¹⁹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86。

²⁰ 鄒欣寧：〈山系女子蔓延中！當女人向山走去〉，<https://www.fountain.org.tw/issue/more-than-yama-girls/female-mountaineers>。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10 月 5 日。

到生理期而忘記帶衛生棉，身為唯一的女隊員，她並非沉默選擇自己解決，而是將當下的狀況誠實以告，眾人幫忙想辦法。她也經常被詢問女性登山的問題，以生理期為大宗：

女性在戶外的確有許多不便，不但天生力量體能不如男性，也還有這些生理的麻煩事。但我一直告訴我自己，所有個體都有差異，「接受」是「突破」的第一步。追求目標不用與他人比較，而生理上的限制，是讓挑戰更有精彩的關卡。²¹

詹喬愉導向的是接受我就是我，而不被性別束縛，坦然接受女性的生理樣態，鬆綁了女性的刻板印象，為女性登山注入新的思緒。

Melissa 在〈女性登山—致每位山女孩〉也以自身的經驗分享登山時遇到生理期、野外廁所和保養的因應方式，她認為男女性在登山時展現的樣貌或許有所不同，不過回到了本質，都是一個個愛山的「人」。²²從性別的框架中解放，回到個體，感受登山時身體的蛻變、行走的步伐，縱使女性在處理生理需求上會需要更多的心力和時間，以及遮蔽的空間，只要能提早了解並準備，降低因應的心理負擔，誠如她所言：

致每一位山女孩：「在山上，就放心地做自己吧！」大地之母包容著所有人，隨時都可以和周遭的人表達意見及想法，呈現最自然的樣貌，只要調整好心態，便能以最舒適的姿態走入山林。藉由每一次的登山經驗，會更加認識自己的身體，並找出之間的平衡，發展出專屬於妳的女力登山 Style。²³

女性從過去為自我證明，透過體能訓練和經驗累積，以符合體能要求，固然是能力的展現，帶有與男性登山者競爭的意味，以體力或登頂與否作為能力的標準或許失去登山的意義。如今的轉向更朝內觀看身體與心理，以更加認識自己。

至於女性從性別解放，以更誠實的態度看待真實的樣貌，脫離不了女性登山者的參與，現在有許多由女性組成或以女性為主的登山隊伍，比如劉崇鳳在搬到花蓮後，興起帶人入山的想法，成員並非專業登山者或具登山經驗，有孕婦和小

²¹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臺北：紅樹林，2020年），頁32。下文簡稱《攀向沒有頂點的山》。

²² Kawas 編著：《給初心者的登山小誌》（臺北：嘉瓦士有限公司，2021年），頁58。

²³ Kawas 編著：《給初心者的登山小誌》，頁62-63。

孩，籌備過程相當繁瑣，且需要時刻注意同行者的狀況。完成這趟雪山東峰之行後，她以此重回喜歡登山的熱情，感受人與山林的交會，找回自己的步伐：

自己像山的侍者，只因身上有某種通道，於是山藉由我們再接通更多的人。我多麼榮幸可以成為侍者，成為某種中介的工具，將山野交付我的能量再傳遞出去，哪怕只是一點點。藉由打開那些封存的渴望，我們慢慢理解了，那些辛苦掙扎都是必經，它必然，會帶我們走到更遙遠的地方，……只要順應每一個當下，就能創造出意想不到的美麗時光。²⁴

劉崇鳳以「山的侍者」自我定位，藉由帶隊入山，她對自己的深刻認識轉化為前行的動力，成為帶著女性登山、走入山野的山女領隊，引領著更多的女性於山林中更探索女性的多重面貌。

三、女性登山書寫中的空間與身體

前一小節討論女性登山者在性別刻板印象中，被冠以需要特別關注、保護的對象，藉挑戰來證明自我，在時間的推演下，女性從性別的窠臼走向自我和身體的認識，是擺脫傳統性別認知，以及性別帶來的生理狀態，更如實表達登山的樣態。而這部分將探討女性進入山岳空間的因素與轉變，如何移動？何以改變？以及探究在山岳的戶外空間中的身體界線，如何在與他者互動裡感受身體？

（一）移動的限制與改變

西方山岳的探險登山，也專屬於男性，得以追尋異地領域的探索，在登山運動缺席的是女性，以此妨礙女性的登山。在父權體制之下，男女的二分法界定性別的價值編碼，外面寬廣的世界屬於男性，可以自由地在公與私、內與外之間遊走，具有高度的移動能力；而女性被性別和意識形態網綁於家庭內，固著於私領域和家庭，無法自在探索外面世界。²⁵如此導致女性在十八世紀末期後才進入登山場域。

另外，由於臺灣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山岳長期處於封閉的狀態，山岳作為資源取得的手段，被執政者掌控，更遑論能以登山的目的進入山林。加上政策的

²⁴ 劉崇鳳：《我願成為山的侍者》（臺北：果力文化，2016年），頁271。

²⁵ Leslie Kanés Weisman 著，王志弘等譯：《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臺北：巨流出版，1997年），頁48。

實施，臺灣處於戒嚴時期，無法隨意踏出國門，造就臺灣與世界登山運動的長期脫軌，如此山岳成為無法進入的空間。

在尚未完善發展出探險文化的臺灣社會中，登山作為戶外活動的型態被套上危險的濾鏡，使得一般民眾對登山有著一定程度的顧慮，尤其女性對安全的顧慮比男性來得大，因此使得女性無法享有完全移動自由。²⁶女性在生理身體條件和心理克服危險的種種難關，解釋了女性參與登山活動的阻礙。

首先，從西方作品《殘暴之巔》看見女性在登山史早期顛簸前行的面貌，此書是作者珍妮佛·喬登書寫五位女性登山家攀登 K2 的故事，²⁷通過實際攀登、採訪相關人士，構築她們的生命史，描繪她們的內在動機，如何支撐著她們砥礪前行？與死亡相隨，最後魂斷在 K2 或其他巨峰。女性開始在山岳空間移動的時間來到二十世紀，於登山場域裡流露女性奮鬥的獨特氣質，她們不是女兒、妻子、母親的角色，而是以自己攀登 K2。女性在初登場的歷史情境中被受打壓，例如作者在書中即描述：「身為這趟旅程中唯一的女子，汪達又再度吃到苦頭。²⁸她告訴朋友，這敵意根深蒂固，男人害怕她登上聖母峰，會抹滅他們在全世界眼前的成就。」²⁹即便她成功登頂，也被認為是依靠男性隊伍和雪巴嚮導的幫助。高山作為男性追逐榮耀的空間，女性的出現似乎對男人產生威脅。

然而作為當時備受關注的女登山者，汪達的登山經驗和享有的頭銜，也許是男人無法把女性視為平等的夥伴，無法接受女性具有登山的條件和可能，因此處處刁難，不給予任何幫忙。《殘暴之巔》聚焦的女登山家們頂著性別的壓力，在登山過程中做出非比尋常的努力，有對山與孩子的渴望相互拉扯，有從此葬身於山裡的結局，然而她們所堅持的是自己想做這件事。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拿掉性別會展示更鮮活的個體，就當時的視角而言，女性所做的是極力對抗性別，試圖

²⁶ 黃麗螢：《越過生命的那一座山—女性的登山體驗與登山對其生命經驗的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2-13。

²⁷ 這五位女性登山家分別是：汪達·魯凱維茲（Wanda Rutkiewicz），1986年登上K2頂峰；莉莉安·柏拉德（Liliane Barrard），1986年從K2下撤時死亡；朱莉·特利斯（Julie Tullis），1986年從K2下撤時死亡；向黛兒·莫迪（Chantal Mauduit），1992年登上K2頂峰；艾莉森·哈葛利夫（Alison Hargreaves），1995年從K2下撤時死亡。作者書寫時這五位女性登山家皆已逝世，她訪問了K2女子的親友、登山家們，並研究相關文獻、書面資料等，構建她們的生命史，從女性作家的視角書寫專屬於女性篇章的山岳書寫。珍妮佛·喬登著，呂弈欣譯：《殘暴之巔：K2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頁40、45。

²⁸ 汪達是波蘭知名女性登山家，在1986年登頂K2，她在登頂後的兩天寫下紀錄：「汪達·魯凱維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十點十五分；K2首登女性」。珍妮佛·喬登著，呂弈欣譯：《殘暴之巔：K2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頁152。

²⁹ 珍妮佛·喬登著，呂弈欣譯：《殘暴之巔：K2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頁103。

從陽剛性質的山岳空間注入女性的參與。

西方女性登山者為進入登山的領域，受到男性的排斥、阻礙，她們有些身為母親的身分，依然抵抗所有的困難，來證明女性登山的價值。她們鼓起勇氣從家庭走進廣袤的群峰，克服心理的壓力、體能的極限，移動的限制在此刻已悄然鬆動。

至於臺灣的女性在進入世界登山的版圖已經來到 1990 年以後了，在臺灣境內女性擁有進入山林的經驗，加上世界登山的發展相對成熟，不似早期西方女性的披荊斬棘，以及為性別奮鬥的坎坷艱辛。臺灣女性主要受到傳統社會對性別的期待，還有不希望女性去危險的地方，比如在 2000 年左右，劉崇鳳仍就讀大學時被父母親耳提面命不要加入登山社，憂慮登山帶來的危險性：

而我卻什麼都不敢告訴父母親。我畏懼爸爸的嚴峻和媽媽的憂慮，他們反對我上山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這讓妹妹成為全家唯一知情的人，她必須時時擋在前面為我圓謊，一邊安撫爸媽一邊擔心姊姊安危。³⁰

即便如此她依然選擇登山，藉遮掩與說謊躲過，直到多年以後選擇邀請父母一起登山，才消融了這段心虛縹緲的歷程。

臺灣自組的全球七頂峰攀登計畫自 2006 年起為期三年時間完成目標，連志展以男性的視角，敘述當團隊意見分歧時的大肆討論，當中唯一的女隊友江秀真與另一位男隊友站在不同的立場看待阿空加瓜峰的攀登選擇，他如是說明：

或許是性別上的差異，男性登山者與女性登山者同樣對於「登山」這件事，似乎有著南轅北轍的想法。身為台灣第一位登頂聖母峰的女登山者，秀真顯現出來的是相對的謙虛（也可能會被說是「保守」），或許她真的認為自己還有許多地方仍然有待學習（也或許台灣女性本來就更加缺乏自信），面對致豪提出希望完全自力，沒有嚮導、協作員的攀登方式，秀真一直站在學習的角度，認為有機會跟國外的嚮導、協作員學習更多的經驗與技術，意義甚至遠大於沒有嚮導的獨立攀登。³¹

首先難以避免地從性別的角度評論，畢竟因為性別而產生的關係、互動是最容易的切入點，連志展確實也做到去理解對方之所以如此想的理由和看法，以開放的

³⁰ 劉崇鳳：《我願成為山的侍者》，頁 48。

³¹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臺北：天下文化，2010 年），頁 85。

心態接受他人的觀點。而江秀真更在意的是安全、順利地攻頂成功，同時從異域的文化汲取登山的經驗。

約翰·伯格在《觀看的方式》提出「男性凝視」(male gaze)：

男人行動，女人表現。男人注視著女人，女人看自己被男人注視。這不僅決定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大部分關係，同時也影響了女人與自己的關係。女人內在的審視者男性：被審視者是女性。她把自己轉變成對象——尤其是視覺的對象：一種景觀。³²

男性凝視體現於權力的關係上，這種權力可以是體格的、社會的和性方面的，因此女性在以男性為主的山岳世界中，自然成為被關注的對象。連志展從男性的是解去剖析臺灣女性登山者，即落入了凝視者和被凝視者間形成的主觀差異，女性被視為客體，在強調高度移動性的登山活動中，被冠以保守、柔弱的形象。

連志展、江秀真一行人在隊員間不同的行程規劃下選擇各自攀登，於是針對阿峰的爭執也就畫下句號。兩人同樣以七頂峰計劃為主題而成書，從江秀真的書寫中，來看女性在山岳中的移動，她作為臺灣首登聖母峰的女性，又參與七頂峰計劃，作為隊伍中唯一的女性，代表著臺灣女性的高度參與登山運動的象徵。

江秀真辭掉正職穩定的工作，攀登聖母峰；回國後取得嚮導職照，並成為玉山國家公園的巡山員，而後爭取到七頂峰計劃的名額，其後選擇登山教育作為她的志業，她的一生始終圍繞於登山，並展現她的高度自主選擇。她的注意力也聚焦於女性：

我也學習到女性該如何在雪地站著小便，這以先天或後天傳統觀念來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見女教練背對著自己，還以為看錯了！只見她轉身、手上拿了支漏斗。這樣一來，不僅解決冰河行進時穿、脫安全吊帶等裝備的麻煩，也節省繩隊行進的時間，更重要的是不需要再憋尿，真是女性登山者的福音啊！³³

她接受看似害羞的如廁方式，以開放的態度學習，只為能在攀登時具備較多的移動性，藉由工具來消除先天性別帶來的生理限制。面對陌生且不穩定因素強烈的高山地帶，同行的男隊友和江秀真抱持相同的態度，或許拋開性別，從個體的選

³²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2010年），頁58。

³³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臺北：商周出版，2016年），頁174-175。

擇出發，對登山的討論會有更多元的討論空間，沒有絕對的評判標準。

另外，女性登山也更為自由和興盛，詹喬愉、山女孩 Kit 作為新世代的女性登山家，她們的移動更為自在。以詹喬愉為例，完成多項海外攀登的紀錄，諸如洛子峰、聖母峰等，³⁴也負責山域搜救，在《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中，看見她參與奇萊山救援展現出的韌性：

患者每走一步都吃力喘息，不時乾嘔，情況非常糟糕。從奇萊稜線下來，首先遇到的陡峭地形是第二溝，一般人都得手腳並用了，背人更是困難。然而光是站在旁邊等她，我都覺得自己快失溫了，所以決定背負她下山。我用扁帶做成簡易背負吊帶，將她綁在身上，好讓自己騰出雙手抓扶繩索和岩石。除了我的腿太短，她的腳會頂到石頭之外，這種背法比想像中好活動。³⁵

她的行為除了能舒緩患者的不適，也讓搜救小組能盡快遠離寒冷，避免失溫，隨後有同組隊員幫忙背負。參與山域搜救看似以男性為主，她的參與彰顯了女性的能動性，並攀爬多個海外巨峰，為挑戰自我而追求的目標。

女性的登山發展脈絡從移動的侷限到自在的遊走，過往雄性氣質濃厚的登山運動不容許女性的存在，作為榮耀追求及權力代表的山岳，話語權掌握在男性手中。隨著女性的涉入，空間的意義也在轉變，從抵抗、競爭到向內探求自我，臺灣的登山書寫也轉為更開放的思維和想像。

（二）身體界線的鬆動

黃麗螢認為山野環境的特殊性（社會面 / 物質面 / 人們對山野環境的主觀感受上）以及登山活動的性質，促成性別符號和性別界線的模糊，³⁶且在山岳空間容易建立緊密的關係，人際互動也相對單純，在山上的環境中，身分、地位、年齡、財富甚至性別都失去效用。³⁷原因為山岳作為一個遠離現代社會的空間，自都市走進山中，那些人類背負著的社會符號，包含性別、角色，隨著淡化，卸下

³⁴ 列舉幾個她的海外攀登經歷：2015 年，吉爾吉斯阿拉阿恰（Ala Archa）技術攀登，登頂 Ratsek peak。（俄羅斯分級 2B，Grade Alpine 分級難度 PD+路線）；2017 年，新疆慕士塔格峰登頂；2018 年，洛子峰、馬納斯魯峰登頂；2019 年，馬卡魯峰、聖母峰登頂。其他登頂紀錄可參見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扉頁。

³⁵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頁 48。

³⁶ 黃麗螢：《越過生命的那一座山—女性的登山體驗與登山對其生命經驗的影響》（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43。

³⁷ 張蕙芳：《逃離與追尋—登山的社會學研究（以兩個登山團體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44。

包袱後以更輕鬆、愜意面對人際互動。

當遠離日常生活的軌跡，山野環境使得登山者的心態改變，那些習以為常的性別規範：外表打扮、舉止行為、身體接觸、生理需求等的顧忌，會被擱置在一旁。首先登山的環境對於不同性別之間的身體界線會較為寬容，為了減輕背負的重量，李美涼、林乙華接受與男性共用一頂帳篷。³⁸女性在社會規訓的潛移默化中之下，很自然地保護身體，不隨便暴露身體，也正因如此女性需要在野地中學習就地解決如廁問題，劉崇鳳描述她的經驗：「走出帳篷，胡亂向外走去，隨地脫了褲子，蹲在那裡，從跨下俐落地抽出衛生棉，草草換上新的後，褲子隨即拉起，閃進帳篷前。」³⁹行如流水般的操作，是將之作為生理需求，無關乎性別。

在登山的特殊環境下，雖然對於不同性別之間的身體界線與距離通常表現較為寬鬆，不過像是「更衣」、「如廁」這類女性仍會試圖避人耳目。《孤鷹行》中徐如林一行人在登山時遇到雨天，「濕淋淋的衣服不換下來怎麼成？屋外還在下雨，不能把男士們趕出去，只好讓他們躲在屋簷下，一聲令下，全體男士面向對岸，所有女士匆匆換衣。」⁴⁰在《山の花嫁》中陳貞秀也有相似的經驗，當阿展和其他男性可以瀟灑地脫掉衣服洗澡，而作者卻要避開，遠離男人們的視線，說明即便在山中，身體的邊界仍是男女有別，並未完全逃離社會規範。

看似山岳空間拋棄了社會制約的性別認同，但卻也能在書寫中看見女性為符合社會期待做出的適應和行動，這意味著登山的隊伍、團體形同社會，仍不自覺地受到社會規範的影響而做出相應的行為。山野環境確實能淡化性別的規範，使得登山者能放下戒心，更從容地人際互動，從女性的視野來看，必須考慮到女性在登山時的調適過程和身體經驗，會對性別與空間有更包容的關照。

前述提及登山環境是小型社會的縮影，透過與他者的互動，建立起自己身體形象的想像，女性登山者會通過他者或自己的觀察，形構對自我身體的確立。這也表明了山岳作為異地，女性可以更自由、自信地正視身體，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以《南美攀登記》為例，其他西方男性如此觀察唯二的女隊員：

丹那不只一次的告訴我們，薩巴斯騰和莫瑞斯歐認為，我們倆很強壯，走起路來腳很有力。聽他如此稱讚，既高興又疑惑。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

³⁸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54。

³⁹ 劉崇鳳：《我願成為山的侍者》，頁 40。

⁴⁰ 徐如林：《孤鷹行》，頁 204。

丹那雖然態度風趣輕鬆，但他可是非常細心地觀察、打聽隊員的情況。⁴¹

此處有兩點說明，其一面對男性的觀察，身為女性的作者並沒有感到不舒服，身體作為展演的空間，可以用來傳遞意義，不僅展示個人的體能，也來自社會與文化內化的產物，他者藉視覺感官來了解一個人。其二作者面對他者的關注更多的是高興，是他者對自我身體形象的認同，也塑造對自我的肯認。

有從他者的眼光確認自我身體的認同，同時也有自我藉觀察他者反過來進行比較、學習，從而更確立自我。詹喬愉同行的隊伍中有一位女孩，在海拔八千左右時氧氣瓶的氣閥損壞，心想或可嘗試無氧攀登，卻呼吸不順、臉開始麻痺，不得已接受雪巴嚮導的氧氣面罩。詹喬愉由此例了解必須注意自我身體極限：

我按照自己的步調走，但也參考別人的速度，以免慢過頭而不自知。在七千五以下，我大概在隊伍中間。無氧很容易餓，我大概平均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吃一條能量膠。……超過七千五以後，我的速度往下掉，只能勉強跟上後面幾個隊員。而且非常冷。接近七千八百米時，開始走一步要喘好幾下。……冷到崩潰，我全身抖到無法停止。我決定吸氧了。氧氣戴上後大約三分鐘，彷彿來到另一個世界。我輕鬆邁開步伐往上走，血液開始循環，手腳漸漸暖起來。⁴²

適時地了解自己身體的侷限，比起一味追逐無氧登頂而忽略身體狀況，她示弱的表現是對自我身體確切認識，從他者回看自我來正視身體的極限。

最後，登山書寫中女性具有的感官經驗來看身體與空間互動的細節，展現女性特有的溫柔，例如同行的馬克因為身體不適而陷入沉重的心情，李美涼、林乙華想關心他，「我終究沒過去，大男人面對我的慰藉，可能會尷尬。」⁴³同在一個登山隊伍，除了有合作關係，也隱含著競爭，面對成員的負面情緒，二人選擇以溫柔的方式在背後支持，不過度的打擾。陳貞秀留意到成員之間的情緒，男性間不敢表露想法導致隊伍的氛圍沉默和尷尬，遂嘗試其他方式和阿展溝通，效果顯著，或許出自於男性身分的要求和期待，阿展希望能像硬漢般引領隊伍前進。「爬山的文化裡應該多些女性思維，男生都太硬了」⁴⁴，其實男性也有細密、溫柔的

⁴¹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40。

⁴²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頁 178。

⁴³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頁 61。

⁴⁴ 陳貞秀：《山の花嫁》，頁 95。

面向，只是不願意表露，表現出性別之間的表達模式不同。

女性以特有的視角書寫並注意同行隊友的情緒和氛圍，敏銳地透過感官感受空間和人，更是一種以身體作為感知空間為媒介的經驗轉化，細膩地體察周遭的情感。綜上所述，以女性的論點切入探討性別帶來的社會框架，女性登山者從依附、抵抗到接受、坦誠，跳脫傳統性別的認知，更向內探索個體。以及從山岳特殊的空間探討性別界線的寬鬆，以及身體與性別作為展演空間，藉他者的觀察形塑自我的認同，從觀察他者來檢視身體的侷限，並通過感官感知人際互動的情緒波動。

第二節 集體的想像：地景的形塑

地景書寫的素材，廣義來說，從山川地裡、人文歷史、建築景觀，到鳥獸花草、地方人物、宗教信仰、文化風物，這些地景材料經由作家的文字詮釋，寄意言情，不只記錄成長過程與土地互動的珍藏記憶，同時也折射地理風貌、歷史人文與現實社會的演變，呈現不同時代的美學符號與標誌，進而形塑地方與身分認同，甚至凝聚族群的共同意識。⁴⁵人文地理學者普瑞德（Allan Pred）認為：「地方（place）不僅僅是一個客體。它是某個主體的客體，被每一個個體視為一個意義、意向獲感覺價值的中心，一個動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點；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⁴⁶說明地方藉由經驗、記憶與書寫，形成的歸屬感認同，甚至代表文化特徵，銘刻著獨特且深刻的意義。

本節將以地景為研究進路，探討臺灣登山書寫中書寫數量較多的重要地景——聖母峰、玉山，討論登山書寫如何塑造二者的重要意象？山岳意象經過時間的淬鍊和書寫的累積，構築獨特的山岳地景，並反映出人與空間互動的成果。本文通過文本的探究、比較，並進行時空的相互交涉，探究如何以地景為媒介，凝聚山岳意識，見證登山的史冊，形塑山岳文學符號，以及建構地方認同。

⁴⁵ 劉克襄：〈打開地誌文學的窗口〉，《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臺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11。

⁴⁶ 普瑞德（Allan Pred）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86。

一、聖母峰：終極的夢想

(一) 聖母峰攀登史

聖母峰，又稱珠穆朗瑪峰，是喜馬拉雅山脈的主峰，為世界第一高峰，海拔 8848 公尺，位於中國西藏與尼泊爾的交界處。聖母峰又被稱為「第三極地」，另外兩極指的是北極、南極，當聖母峰被斷定為地球最高峰，就變成陸地探險領域最令人垂涎的目標，影響力極大的登山家戴倫佛斯宣稱，登上頂峰是「全球人類努力的目標，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不該退縮」。從 1852 年席克達計算聖母峰高度確認世界最高峰後，過了一百年後，才終於有人登山聖母峰頂。⁴⁷人類前仆後繼地挑戰聖母峰，寫下豐富的史詩，作為終極目標的聖母峰，也成為登山書寫中重要的地景。

1924 年英國的喬治·馬洛里 (George Mallory) 和安德魯·爾文 (Andrew Irvine) 連袂走向聖母峰頂，同行隊友諾艾爾·歐德爾 (Noel Odell) 透過望遠鏡目送他們最後的身影，兩人就此殉山，再無蹤影。由於缺乏實質的證據，因此無法列為最早的登頂的記錄。實際上，這是馬洛里第三次英國聖母峰遠征隊，楊赫斯本著有《聖母峰史詩》，⁴⁸描述馬洛里在 1921、1922 和 1924 三次參加遠征隊的前後經過，對人類攀登聖母峰的歷史有更完整的了解。

到了 1953 年，英國遠征隊首度從尼泊爾方向，即聖母峰南側進攻，希拉瑞 (Edmund Hillary) 和雪巴諾蓋 (Tenzing Norgay) 成為第一批登上聖母峰的人。正逢英國伊莉莎白女王登基，這次成功的攻頂行動掃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低迷與陰霾，然而面臨著大英帝國衰退的事實，英國登山隊已抵達並完成人類探索的最後一塊拼圖，標示著世界頂點的象徵。⁴⁹

1970 年代，義大利登山家梅斯納提倡無氧攀登，他與登山搭檔哈伯勒 (Peter Habeler) 在 1978 年從南坳和東南稜方向登上聖母峰頂，以無氧攀登完成歷史性事蹟。⁵⁰聖母峰在時代的遞進中成為登山者的夢想，也從各個方向嘗試攻克世界頂峰。

1996 年是聖母峰慘烈的一頁歷史，克拉庫爾前往聖母峰進行登山商業化專

⁴⁷ 強·克拉庫爾著，宋碧雲、林曉欽譯：《聖母峰之死》（新北：大家出版，2014 年），頁 31-32。

⁴⁸ 佛蘭西斯·楊赫斯本爵士著，黃梅峰譯：《聖母峰史詩》（臺北：馬可孛羅，2007 年）。

⁴⁹ 強·克拉庫爾著，宋碧雲、林曉欽譯：《聖母峰之死》，頁 35-36。

⁵⁰ 強·克拉庫爾著，宋碧雲、林曉欽譯：《聖母峰之死》，頁 170-171。

題報導，攀登聖母峰時，目睹規模大的山難，將親身經歷寫成《聖母峰之死》，臺灣登山者也在其中，來自臺灣的登山家高銘和雖成功登頂，卻死裡逃生、命懸一線，著有《九死一生》，這次的山難也被改編成電影《聖母峰》。根據克拉庫爾的書寫，可以看到深刻的生死凝視，致命的暴風雪帶走了十幾條人命，直面死亡的歷劫和苦痛，正如所有寫作者都可以現身說法：唯有透過書寫，才能療癒與解脫。克拉庫爾說：「山上發生的事不斷啃噬我的勇氣。我認為撰寫本書或許可將聖母峰趕出我的人生。」⁵¹

至於臺灣攀登聖母峰的歷史，比起西方更晚。1993年，吳錦雄參與「海峽兩岸聖母峰聯合登山隊」，成為首位登頂的台灣人。1995年，江秀真成為首位登頂的台灣女性。1996年，由高銘和帶領的聖母峰遠征隊登頂。2009年連志展等人登頂成功，完成七頂峰計畫的壯舉，同年，李小石也登上聖母峰。2019年，詹喬愉成功登上聖母峰，成為台灣第二位登上聖母峰的女性。攀登的人物與隊伍不斷累積、擴大，繼續寫下聖母峰的攀登史。

有關攀登聖母峰的著作有高銘和的《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江秀真的《挑戰，巔峰之後》、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李小石的《喚山：我與珠峰相遇》⁵²以及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等書，下文將從這些作品討論臺灣登山者攀登聖母峰的過程，及塑造之山岳形象。

（二）臺灣的聖母峰書寫

聖母峰攀登耗時長，需要進行體能、高度訓練，來適應高海拔地帶，並測試和觀察自己的身體狀況，決定向上或攻頂與否。綜覽臺灣的聖母峰攀登書寫，可以看見登山者多次在不同高度的基地營進行攀登、高度訓練，這是因為雪地的變化莫測，以連志展的描述為例：

雪崩突如其來的巨大聲響，不論是白天或深夜，總是能夠讓人在剎那間加深了對聖母峰的幾分敬畏，以及生死由命的不確定感。在高海拔的頻繁降雪加上地形與溫度變化的共同作用下，無數懸掛在昆布冰河四周的巨大冰層與冰壁，總在無法預知的時候，或者落下一台汽車大小的冰塊，或者一整片比足

⁵¹ 強·克拉庫爾著，宋碧雲、林曉欽譯：《聖母峰之死》，頁9。

⁵² 李小石：《喚山：我與珠峰相遇》（臺北：INK 印刻文學，2010年）。

球場還大的冰層，進而引起宛如爆炸一般的大小雪崩。這樣的意外，讓昆布冰瀑的攀登，成為聖母峰攀登者最惡名昭彰的夢魘。⁵³

難以預測的自然環境成為危險的因素，加強了聖母峰攀登的困難，也由於臺灣沒有相對的環境，故攀登者進行冰攀訓練，來應付雪地攀爬。

EBC 基地營，海拔約 5364 公尺，是聖母峰的前哨站，也是裝備重整、高度適應、攀爬訓練的一個重要據點。初到此地者會先適應高度，江秀真便如是描述其特色：

從臺灣至前進基地營，為把握短暫攀登期，行程安排緊湊，以至於剛抵達基地營得腳步放慢，不斷調整。登山不是只有走路，背部的負重，少說也有一、二十公斤。在碎石坡裡上上下下，稀薄空氣、加上陌生環境，總會特別辛苦。……短短四小時的高度訓練與運補作業，感覺精神不錯。⁵⁴

隨著海拔越來越高，吸入的氧氣若不足，會導致身體無法正常運作，若想要成功攀登，按部就班且清楚了解身體所能承受的狀況，作出適當的處理。此外，天氣也是影響攀登的原因，比如詹喬愉準備攻頂聖母峰時，在嚮導的建議下先撤退，隨後才發現天氣的驟變：

隔天一早，就被唯韌叫醒趕下山。畢竟高海拔不宜停留太久，既然錯過登頂機會，只能先撤退到較低海拔休息，再等待機會登頂。我只花了四個半小時就衝回溫暖的 C2。天氣很好，無風且溫暖，但抬頭看天空，卻可以見飛快的雲層。下撤是對的，山頂變天了。⁵⁵

聖母峰的商業化使得攀登的人數眾多，登山者需要排隊等待上山或使用帳篷，天氣的好與壞也是攀登成功的關鍵，等待合適的機會登頂。

從第四營出發登頂聖母峰最至關重要，在這些文本中，作者們刻畫了生動且危險的攀登歷程，例如江秀真便說：

凌晨三點，我們抵達八五〇〇公尺左右，一處俗稱「陽臺」的位置，在此短暫休息。……我們在早上八點半抵達南峰頂，再次更換氧氣瓶，正式踏上往

⁵³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頁 248。

⁵⁴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頁 253。

⁵⁵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頁 255。

主峰的稜線，雪巴桑都指著珠峰的方向說，再走一個半小時就能抵達目的地。天啊！那可是一段驚險恐怖的冰雪岩混合地形，在某些斷崖處，還要懸空掛在岩壁上，以等候稍早的登頂者下山！⁵⁶

「陽臺」作為登頂的最後一個休息處，需要更換氧氣瓶、休息調整，迎接最後的挑戰，詹喬愉同樣描述她走在稜線上的視野：

過了陽臺之後，我們走在窄小的稜線上，中間僅有一段比較陡峭的石壁混冰雪。越過聖母峰南邊的「小山頭」南峰之後，坡度平緩許多，我知道左手邊（西側）是陡峭暴露的山壁，但因為天黑，什麼都看不見，對於高度的害怕減輕不少。應該接近山頂了吧，我竟然看到電影《聖母峰》裡，主角嚮導死掉的大石頭場景，只是現在的石頭旁沒有氧氣瓶，也沒有任何人。天色仍是一片黑。⁵⁷

他們多是在凌晨出發，順利的話能在日出前攻頂，至於能不能看到日出或壯麗的景觀，取決於天氣，這也展示不同登山者譜出的聖母峰山頂的多元面貌。詹喬愉在登頂時見到了如是風光：

我看到一堆凌亂的五色旗，竟然登頂了？聖母峰的山頂，和我攀登過的其他三座八千米山頂比起來，是最平坦廣闊的。……一直回到陽臺，才剛好日出。看著洛子峰和馬卡魯峰在陽光下顯出山形，左手邊是西藏，右手邊是尼泊爾。我們坐在陽臺享受難求的美景，以及陽光的美好。⁵⁸

當她抵達聖母峰的山頂約在凌晨三點，眼前所及皆一片漆黑，又礙於高海拔不能久留，待到陽臺才欣賞到日出的美景。而連志展、江秀真則幸運遇見了日出的聖母峰：

四點半，天開始微明，晨曦對天空進行著野獸派的著色，在數千種變化之後，決定讓梵谷的 *Starry Night* 暫且隱蔽，放上一顆火紅的太陽，從遙遠太空而來的這耀眼的光與熱，讓我們不由得停下了腳步，向東方讚嘆，珠穆朗瑪的手一揮，於是有了山河、有了日月；黑暗離去，有了陽光、空氣、和動人的

⁵⁶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頁 279-280。

⁵⁷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頁 266。

⁵⁸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頁 267。

攻頂的成功伴隨著日出的漸露頭角而更加喜悅，也標示著全球七頂峰在聖母峰的山頂畫下完美的句點。相較於連志展等人的喜悅，高銘和的登頂經驗卻顯得平淡和失落：

聖母峰頂的方圓不過三千公尺，我四下打量，發覺這個讓全世界登山者神魂顛倒的地方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神奇的地方，只不過是一個覆蓋著白雪的石頭堆而已，上面除了十幾根雪巴留下、用來祭拜天神的經幡和一些金屬桿子以外，別無他物。我探頭往西藏方向的喜馬拉雅山麓望下去，結果大失所望，什麼都看不到，視野完全被雲霧擋住。⁶⁰

自然的變化莫測無法保證每個人都有機會望見遼闊的大地、輝煌的美景，高銘和從對頂峰的平凡感受，顯現出攀登的意義遠遠大於峰頂的面貌

至於西方登山家眼中的臺灣登山又是如何？臺灣的登山有何侷限和希望呢？1996年的聖母峰攀登隊伍有許多國家，克拉庫爾的《聖母峰之死》中注意到臺灣登山隊，並抒發個人看法：

台灣隊沒來之前名聲已傳上聖母峰。一九九五年春天，這支隊伍曾到阿拉斯加攀登麥金利山，為一九九六年的聖母峰之行試身手。九人登頂，但下山時有七人遇到暴風雪，迷失了方向，在標高約五千九百公尺的曠野過了一夜，國家公園服務隊花了很大的代價，冒了大險才把他們救出來。

台灣隊一出現在聖母峰，山上大多數遠征隊都為之側目。大家由衷擔心台灣隊會發生災難，逼得其他遠征隊前去救援，危及更多的生命，更不提危及其他登山者登頂的機會。⁶¹

克拉庫爾從自身的眼界看到臺灣登山隊伍的缺點，卻是沒有了解臺灣本身的登山歷史脈絡，作為海外遠征的開拓者，高銘和是以行動證明臺灣登山的可能，能在西方登山書寫中瞥見臺灣的身影，是一個讓世界看到臺灣的寶貴機會。

⁵⁹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頁 292。

⁶⁰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臺北：大地地理，1997年），頁 211-212。

⁶¹ 強·克拉庫爾著，宋碧雲、林曉欽譯：《聖母峰之死》，頁 110-111。

(三) 聖母峰的形象及其神聖性

生活在聖母峰庇蔭下的居民稱這座山為「珠穆朗瑪峰」(Qomolungma)，意即「世界之母」，聖母峰就一直被人奉為心靈的殿堂，⁶²在雪巴和藏族文化裡，「珠穆朗瑪」是寬宏溫柔的女神。在文本的敘述當中，登山者常以「她」、「女神」稱呼聖母峰，例如江秀真便是如此形容聖母峰：

曙光搭著黎明的肩膀，瞬間將山腳下的冰山、冰河以魔術般呈現眼前，費了一番功夫，才攀越路線上著名的「第二臺階」，漫步在最後稜線，就要和珠峰見面！興奮與莫名感動一擁而上，雖知攀登珠峰的死亡率為三分之一，當下卻感受不到她有任何威脅性。⁶³

江秀真以「她」為主詞稱呼聖母峰，聖母峰在雪地的襯托之下，暫時消除了山峰的危險性，還有將狂風大作擬人化為「女神在生氣了。」⁶⁴如此的想像除了與當地神話傳說有關，也寄託了登山者的情感，賦予聖母峰溫柔、聖潔的形象，眼前的冰天雪地宛如女神的姿色，吸引著登山者一睹世界最高峰之美，而黑夜之中又是不同的形象：

每個攀登者頂著頭燈，在黑暗中移動，形成一條閃亮的光帶，點綴在珠峰頂上，有如女神的珍珠項鍊。穿好身上最後的裝備「冰爪」之後，也加入這條明亮的珠鍊，緩緩上攀，心情就像是趕赴一場高山盛宴。⁶⁵

登山者的頭燈用以形容珍珠項鍊，妝點在聖母峰的山峰上，淡化了聖母峰危險的地形和漆黑的行走困難，反倒為這趟攀登之旅注入溫柔的想像，登山者來到於此是受到聖母峰的邀請，來與之親近。

然而，聖母峰雖然被寄予溫柔、美麗的想像，實際登臨後卻感受到這座高峰的無情和醜陋，連志展書寫了聖母峰的初次印象：

一個巨大無比的黑褐色山壁出現在不遠處，巨大山壁往上延伸直到天頂的一個尖端，聖母峰懾人的西南壁，以金字塔的身形矗立在冰河的盡頭；而金字

⁶² 高銘和：〈攻頂聖母峰〉，《生命》第6期（2016年5月），頁17。

⁶³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頁76。

⁶⁴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頁263。

⁶⁵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頁279。

塔的頂端，是地球最高點，一個看起來依舊遙不可及的夢幻之點。⁶⁶

金字塔代表著聖母峰的雄偉，黑褐色襯托出它的真面目，帶有危險的意調。高大巍峨的高度和崎嶇危險的地形正是聖母峰的現實，在抵達世界之巔前，登山者必然接受來自這座巨峰的考驗，身體上需要適應高海拔地帶，稀薄的氧氣環境可能影響生理情況。再者是無法預料的路況：

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有許多「如果」，有些冰隙經昨夜的冰雪覆蓋，肉眼已分辨不出何處是冰隙；有些地方萬丈深淵，表相卻完全看不出來。因為一路攀爬的冰河一直擠壓，何時崩解不得而知。⁶⁷

登山者時刻保持警戒，每一個腳步都透露出謹慎和不安。聖母峰的冰河同時有夢幻、死亡兩個極為對比的象徵，一方面讓登山者能沉浸在冰雪的美景；另一方面冰河地形是動態的，加上險峻陡峭的山體，它的無情體現於付出生命的代價，登山者於此能直面死亡的樣態：

再不遠一個人影朝我們跪臥著，在僅有一人寬度的稜線上擋住了去路。唯韜說，這是早我們一天登頂的兩個人，一直都沒下山，沒想到卻是長眠在這裡。不過我只看到一位，唯韜搖搖頭說，可能掉到山下去了吧？⁶⁸

看似輕鬆平常的談話，能以冷靜的態度面對遺體、死亡，道出聖母峰冷酷無常的一面，由於路途遙遠和搬運的困難，遺留在山峰深壑中的屍體，就成為登山者會碰到的場面。

除了危險之外，聖母峰的神聖性亦是登山者著墨之處，被稱為「聖山」與當地的雪巴族人有關，雪巴是藏族的分支，長年生活在高海拔山區，擁有適合的生理特質，成為攀登者的協助力量，並建立完整的嚮導制度，因而他們的身影時常伴隨在登山隊伍旁。在雪巴族的文化、宗教中，凡進入聖母峰攀登前，舉辦祈福儀式以求順利平安，連志展對此的描述強化了山岳的神聖性：

祭壇上，堆滿了大家的隨身裝備，希望這些被加持過的裝備，可以給大家帶來好運與平安。祭壇最上面供奉著三顆山形的石頭，中間掛著一小幅達賴喇

⁶⁶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頁 260-261。

⁶⁷ 李小石：《喚山：我與珠峰相遇》，頁 170。

⁶⁸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頁 267。

嘛與另一位法王的照片，下方則是傳統的雪巴供品。時辰一到，開始誦經，夾雜一些動作儀式，我們跟著祈禱，並合力在祭壇中央，立上一根綁著鮮花與風馬旗的柱子，沿著柱子再拉開五條同樣綁著風馬旗的旌幡，納入風馬旗的祝福，最後大聲的歡呼、向山神灑出手中的米粒，熱鬧而神聖的普乍儀式便告完成。⁶⁹

雪巴族人相信聖母峰的神聖，舉辦祈福儀式除了為祈求順利之外，也蘊含他們對聖母峰的謙卑，大自然的環境難以保證路途的安穩，向山神表示登山者的到來和叨擾，通過宗教祈福增添聖母峰的人文價值、宗教氛圍。

而臺灣的聖母峰攀登書寫中，被稱為「登山怪傑」的李小石曾背著媽祖的神像登上聖母峰，他認定媽祖為父母的守護神，父親捕魚時遇到風浪，在媽祖的顯靈下奇蹟存活，故希望能帶著媽祖攀登最界最高的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極峰，讓媽祖的庇佑能到達全世界。⁷⁰他將臺灣的宗教信仰移置到聖母峰，這個動力支撐著他登山，同時也彰顯山岳的包容：

尼泊爾人常說喜馬拉雅是眾神的故鄉，今年的聖母峰可熱鬧了，媽祖要上聖母峰，聽聞尼泊爾的尼瑪也計劃要帶著他的守護神上聖母峰，且一待就是二十四小時。⁷¹

聖母峰的地理位置匯集了藏族、尼泊爾的民族文化，又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登山者的洗禮，李小石帶著臺灣的宗教信仰登上聖母峰，展現山岳的神聖性，並寄寓個人的信仰，以無形的力量作為前行的助力。

從臺灣聖母峰攀登的書寫歷程中，了解世界最高峰的艱難歷程，並形塑出聖母峰的多重面貌，有女神之姿的絕妙雪景、山色；有金字塔般的雄偉、壯觀；有聖母峰裸露的山壁、流露的無情；還有聖母峰上的宗教文化、信仰力量，共同譜出聖母峰溫柔、冷酷與神聖的印象，通過書寫建立獨特又複雜的地景。

⁶⁹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頁 249-250。

⁷⁰ 李小石：《喚山：我與珠峰相遇》，頁 83。

⁷¹ 李小石：《喚山：我與珠峰相遇》，頁 62。

二、玉山：文化母體

(一) 玉山命名的歷史

玉山為臺灣最高峰。⁷²關於「玉山」之名的由來，最早的記載可見於清康熙 24 年（1685）蔣毓英修纂《臺灣府志》，內容為「玉山，在鳳山縣。山甚高，皆雲霧罩于其中，時或天氣光霽，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⁷³與同年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亦載「玉山（原文「田」字）在野番中，月夜仰視，其色晶瑩如玉。」⁷⁴從清代開始，玉山作為漢名，出現在文獻叢刊書籍中。至於為何稱為玉山？郁永河〈番境補遺〉對玉山的描述：

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如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每遇晴霽，在郡城望之，不啻天上白雲也。⁷⁵

郁永河的「遠望」玉山，反映出清代畏懼山岳，礙於山岳的危險性、原住民的阻礙，不敢貿然前往，僅止於望山。山名為玉，是因山頂經陽光的照射和積雪的反光，晶瑩如美玉而得名。此命名是從漢人文化的角度，在原住民的文化中，同樣也有如此觀點。

玉山的存在，對鄒族、布農族而言是重要、神聖的空間。鄒族稱玉山為 Pattonkan，意指「石英之山」，因積雪的反光就如同石英。而布農族將玉山視作聖山，稱呼玉山有 Usavih、Dunqul-Savi、Tongku Saveq，Usavih 的意思是發亮的山，在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書中稱玉山為 Dunqul-Savi，Dunqul 係指最雄偉的山巔、Savi 是高貴女性的名字，⁷⁶他的姪子乜寇·索克魯曼則稱 Tongku Saveq，譯名為「東谷沙飛」，是指一處神聖的高山避難所，認為東谷沙飛

⁷² 玉山山塊因歐亞、菲律賓板塊相擠撞而高隆，主稜脈略呈十字形，南北長而東西短，十字之交點即為玉山主峰，位居臺灣中央地帶，海拔 3,952 公尺的玉山主峰，植被隨海拔之變化而異，由亞熱帶、溫帶以至寒帶，林相次第變化，野生動物豐富。摘取自：〈玉山國家公園官方網站〉，<https://www.yshp.gov.tw/FAQ/C007000?ID=c7939bca-5d9f-4fde-8c82-9931afbc9289&PageIndex=6&PageType=1>。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4 日。

⁷³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十 古蹟》。摘錄自《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33。

⁷⁴ 清·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

⁷⁵ 郁永河著，方豪合校本：《裨海紀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97。

⁷⁶ 霍斯陸曼·伐伐：《玉山魂》（臺北：INK 印刻，2006 年），頁 9。

民族即是玉山民族。⁷⁷由上述得知，布農族的稱呼多元，卻都指向「發亮的山」之意，保留了玉山原始的自然風貌。

日治時期不同於清代的望山，總督府為治理臺灣，掌握自然資源採集、軍事行動，對臺灣的山岳展開調查，日本當局將玉山命名為「新高山」，意思是「新而高的山」，是相對於日本富士山而命名的，日本政府將富士山的概念延伸到臺灣山岳的意象上，以此產生關連，不僅宣示新領地為日本國土的延伸，同時也彰顯明治天皇神威。⁷⁸玉山對於日本政府的重要性：

新高山的命名，是標準的政治動作，是權力者得以展現威權與意志的表徵。我們看到山頂上豎立的木碑，上面寫著「大日本帝國最高峰新高山絕頂海拔三九五〇米」，日本將臺灣最高峰視為自家的地標，正凸顯無可奈何的政治真相。⁷⁹

從林玫君的論述中可見日本對玉山的重視，1925年在玉山山頂建造的新高祠更彰顯玉山的神聖性，也造就玉山在當時成為登山的熱門景點，是以戰後國民政府遷臺後，同樣特別關注玉山。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於1947年11月29日，臺灣省政府因「該山（指玉山）名稱，含有日本色彩，應予改正」遂發布公告，將新高山正式更名為「玉山」。⁸⁰國民政府在玉山設立于右任銅像，于右任「於晚年曾言：『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⁸¹政府將于右任的銅像放置於原本新高祠的遺址，除了滿足于右任登高望鄉的遺願之外，也代表著國民政府欲反攻大陸的決心。

從日治時期的命名、神社的建置到國民政府的銅像設立，玉山被賦予政治的意圖，殖民者、統治者試圖通過玉山的特殊性以塑造臺灣民族的一致性，也是形塑族群認同的手段。在臺灣特殊的歷史印記下，玉山的多次命名變化，隱含權力的掌握，也是權力在山岳施作的痕跡。

⁷⁷ 乜寇·索克魯曼：〈永遠的玉山魂〉，收錄在《印刻生活誌》第54期（2008年2月），頁124-128。

⁷⁸ 林玫君：《玉山史話》（南投：玉山國家公園，2012年），頁16。

⁷⁹ 林玫君：《臺灣登山一百年》，頁28-29。

⁸⁰ 〈為新高山改稱玉山令仰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36年冬51期（1949年12月1日），頁799。

⁸¹ 林玫君：《臺灣登山一百年》，頁112。

(二) 玉山地景的塑造

玉山地景從清代到國民政府時期，都與政治緊密相連。清人對於臺灣高山可望而不可及，從蔣毓英、林謙光、郁永河等人的記載中只有遠看玉山的描述，留下玉山遙遠的想像，由於高山隔離政策，這些文章對玉山的認知大都淪為神奇傳說式的敘述與對窮險深山的恐懼態度。⁸²日治時期以新高山命名之外，日人學者鳥居龍藏、森丑之助在 1900 年登上玉山，就在山頂豎立標示：「我們日本人的人類學研究，已經延長到台灣新高山頂，我們期盼將來的研究領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⁸³此後，國民政府為穩定政治局勢，將山林作為管制區域，雖改回玉山之名，但設立的銅像與反共之意圖宣傳，又成為高度政治的高山意象。

臺灣在戒嚴管制下對山地的限制嚴苛，攀登高山需要有單位的核准，玉山再度成為遙遠的景觀，再加上出版的限制，戒嚴時期之下，臺灣的登山書寫幾乎空白。統治者展現的地理暴力，以本國地名置換殖民地地名，地名的更改也在洗去在地人民的歷史記憶與土地情感，以玉山作為國家政權的象徵，促進統治者進行族群認同的工具。因此導致臺灣人對自我的土地是陌生、疏離，臺灣人對土地的破壞，對生態的忽視，主要是因為對土地疏離而衍生一種文化精神的失落。⁸⁴隨著八十年代臺灣本土意識的興起，玉山作為臺灣最高峰的指標性山岳，用以重塑文化精神象徵。

1980 年代起，臺灣開始重視生態議題，政府於 1985 年設立玉山國家公園，保護生態環境和人文資源。1998 年在于右任的銅像多次遭到破壞後，政府單位便將刻有「玉山主峰」的基石取代之，代表新臺灣本土意識抬頭。以玉山作為臺灣的象徵，並將玉山與臺灣認同相互連結之例，應可視 1990 年代中期一系列以「玉山」為名的臺灣學為起始，首波風潮即「玉山運動」。⁸⁵新觀念雜誌社發行人郭承豐發起重視玉山的運動，⁸⁶他認為「玉山，可以視為臺灣人心靈的原鄉，我寄望的新臺灣人是『心清如玉，義重如山』，玉山的含義，正可以象徵新臺灣人

⁸² 何晉勳：〈論清人對玉山的認知〉，《漢學研究》22 卷第 1 期（2002 年 6 月），頁 281-296。

⁸³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探險臺灣》（臺北：遠流出版，1996 年），頁 517。

⁸⁴ 梁銘浩：《殖民意識、象徵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意識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年），頁 44-45。

⁸⁵ 林玫君：《玉山史話》，頁 168。

⁸⁶ 郭氏與其雜誌社在 1997 年至 2002 年這六年間連續舉辦不同主題的玉山運動，從各角度詮釋玉山，確保玉山在臺灣人心中的崇高印象，並引起民眾之迴響，可參考林玫君：《玉山史話》，頁 168-169。

思想成熟的目標。」⁸⁷喚起臺灣人對土地的認同，以連繫臺灣人民的族群文化認同。

玉山運動連帶開啟書寫玉山的風潮，藉玉山書寫攀登玉山，認識生態自然環境，並以玉山場域連結臺灣史，重新拾起失落歷史記憶，建立山岳與文化的新價值。2001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開始推動「玉山學」，路寒袖作為主要推動者，出版《玉山詩集》⁸⁸、《玉山散文》⁸⁹，是玉山學標誌性的文本；而陳列受到玉山管理處委託，著有《永遠的山》⁹⁰，從公部門的角色讓更多人了解玉山。本文以《永遠的山》、《玉山散文》為討論文本，前者是陳列進行為期一年的玉山寫作之旅，記錄進出玉山群峰的故事；後者收錄路寒袖、向陽、陳義芝等三十位作家親臨攀越玉山的感受，兩部著作堪為玉山學之代表。

玉山書寫是藉由描述玉山的重要地景，凝聚土地、族群認同，路寒袖認為玉山書寫「應該是一個完整學群的架構，起碼涵蓋了地質、地形、動物、植物、生態、族群、人文……等科目，必然是認識台灣的一個最佳途徑。」⁹¹首次上山的作家陳憲仁在攀登的過程認識玉山多元的植物林相：

一路攀爬而上，從海拔二千六百公尺到三千五百公尺到三千八百公尺，直至最後登上三千九百多公尺，成林成坡的檜木、鐵杉、冷杉、玉山圓柏、玉山杜鵑、草木等植物，有的昂藏挺立、有的蹲踞而坐、有的匍匐在地，以各種面向在各種地質、地形、氣候、空氣中，和山緊緊地依偎在一起。⁹²

隨著海拔的高度，玉山有著不同的氣候型態，擁有多樣化的生態群相。作家將植物比擬為山的朋友，通過植物的帶領親近玉山，擬人化的植物描述賦予生動活潑的山岳形象，拉近臺灣人與高山的距離，修補過往對山岳的疏離。

此外，玉山書寫不是只停留在玉山的介紹或寫實的描寫，還包含認同、凝聚的內涵。廖永來在攀爬玉山後，抒發其對臺灣山岳疏離的感慨：

我們生長的土地台灣，雖然孕育了我們的生長。然而，我們許多人並不認識它。多麼悲哀呀，這是歷史的錯置抑或時代的吊詭？因之，我張開一張影像

⁸⁷ 郭承豐：〈做個新臺灣人！〉，《新觀念》100期（1997年2月），頁15。

⁸⁸ 路寒袖編：《玉山詩集》（臺北：晨星，2002年）。

⁸⁹ 路寒袖編：《玉山散文》（臺北：晨星，2003年）。

⁹⁰ 陳列：《永遠的山》（臺北：玉山社，2000年）。

⁹¹ 路寒袖編：《玉山詩集》，頁3。

⁹² 陳憲仁：〈在玉山，我發現……〉，路寒袖編：《玉山散文》，頁152。

玉山，展讀這矗立於藍色海洋的島嶼台灣。這四周被嵌鑲著白色的泡沫，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分之三以上的高山，玉山正是群山之王。台灣是我們偉大的母親，玉山就是輸給乳汁的母親的雙峰，高聳堅挺、潔白無瑕，有著少女的溫柔與母親的尊嚴。⁹³

玉山以臺灣最高峰坐擁「群山之王」的封號，亦展現廖永來對玉山的情感，把玉山比作臺灣的母親，宛如母親般養育臺灣這片土地，玉山承載的歷史滋養著臺灣持續地前行，他富有抒情的文字，是將玉山依託於國家、民族的認同，彰顯玉山的重要性。從臺灣歷史的脈絡來看，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統治導致臺灣人長期被排除於山岳之外，從玉山崇高的地理位置來確立認同的對象。郝譽翔親近玉山來消除陌生感，將玉山地景連結國族認同，並認為攀登玉山，站在山頂上，「我們都是台灣之子了！」⁹⁴巧妙地把母子的關係，連結到玉山、臺灣人，臺灣的認同思維經過具象徵意義的玉山為媒介，形成身分和國族的認同。

至於玉山書寫如何建立新的臺灣歷史文化價值？玉山蘊含豐富生態和人文深度，展現玉山的多元性，不僅僅止於自然景觀，更具備歷史的縱深，透過多重的玉山面相了解臺灣的歷史，來重建臺灣的歷史記憶。陳列在〈八通關的種種〉一文中，除了書寫八通關的生態、地形面貌之外，亦連結八通關的歷史，開展人文元素，從清代到日治再到現代，從中觀察到政治權力在山岳的展現，作為攀登玉山重要的八通關古道，見證臺灣被殖民的歷史。

廖永來也從攀登玉山的過程觀察臺灣歷史的演變：

從玉山下來，八通關古道緊迫著我們，寒風細雨中，我們瑟縮前進，一行隊伍，挺成一行堅強的城池，在這百年古道上，我們走進歷史，走進清末的運鹽隊伍當中，也走進日據時代，為了平撫番民的士兵行列裡，歷史和族群總是在生活中，互有分合。然而日子總是要過，歷史的雙輪也沒停滯過，踉蹌跛跛，卻總是向前。⁹⁵

廖永來從行走的過程中感受到歷史的遺痕，人文構成的地理風情，加強土地意識的思維，歷史的困境也是臺灣的一部分，將過去和現在聯繫在一起，對臺灣有更深度的認識。在歷史文化的支持下，玉山地景擁有多元的面貌。

⁹³ 廖永來：〈玉山小記〉，路寒袖編：《玉山散文》，頁 148。

⁹⁴ 郝譽翔：〈我聽見了玉山的節奏〉，路寒袖編：《玉山散文》，頁 94-95。

⁹⁵ 廖永來：〈玉山小記〉，路寒袖編：《玉山散文》，頁 187。

玉山地景的書寫涵蓋了生態、歷史、文化等方面，李祖探、廖永來、郝譽翔等多數作家將玉山／臺灣人的關係比喻為母親／孩子，召喚對土地的情感，將玉山塑造成為臺灣文化精神之象徵：

就像是日本的富士山、美國的大峽谷、歐洲的阿爾卑斯山，都是國家或民族的象徵，也是心靈與靈魂的寄託所在。玉山是台灣的聖母峰，是台灣人的心靈之頂，也是永恆的寄託與依託，更是大自然不朽的允諾和設計，是台灣族群最具體的圖騰與象徵。巍然存在崇山峻嶺與雲靄飄渺之間，千百萬年來它就在那裡，……這就是玉山精神，也就是台灣精神，穿過千百劫，這是永恆的存在，在玉山永恆的國度裡，我們是永恆的子民與族群。⁹⁶

為玉山地景和國家認同之象徵關係下註解，將玉山作為臺灣的聖山，是臺灣人民心靈的原鄉，玉山的集體書寫嘗試凝聚族群認同，站在臺灣歷史的本位，重新建立山岳的演繹。

最後，由路寒袖主編的《玉山散文》中，許多作家是第一次攀登玉山，他們抱持著浪漫的想法親近山岳，卻在登完玉山後，體驗到登山的艱難與不便，表明不會再經歷一次，「此生只打算攀一次玉山」，⁹⁷如此矛盾的說法，與登山崎嶇的山路和體能的要求有很大的關係，也是他們不常與山親近的結果，在肯定玉山地景的形塑之餘，思考山岳和人民的距離，誠如陳列所言：

對於這個高山世界，我以前竟然是近乎懵懂無知。然後，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美的感動，及其純靜愉悅的靈的洗禮，以及自然知識的學習與成長，我才發現，對自然界所有的奧秘和生命跡象，對這片高山和整個的這塊土地，情感和認知上都越陷越深了。⁹⁸

陳列對玉山的實踐行動，標示著親臨山岳的新價值，在幾次深入造訪玉山，向山學習並獲得成長，山岳也在他長期的涉入觀察中產生空間的意義變化，進而衍生出深刻的土地情感和認同。

玉山地景在玉山運動、玉山學的塑造下連結國家和民族的認同，玉山成為文化符號，拉近人民與高山的距離，修補過往對山岳的疏離，出現《玉山散文》、

⁹⁶ 李祖探：〈滾滾紅塵，只有玉山〉，路寒袖編：《玉山散文》，頁 242。

⁹⁷ 音木：〈山盟〉，路寒袖編：《玉山散文》，頁 73。

⁹⁸ 陳列：《永遠的山》，頁 197。

《永遠的山》等文學作品，是認識玉山的途徑，更為重要的是建立臺灣新的歷史文化價值，把玉山比為臺灣的母親，孕育臺灣的歷史、文化，以此凝聚臺灣人民的認同感。

（三）登山者的玉山意象

1990 年代開展的玉山運動期，在年代上與學術化登山時期重疊，但這兩個登山活動內容與精神在本質上截然不同。玉山運動反映出人與環境的關係，以及形塑土地情感、族群認同，和登山書寫和古道探勘觸及的場域有所不同，後者指涉實質的山岳，但玉山運動的山岳更傾向於一個象徵，映射出的是臺灣政治、文化符號與環境。下文擬從登山書寫中關於玉山的篇幅，探討玉山的攀登歷程，以及展現的玉山形象。

楊南郡的登山書寫結合古道踏查，並翻譯日治時期日人學者的高山紀行著作，從實際的田野調查、攀登山岳，建立山岳書寫的知識體系，而玉山作為臺灣重要的山峰，自然成為其目標。首先，回溯至日治時期的玉山攀登，以 1921 年修建完成的八通關越嶺道為分水嶺，⁹⁹於是玉山的攀登從「探險式登山」轉向「大眾式登山」，也由於登山道路的相繼完成，加上沿途的開發，被視為登山平民化的起點。¹⁰⁰玉山國家公園成立後完成八通關越嶺道的修復，在 2005 年開放登山健行。

在八通關越嶺道開通以前，玉山的攀登被稱之為探險，長野義虎在 1895 年攀登玉山，書寫〈生蕃地探險談〉一文，除了記錄視察生蕃、熟蕃生活情形，也分享登山歷程，走清代的八通關道路，翻越玉山，藉由原住民帶路，從獵人狩獵之小道啟程，再往上便無跡可循，由此向上攀爬：

本來從八通關出發，應向右攀登；而我們直攀玉山方向，反倒費時。登山途

⁹⁹ 本文以「八通關越道」指稱日治時代闢建之道路；「八通關古道」為清代之道路，特此說明。「八通關越道路」，為日人完成由南投縣東埔登山口橫越中央山脈至花蓮山風登山口道路，全程共約 96 公里。興建目的除聯絡東西部交通外，更著眼於加強對深山原住民的統治與「教化」，並進行林野自然資源的開發，沿線設置眾多警官駐在所的相關設施。而「八通關古道」，是清代在牡丹社事件後，清政府為因應日軍侵臺行動，由沈葆楨奏請開山鎮撫，並勘察台灣全島地形，開發北路、中路、南路等 3 條橫貫道路，「中路」即是第一級古蹟「八通關古道」。由竹山林圯埔開山東進，經鳳凰、鹿谷牛軋轆、八通關、大水窟，穿越拉庫拉庫溪北岸地區，抵達璞石閣(玉里)，全長約 152 公里。日人修築之越道路與清領時期之八通關古道，路徑完全不同，而且幾乎完全沒有重疊之處，例如清八通關古道東段選定拉庫拉庫溪北岸闢建，而八通關越道路則選擇南岸迂迴繞行。摘取自：〈玉山國家公園官方網站〉，<https://www.ysnp.gov.tw/StaticPage/AncientRoad1>。最後瀏覽日期：2024 年 11 月 5 日。

¹⁰⁰ 林玫君：《玉山史話》，頁 31。

中，可見松、栂之木。再往前走，就有杜鵑一類的生長，另有類似檜柏之類的根狀植物攀生其間，一路延生，登山時亦可攀其而上。其上即是斷崖，斷崖成火紅色。……繼續向前攀登，越過一座約九千七百尺高的山。山上仍然長有樹木，但四周佈滿農物，能見度極低，……觸目儘是岩石，且四面又是斷崖。此時此地，無法再攀登玉山，又無足以取暖的木材，只好擇一樹下，就地露營。……我們四點半出發，匍匐攀登玉山。岩壁上寸草不生，稍不注意，落石即會傷及隨後的攀登人員。攀抵山頂，正好是日出時分。¹⁰¹

長野義虎一行人選擇危險的斷崖路線行走，沿途調查布農族部落的狀況，並記錄植物、地形等。他的攀登並沒有地圖可供參考，也沒有軍警的保護，聘任原住民為嚮導，穿行於高山深豁，在日本政權尚未穩定的局勢下，深入蕃地調查，是為以生命相搏的探險行動。

鹿野忠雄在 1931 年攀登玉山，此時八通關越嶺道已建成，鹿野忠雄行走在越嶺道上，途中經過駐在所等地，而他的目標是登山者尚未登臨的玉山南峰、南玉山、玉山東峰，在《山、雲與蕃人：臺灣高山紀行》中記錄了鹿野忠雄艱難的玉山東峰攀爬過程：

我們三個小心翼翼地攀登，深怕腳下的石塊被踢落。步步上升時刻，空蕩蕩的傾斜岩面上時而有崩石滾落下來，令人膽寒。因為不停的攀爬使人幾乎喘不過氣來，只要看到可以停腳的地方就休息片刻。……終於爬上斜岩的一半高度。從這裡俯瞰下去，真教人不敢想像剛才苦戰惡鬥，好不容易克服上來的一片崩石已遠在下方，變成小巧而優美的扇形崩石地。¹⁰²

長野義虎、鹿野忠雄都書寫到攀爬玉山的艱難過程，對他們而言，能登山臺灣最高峰的喜悅，莫過於登頂後的景色，「玉山主峰現在出現於眼前，展開著龐大而赤裸裸的大岩塊，在驕陽下發出赤褐色的反光。」¹⁰³重巒峻嶺之美，隨著四季遞嬗，高山的色彩也隨之變化，豐富的原始生態世界，共同牽引著日人對臺灣第一高峰的熱愛。

楊南郡的玉山行旅進入歷史面向的登山步道，嘗試去勾勒清代、日治通往玉山主要的八通關越嶺道，並跟隨著日本學者的腳步攀登玉山，他翻譯的《山、雲

¹⁰¹ 長野義虎：〈生蕃地探險談〉，林玫君：《玉山史話》，頁 200。

¹⁰²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臺北：玉山社，2000 年），頁 68。

¹⁰³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4。

與蕃人：臺灣高山紀行》中，可以看到他實際走訪過，以現在的眼光重新呈現當時的面貌：

譯者（楊氏）曾經多次從玉山南峰沿著岩稜，經由小南山到南玉山，也試過所謂「八分高」的山腰路線，發現這條山腰路本身就是一個獵路。或許鹿野博士在七十年前縱走時，獵徑不明顯，所以敘述時只提及有獸跡的小徑。¹⁰⁴

他依循著鹿野忠雄的文字，去尋找曾經的獸徑，也將駐在所的位置、所見的植物景觀列出。七〇年代臺灣登山運動大眾化，百岳熱潮之下忽略了登山的意義，楊南郡的登山書寫將玉山帶領到歷史之遺緒，藉由古道踏查，去探索八通關的營盤舊址、斷垣殘壁，揭開歷史的謎題。

同樣地，劉克襄在楊南郡的引導下，從歷史的視野攀登玉山，他注意到玉山上多樣的野外動物、高山植物，也留意日本時代駐在所的廢址，由過去留下的物證去想像玉山曾經的存在，更有與歷史、文學的對映：

在玉山頂，天氣晴朗可以望遠時，我最喜歡朝中央山脈的方向鳥瞰。倒不是為了享受馬博拉斯、秀姑巒和大水窟一線的山色，或是從那兒去尋找更北的南湖或中央尖。只是想接近眼前的東峰。我最喜歡靜靜地看它，回想著三〇年代鹿野忠雄爬上玉山，站在我相同位置時，對臺灣高山的愛戀，以及對這個險峻山巒的描述。¹⁰⁵

他以日本的高山作品為參照，從實際的攀登過程去感受玉山中的生物、人文，由此認識歷史的玉山。

此外，江秀真認為「玉山堪稱臺灣人心目中的聖山，更是登山愛好者一生必定攀登的標的之一。」¹⁰⁶她在 2005 年考取玉山國家公園保育巡查員，以前有登玉山的經驗，能夠成為巡山員的身分在山裡工作是夢想成真，除了對登山的熱愛以外，她肯定玉山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陳彥宇也從布農族的古老傳說談起玉山，「布農族人視玉山主峰——東谷沙飛，為庇佑族人延續生命的聖山」，¹⁰⁷可見玉山豐富的文化底蘊。他說明現在登

¹⁰⁴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53。

¹⁰⁵ 劉克襄：《臺灣舊路踏查記》（臺北：玉山社，1995 年），頁 26-27。

¹⁰⁶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頁 98。

¹⁰⁷ 陳彥宇：《山痕：那些山、那些傷教會我的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23 年），頁 122。

玉山的步道已經過整理，排雲山莊是後來開闢出來的腰繞緩坡，他形容登山玉山的視野：

如果要說玉山帶給我的深刻景象，莫過於過了玉山主北峰岔路後的之字形碎石上坡的展望了。站在全台灣最高峰，從主峰往東峰看去，銳利的稜線邊就是熾紅色高聳的斷崖崩壁，迂迴的山行像盤據而回身的龍脊一般，非常特別。

108

對應出前面關於玉山的古老神話故事，攀登玉山後眺望的是浩瀚的山體，如此展示了身為臺灣最高峰玉山的高聳。

有別於前述討論的玉山運動、玉山學，是以土地和族群認同去接近玉山，書寫玉山的作品，由此形塑臺灣的新價值，登山書寫中的玉山，是古道研究學者楊南郡、劉克襄以真實的山岳場域，去攀登、探勘、閱讀玉山，從山岳的古與今建立玉山的知識體系。對登山者而言，玉山是攀登者必爬的目標，然而更多的是關於玉山的人文底蘊，悠久的古道歷史、原住民的文化和豐富的生態。玉山在登山書寫的脈絡中逐漸形成其文化意象。

小結

本章以文本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為研究進路，從女性登山書寫、集體書寫形塑的地景兩個議題進行探討。第一節討論女性登山書寫，從臺灣女性登山書寫的歷史開始梳理，最早女性登山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的女學生，而戰後受到山區管制，登山一度沉寂，70年代以來陸續有女性登山，並通過文本能看到女性在被視為男子氣概的登山運動，從依附於男性走向獨立自主，並擺脫性別偏見，如今更多的是強調女性以真實的狀態呈現登山的樣態，直白地訴說所遇到的經驗，如生理期，解放性別帶來的框架。另外，女性的登山發展脈絡從移動的侷限到自在的遊走，過往雄性氣質的登山運動不容許女性的存在，作為榮耀追求及權力代表的登山，權力和話語權掌握在男性手中。隨著女性的涉入，從抵抗、競爭到向內探求自我，臺灣的登山書寫也轉為更開放的思維和想像。接著，從山岳特殊的空間探討性別界線的鬆動，身體與性別作為展演，藉由他者的互動和觀察形塑自我的認同，來檢視身體的可能性，並通過感官感知人際互動的情緒氛圍。

¹⁰⁸ 陳彥宇：《山痕：那些山、那些傷教會我的事》，頁 124。

第二節以山岳地景為研究主軸，探討臺灣登山書寫中書寫數量較多的重要地景——聖母峰、玉山，書寫者通過自身的經驗、與山岳互動的成果，形成山岳的特殊意象，進而形成地方認同。第一部分為聖母峰，作為世界最高峰，聖母峰是登山者的終極夢想，在臺灣聖母峰攀登的書寫中，能發現連志展、江秀真、李小石等人書寫聖母峰的溫柔、壯觀、醜陋，以及聖母峰的宗教、信仰，共同譜出聖母峰溫柔、冷酷與神聖的印象，通過書寫建立獨特又複雜的地景。第二部分為玉山，先就玉山的命名史說明玉山被寄予的政治意圖，當中隱含著權力在山岳施作的痕跡。而後玉山在玉山運動、玉山學的運作下連結國家、民族認同，把玉山比為臺灣的母親，孕育臺灣的歷史，玉山成為文化符號。至於登山者的玉山意象，除了是攀登者的目標之外，其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生態也造就玉山的文化意象。



第五章 結論

一、研究成果

本研究針對 1949 年至今的臺灣現代登山書寫進行整體性的討論、分析，探討文本發展互動的社會脈動、時代特色。選定的研究範圍橫跨了七十餘年，涉及到的文本數量龐大，在漫長的時間裡，臺灣的登山書寫經歷不同階段的累積和轉變，因此筆者對於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的作品探析，主要著重於文本的代表性與特殊性，以此掌握整體發展的大方向。經過分析與詮釋，下文將列舉本文的研究成果。

（一）登山書寫的時代特色

本研究將臺灣現代登山書寫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 1949-2001 年、2002-2024 年，前者探討戰後初期的高山紀行作品，國民政府實施山區管制，程兆熊受政府委託進行山地調查，作為少數能進入高山者，他在極度原始的高山環境中開天闢地，建立實驗果園，呈現開發探險任務艱苦的歷程，可視為戰後臺灣登山書寫的開端。在 1980 年代登山書寫走向學術化，肇因於百岳熱後的疲軟，楊南郡的古道探勘從歷史的縱深去重現臺灣過去的歷史；台大登山社則從區域性進行深度的探勘，其探險精神是從臺灣本位認識高山的歷史，以及探訪從未有人到過的山區。海外攀登也就此興盛，閱讀此時期的登山作品，李美涼、林乙華、高銘和等人以遊記為主題的紀實文本，記錄海外遠征的開拓故事、行旅景觀的呈現，勾勒出海外攀登的新視界，出於登山目的而到陌生之地的探險，形塑臺灣冒險文化的價值。

後者則從登山教育的文本內涵談起，臺灣在進入國際登山版圖後，將吸取到的登山知識、方法和教育帶進臺灣，連志展、江秀真等人實踐登山教育，將個人經歷以文字、演講、學校的方式傳遞給臺灣民眾，喚起對登山議題的重視。而隨著臺灣山林的政策開放，登山朝向大眾化、個人化，就登山文本來看，作家們不同的學經歷背景，造就多元的登山書寫主題，有人文學科出身的山女孩 Kit、劉辰君、劉崇鳳等，要書寫個人經驗的心靈之旅，強化抒情性、淡化登山紀實，袒

露更真實、脆弱的一面，從山岳汲取的動力，完整了自我；有雪羊、陳德政的山岳隨行報導作品，透過觀察和親身經歷書寫登山報告，蘊含山岳文學想像和歷史文化探求；有生態研究者結合登山行旅和學術研究，紀錄了在高山中長期研究的經歷，以及從生態的視野認識高山；在高山的工作者，即巡山員和高山嚮導，則書寫他們工作的秘辛，比如高山特遣、修復家屋，這些一般民眾難以接觸到的高山面貌。現代社會的開放也造就登山書寫文本的多樣化，隨著時代的變遷、政策的變化，在不同的時期之中，也形塑了登山文本的探險、書寫的多重性。

（二）山岳地景的發展轉變

臺灣的登山活動與外部環境關係密切，在經歷了清朝、日治與國民政府的政權轉移，山岳空間存在著權力的縱橫、意識形態。首先就日治時期的山林政策談起，日本政府為掌握高山資源，派任日籍學者從事登山運動，他們書寫的調查報告、博物誌作品，會提供給政府作為政治的依據，而這些作品所呈現的文本政治則蘊含了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權力支配。如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登上玉山後，認為是日本國土、政權延伸的領地，山岳成為可以被支配的符號，來展現殖民者的帝國主義和權力。

至於戰後國民政府遷臺，為穩定政權，將臺灣山林劃為管制區，並利用山林資源以達反攻大陸之用，高山再次淪為鞏固政權的手段，而臺灣人民與土地的關係是割裂、疏離的。進入 80 年代本土意識興起，玉山運動建構玉山成為臺灣文化、民族的精神象徵，隨之衍生的玉山書寫，藉由書寫玉山建立認同感，並藉此拾起臺灣失去的歷史記憶，透過描寫有象徵意義的玉山，凝聚土地認同。然而走進高山來書寫玉山，如此有目的性的行為似乎也成為文化運用的符碼，但可以肯定的是地景象徵的樹立，形成新的臺灣文化價值。

另一方面，登山者書寫中的玉山形象，是從高山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為切入，例如古道研究學者楊南郡、劉克襄去攀登、探勘、閱讀玉山，從山岳的古與今建立玉山的知識體系。對登山者而言，玉山是攀登者必爬的目標，然而更多關注的是玉山富含的人文底蘊，悠久的歷史、原住民的文化和豐富的生態。玉山在登山書寫的脈絡中逐漸形成其文化意象。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聚焦於臺灣現代登山書寫中，以散文為對象的作品，對現代詩、小說與翻譯等著作未能納入討論。本研究分析臺灣現代登山書寫作品與社會脈絡之間的互動，以及每個時代呈現的不同特色，囿於本研究的章節安排，未能將自然書寫、旅行文學等理論、研究資料鋪展開來，作為分析文本的工具。如本文所探討的重點在於剖析登山者與山岳的關係，及登山過程的書寫，形塑而成的山岳形象和價值觀。而在登山觀念的改變下，結合自然書寫的特點，加入自己對於自然生態的專業知識，呈現知識性的寫作，也是另一種不同類型的山岳書寫。另外，作者加入在登山途中拍攝到的照片，如李小石、雪羊等人的作品，鏡頭也是登山者觀看世界的一種方式，通過照片的拍攝、選取與安排，或能更深入了解作者在這趟旅程的轉變，若能配合圖像參照，相信會有更多的詮釋空間、收穫。

若從其他方向延伸思索，亦可見許多有待後繼研究者開拓的領域。臺灣現代山岳文學作品，如吳明益的《苦雨之地》¹、海德薇的《山神》²和山女孩 Kit 的《腹語山》³等作品，在田野調查、真實經歷的基礎上所虛構小說，當中的人物情感、情節安排和山岳形象，作者遊走在想像與真實之間的張力、筆法，有待深入探討。再者，由詹偉雄策畫、選書，臉譜出版的 *meters* 山岳文學書系作品，⁴翻譯海外經典的山岳文學作品，能從西方的著作汲取其哲學思辨、美學運用，亦有許多可學習、借鏡之處，或許能提供另一個研究的方向。

此外，除了本文所討論的作品範圍之外，臺灣早期的登山書寫，例如清代郁永河、日治時代鳥居龍藏、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等人的高山紀行作品，也都有豐富的內容，不但記載早期旅人所見的山岳面貌，也反映出當時複雜特殊的政治環境，如何影響觀看他者、異文化的思辨，若能將探討的時間往前延伸，觀照臺灣古典的登山書寫，對於臺灣登山書寫的發展脈絡，會有更完整的認識。

臺灣的登山書寫發展，仍在不斷的發展，雖然筆者已針對過去和現有的臺灣

¹ 吳明益：《苦雨之地》（臺北：新經典文化，2019年）。

² 海德薇：《山神》（臺北：鏡文學，2020年）。

³ 山女孩 Kit：《腹語山》（臺北：遠流，2024年）。

⁴ *meters* 山岳文學書系作品有《輝耀之山：兩位如風少年的絕壁長征》、《我的山間初夏：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啟蒙手記》、《攀向自由：波蘭冰峰戰士們的一頁鐵血史詩》、《靈魂的征途：安娜普納南壁》、《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殘暴之巔：K2 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靜謐的榮光：馬洛里、大英帝國與聖母峰之一頁史詩》（上／下）、《野蠻競技場：年輕的心與困難的山之最後告白》、《寧為一日猛虎：艾利克斯·麥金泰爾與他的生命之山》、《餵鼠：一種老派登山家風範》。

現代登山書寫作了整體性的分析與整理，然而還有許多的登山旅程、書寫題材等有待挖掘、提筆。在未來後續的研究，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參與其中，以更宏觀的視野關注臺灣登山書寫的發展，也期待臺灣的山岳作家們，能書寫更多不同風格的精彩作品。



參考書目

一、專書（依作者姓名排序）

（一）登山書寫文本

Kawas 編著：《給初心者的登山小誌》（臺北：嘉瓦士有限公司，2021 年）。

山女孩 Kit：《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臺北：遠流，2020 年）。

山女孩 Kit：《沒有名字的那座山》（臺北：遠流，2021 年）。

王威智：《凡人的山嶺》（臺北：蔚藍，2019 年）。

王威智：《越嶺紀》（臺北：蔚藍，2021 年）。

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臺北：玉山社，1999 年）

台大登山社，何英傑編：《丹大札記》（臺北：印刻，2021 年）。

台大登山社：《白石傳說》（臺北：正港資訊文化，1997 年）。

台大登山社：《南南山語：大小鬼湖區域探勘手記》（臺北：正港資訊文化，2003 年）。

台大登山社：《南湖記事－宜蘭大濁水溪流域探查足跡》（臺北：玉山社，1999 年）。

江秀真：《十年一講，為夢想》（臺北市：商周，2020 年）。

江秀真：《挑戰，巔峰之後》（臺北市：商周，2016 年）。

呂忠翰（阿果）：《我在這裡，山在那邊：從中央山脈到無氧挑戰 K2，召喚勇氣的 8000m 高峰探險》（臺北：麥浩斯，2020 年）。

李小石：《喚山：我與珠峰相遇》（臺北：INK 印刻文學，2010 年）。

李美涼、林乙華：《南美攀登記》（臺北：大塊文化，2001 年）。

沙力浪：《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臺北：健行文化，2021 年）。

周德九：《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臺北：博客思出版事業網，2021 年）。

林雋：《與山的一支獨舞：與自己同行，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臺北：三民，2021 年）。

阿步（浪漫巡山員）：《浪漫巡山員》（臺北：寶瓶，2024年）。

徐如林、楊南郡：《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臺北：農委會林務局，2014年）。

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農委會林務局，2014年）。

徐如林、楊南郡：《尋訪月亮的腳印（紀念典藏版）》（臺中：晨星，2016年）。

徐如林：《孤鷹行》（臺中：晨星，2017年）。

高銘和口述，梁永安記錄整理：《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臺北：大地地理，1997年）。

連志展：《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臺北市：天下遠見，2010年）。

郭彥仁（郭熊）：《走進布農的山》（臺北：大家出版，2022年）。

陳彥宇：《山痕：那些山、那些傷教會我的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23年）。

陳貞秀：《山の花嫁》（臺北：野人，2005年）。

陳德政：《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臺北市：新經典文化，2021年）。

雪羊：《記憶砌成的石階：翻越關門，布農丹社歸鄉路》（臺北：寶瓶文化，2023年）。

雪羊：《道拉吉里的風》（臺北：寶瓶文化，2024年）。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探險臺灣》（臺北：遠流出版，1996年）。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臺北：玉山社，2000年）。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2004年）。

游旨价：《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臺北：春山出版，2020年）。

游旨价：《橫斷臺灣：追尋臺灣高山植物地理起源》（臺北：春山出版，2023年）。

程兆熊：《山地書》（新北：華夏出版，2022年）。

程兆熊：《高山行》（新北：華夏出版，2022年）。

程兆熊：《高山族中：臺灣宜蘭山地之行》（新北：華夏出版，2022年）。

程兆熊：《臺灣山地日記：橫越合歡山兼記太平山 大元山之行》（新北：華夏出

版，2023 年)

- 程兆熊：《臺灣山地紀行》(新北：華夏出版，2022 年)。
- 黃美秀：《小熊回家：南安小熊教我的事》(臺北：遠流，2019 年)。
- 黃美秀：《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臺北：遠流，2012 年)。
- 楊南郡：《臺灣百年前的足跡》(臺北：玉山社，1996 年)。
- 詹喬愉：《攀向沒有頂點的山：三條魚的追尋》(臺北：紅樹林，2020 年)。
- 劉克襄：《臺灣舊路踏查記》(臺北：玉山社，1995 年)。
- 劉宸君：《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臺北：春山出版，2019 年)。
- 劉崇鳳：《我願成為山的侍者》(臺北：果力文化，2016 年)。
- 鄭安晞：《台灣最後秘境 清代關門古道》(臺北：晨星，2000 年)。

(二) 登山相關研究

- 內政部營建署：《臺灣登山史·總論》(臺北：營建署，2013 年)。
- 巴諦斯特·莫席左著，林佑軒譯：《生之奧義》(新北：衛城出版，2021 年)。
- 安川茂雄著，樂山譯：《最新登山學》。(臺北：國家出版社，1977 年)。
- 佛蘭西斯·楊赫斯本爵士著，黃梅峰譯：《聖母峰史詩》(臺北：馬可孛羅，2007 年)。
- 吳明益：《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3》。(新北：夏日出版，2011 年)。
- 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新北：夏日出版，2012 年)。
- 李希聖：《臺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臺北：李希聖，2005 年)。
-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臺北：博揚文化，2006 年)。
-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臺北市：玉山社，2008 年)。
- 林玫君：《玉山史話》(南投：玉山國家公園，2012 年)。
- 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史》。(臺中：晨星，1997 年)。
-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臺北：立緒，2014 年)。
- 段義孚著，趙世玲譯：《浪漫地理學：探尋崇高卓越的景觀》(臺北：立緒，2018 年)。

年)。

珍妮佛·喬登著，呂弈欣譯：《殘暴之巔：K2 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臺北：臉譜出版，2022 年)。

娜恩·雪柏德著，管嘯塵譯：《山之生：一段終生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臺北：新經典文化，2019 年)。

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臺北：印刻，2003 年)。

徐如林：《連峰縱走：楊南郡的傳奇一生》(臺中：晨星，2017 年)。

徐如林：《連峰縱走：楊南郡的傳奇一生》(臺中：晨星，2017 年)。

強·克拉庫爾著，宋碧雲、林曉欽譯：《聖母峰之死》(新北：大家出版，2014 年)。

連志展：〈台灣海外攀登的發展與展望〉，《第十一屆全國登山研討會論文集》(2012 年)，頁 8-14。

陳列：《永遠的山》(臺北：玉山社，2000 年)。

奧爾多·李奧帕德著，李靜滢譯：《沙郡年紀，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臺北：果力文化，2015 年)。

詹偉雄選編，劉麗真等譯：《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臺北市：臉譜，2021 年)。

路寒袖編：《玉山散文》(臺北：晨星，2003 年)。

路寒袖編：《玉山詩集》(臺北：晨星，2002 年)。

簡義明：《寂靜之聲——當代台灣自然書寫的形成與發展》(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 年)。

羅伯特·麥克法倫著，林建興譯：《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新北：大家出版，2019 年)。

羅時成：《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3 年)。

(三) 其他

Leslie Kanés Weisman 著，王志弘等譯：《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臺北：巨流出版，1997 年)。

山女孩 Kit：《腹語山》(臺北：遠流，2024 年)。

吳明益：《苦雨之地》(臺北：新經典文化，2019 年)。

威廉·金瑟著，劉泗翰譯：《非虛構寫作指南》(臺北：臉譜出版，2023 年)。

- 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2010年）。
- 郁永河著，方豪合校本：《裨海紀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
- 海德格爾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局，2006年）。
- 海德葳：《山神》（臺北：鏡文學，2020年）。
- 袁方主編：《社會研究方法》。（臺北市：五南，2002年）。
- 清·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十 古蹟》。摘錄自《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劉克襄：《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臺北：聯合文學，2008年）。
- 霍斯陸曼·伐伐：《玉山魂》（臺北：INK 印刻，2006年）。

二、論文（依作者姓名排序）

（一）期刊論文

- 乜寇·索克魯曼：〈永遠的玉山魂〉，收錄在《印刻生活誌》第54期（2008年2月），頁124-128。
- 何晉勳：〈論清人對玉山的認知〉，《漢學研究》22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81-297。
- 吳明益：〈吳明益談山〉，《聯合文學》第417期（2019年7月），頁20-27。
- 吳明益：〈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東華人文學報》第九期（2006年7月），頁177-214。
- 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2002年），頁55-88。
- 林文安：〈新關山一向陽山縱走〉，《臺灣山岳》11、12月號（1965年11、12月），頁7。
- 林玫君：〈臺灣女性登山史〉，《臺灣學通訊》第313期（2023年3月），頁30-31。
- 林淇瀟：〈台灣報導文學的虛構敘事規約〉，《文史台灣學報》第6期（2013年6月），頁25-47。

高嘉勵：〈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行旅書寫 日治時期「自然」的現代知識建構與美學表現〉，《中外文學》45 卷 1 期（2016 年 3 月），頁 119-165。

高銘和：〈攻頂聖母峰〉，《生命》第 6 期（2016 年 5 月），頁 12-19。

張君如、林志遠、李宜錫：〈登山健行者參與動機之探究〉，《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2007 年），頁 55-62。

郭承豐：〈做個新臺灣人！〉，《新觀念》100 期（1997 年 2 月），頁 15。

楊建夫、黃一元、林大裕：〈從自然地理談山的界定〉，《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論文集》（2005 年），頁 44-57。

（二）學位論文

田運良：《劉克襄自然書寫裡的旅行印 / 意象》（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余峻銘：《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中的台灣山林書寫》（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張蕙芳：《逃離與追尋-登山的社會學研究（以兩個登山團體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梁銘浩：《殖民意識、象徵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意識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年）。

陳慧元：《以步履描繪山的輪廓——台灣登山者的山林啟蒙與地景依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年）。

彭秀姝：《結合登山運動和學術研究的認真休閒者：以楊南郡之生命史為核心的探索》（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3 年）。

黃麗螢：《越過生命的那一座山——女性的登山體驗與登山對其生命經驗的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羅時成：《戰後臺灣登山活動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藍閔釋：《臺灣現代山岳詩發展研究——以 1949 年至 2011 年為範疇》（新北：淡

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年）。

蘇筱芸：《陳列《永遠的山》在臺灣山岳書寫中的意義》（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博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年）。

三、電子媒體（其他資料）

《台北市山岳協會》：<http://www.tmca-tpe.org/content.asp?id=643&cat=98&type=1>。

Home Run Taiwan：〈山是最好的老師，讓高山照亮青少年心靈，實踐「永不放棄」的野地精神——專訪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創辦人連志展〉，
<https://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775>。

玉山國家公園官方網站：<https://www.ysnp.gov.tw/FAQ/C007000?ID=c7939bca-5d9f-4fde-8c82-9931afbc9289&PageIndex=6&PageType=1>。

全國登山研討會：<https://twnaca.twmountain.com/2024/>。

行政院：〈行政院會通過「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dee7750b-f296-4968-bede-c9eb39665afb>。

吳明益：〈安靜的演化——我對近幾年台灣自然導向文學出版的看法〉，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4072>。

吳明益：〈楊南郡是一條路〉，《人社東華》電子報（2016年6月）。
<https://journal.ndhu.edu.tw/%E6%A5%8A%E5%8D%97%E9%83%A1%E6%98%AF%E4%B8%80%E6%A2%9D%E8%B7%AF%E2%94%80%E2%94%80%E5%90%B3%E6%98%8E%E7%9B%8A/>。

呂忠翰：〈打開膽識教育的想像——別讓恐懼大於好奇心〉，
<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features-mountain-climbing-courage-education>。

林業保育署：<https://www.forest.gov.tw/ForestNews/0072371>。

社團法人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官方網站：

<https://www.mtschool.org/%E9%A6%96%E9%A0%81>。

張元植：〈登山中的死亡，對生命的凝視〉，<https://www.twreporter.org/a/saturday->

[features-mountain-climbing-about-death](#)。

勞動部：〈山域揹負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指引〉，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id=FL097511>。

開放博物館：〈《東臺灣展望》帶您重遊日治八通關古道！〉，

https://openmuseum.tw/muse/map_story/15a0a4f0a4a32780341207891fe3c7f6

。

詹偉雄：〈再危險也要去！《群山之島》製作人詹偉雄：在山裡，有一種無與倫比的神聖時刻〉，

<https://alive.businessweekly.com.tw/single/Index/ARTL006002149>。

鄒欣寧：〈山系女子蔓延中！當女人向山走去〉，

<https://www.fountain.org.tw/issue/more-than-yama-girls/female-mountaineers>。

鄒欣寧：《在山路上複寫土地與我的故事——專訪郭熊《走進布農的山》》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5745>。

臺灣山岳：〈全國登山日〉，<https://mountainday.twmountain.com/>。



附錄

登山文學年表

1949-2024

| 時間 | 登山大事紀 | 登山文學大事紀 |
|------|--|--|
| 1949 | 5/19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告戒字第壹號》戒嚴令，入山（進入原住民區域）與地圖流通使用屬於管制項目。 | |
| 1955 | | 程兆熊自 1955 年起連續五年，帶領師生做臺灣山地園藝資源調查，出版《臺灣山地日記》與《高山族中》、《山地書》、《臺灣山地紀行》等四本書。 |
| 1959 | 1 月頒布〈臺灣省戒嚴期間山地管制辦法〉，平地人民、國軍兵官及外國僑民，均須向山地警局申請，始准進入山地。 | |
| 1971 | 9/30-10/31 中華山協舉辦「中央山脈大縱走」活動。 1970-1980 年代臺灣百岳運動盛行。 | 徐如林集結 1970 年代參與救國團和登山社的登山紀事，出版《孤鷹行》（1993）。 |
| 1985 | 根據「平地人民申請入山許可證手冊」規定，申請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區，須依規定手續辦理入山許可證。 設立玉山國家公園，為山岳型國家公園。 | |

| | | |
|------|--|---|
| 1987 | 7/14 政府宣布解除戒嚴，進入 1980 年代，海外攀登遠征活動蔚為風潮；而臺灣國內轉為古道調查、山區探勘的學術化登山方向。 | |
| 1988 | | <p>楊南郡受國家管理處委託，開始進行合歡越嶺古道、八通關古道等調查研究。著作頗豐，與其妻徐如林共同出版《與子偕行》(1993)、《尋訪月亮的腳印》(1996)、《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2011)、《浸水營古道：一條走過五百年的路》(2014)、《合歡越嶺道：太魯閣戰爭與天險之路》(2016) 等書籍。</p> <p>台大登山社探勘山域，範圍拓展至丹大山區等區域，出版《丹大札記》(1991)、《白石傳說》(1997)、《南湖記事》(1999)、《南南山語》(2003) 等書。</p> |
| 1990 | | <p>陳列受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以一年的時間出入玉山，藉文學書寫玉山，後出版《永遠的山》(1998)。</p> |
| 1995 | | <p>劉克襄從 1991 到 1995 年翻山越嶺，踏查臺灣古道，書寫對歷史視野的踏查和觀察自然的想法，出版《臺灣舊路踏查記》。</p> |
| 1996 | | <p>5/10 高銘和登頂聖母峰，他籌組「一九九六年聖母峰遠征隊」，並將登山歷程記錄而成出版《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1997)。</p> |

| | | |
|------|--|--|
| 2000 | | 周德九組成的「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由中國、臺灣共同攀登 K2，以科學論文的形式出版《華人首次遠征世界第二高峰 K2：2000 年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紀實》（2021）。 |
| 2001 | 12/25 放寬「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攀登 3000 公尺以上高山，不再需要高山嚮導隨行，並取消入山申請限制。 | 李美涼、林乙華參加國際隊伍，登頂阿空加瓜峰，為臺灣女性首登南美最高峰，出版《南美攀登記》。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開始推動「玉山學」，路寒袖作為主要推動者，邀請向陽、陳義芝等三十位作家攀登玉山後，書寫玉山，以凝聚土地、族群認同，出版《玉山詩集》（2002）、《玉山散文》（2003）。 |
| 2002 | 12/20 聯合國開會決議，自 2003 年起，將每年的 12 月 11 日定為「國際山岳日」（International Mountain Day），提升人們認識山林野地，彰顯山區永續發展之重要。 | 8/25-10/14 陳貞秀與丈夫連志展決定以中央山脈大縱走的形式在南湖大山上舉辦婚禮，出版《山の花嫁》（2005）。 |
| 2005 | 連志展創辦台灣生態登山學校，其宗旨為「讓山成為一所學校」，致力於野地教育，推廣生態登山教育的理念。 | 李希聖出版《台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梳理臺灣戰後的登山史，是早期系統性的整理登山史之專書。 |
| 2006 | | 歐都納公司、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聯合舉辦「尋找台灣探險王！挑戰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圓夢計劃」，從 2006 到 2009 年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相關著作有連志展的《勇氣，在山盡頭：全球七頂峰攀登紀實》 |

| | | |
|------|---|--|
| | | <p>(2010)、江秀真的《挑戰，巔峰之後》(2016)。</p> <p>「全國登山研討會」擴大舉行，每年辦理一次，召集政府單位、登山團體、專家學者等聚焦登山主題，以演講、論壇、座談會等形式進行臺灣山岳文化的研討。</p> |
| 2008 | | <p>林玫君出版《台灣登山一百年》，將人們及時代對山的想像，從懼山、望山，到親山、護山，時代上至清代、下到國民政府、當代，梳理臺灣登山運動的發展，並結合登山休閒活動的介紹。</p> |
| 2013 | | <p>鄭安晞、陳永龍等人編撰《臺灣登山史》套書，分為「總論 / 紀事 / 人物 / 裝備 / 影像」等五冊，系統性認識臺灣登山史的年代、重要紀事、人物故事及影像。</p> |
| 2017 | <p>教育部推動「全國登山日」，於每年 8-10 月舉辦系列活動，藉此推廣登山運動、安全及教育，營造永續的登山運動環境。</p> | <p>劉宸君與旅伴梁聖岳在 1 月前往印度，於 2 月底入境尼泊爾，進行登山旅行，途中遇到罕見大雪，被迫受困於山區的岩洞中，搜救隊在受困的第四十七天找到兩人時，劉宸君已逝世。友人將劉宸君貼身攜帶的旅行筆記、書信，以及留下的文字散稿，匯聚而成《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2019)。</p> |
| 2019 | <p>10 月行政院宣示國家山林解禁政策，包括「開放山林」、「資訊透明」、「便民服務」、「教育普及」及「明確責任」等五項政策主軸，政府以開放的態度，鼓勵人民走</p> | <p>詹偉雄發起「K2 Project」募資與計畫，應援台灣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攀登海拔 8611 公尺的世界第二高峰 K2，陳德政作為隨行報導者，一同攀登 K2，著有《神在的地方：</p> |

| | | |
|------|--------------------------------------|--|
| | 向山林，也期盼民眾「敬山」、「進山」，也要「淨山」，落實生態環境的保護。 | 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2021)，記錄這趟冒險登山歷程；另外，呂忠翰(阿果)出版《我在這裡，山在那邊：從中央山脈到無氧挑戰 K2，召喚勇氣的 8000m 高峰探險》(2020)，集結自 2012 年北美第一高峰 Denali，至 2019 年世界 K2 峰的攀登海外高峰故事，並以無氧攀登為目標。 |
| 2020 | | 江秀真創辦台灣福爾摩莎山域教育推廣協會，設立登山學校，實踐登山教育，出版《十年一講，為夢想》，紀錄推行登山教育(如演講、訪問國外登山學校)的過程。 |
| 2023 | | 3 月，臺灣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前往攀登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雪羊擔任橘子關懷基金會「大夢計劃 前進十四峰」的隨行紀錄者，跟著一起攀登，是臺灣人首度嘗試在 8000 公尺高峰上自主攀登，探索未曾被完整開發的新路線，由雪羊出版《道拉吉里的風》(2024) 書寫踏勘冒險紀實。 |
| 2024 | | 臺灣知名登山家張元植 6 月攀爬法國白朗峰時，不慎失足墜崖，尋獲時已無生命跡象，留有〈登山中的死亡，對生命的凝視〉(2020)一文。 雪羊開設「山徑的起點」登山線上課程。 |